

جوڭگۇنىڭ چىڭارا سىياسىتى

中國邊政

گۈن·شەزىم ئەپارىخى

China Border area Study

مۇھىم ئەپارىخى



مۇھىم ئەپارىخى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九月

207

黎族簡介

黎族主要聚居在海南省，據 1982 年資料有八十一萬七千五百多人，至 2010 年大陸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黎族人口已增加為一百四十六萬三千多人，二十八年來人口增加六十四萬六千多人，增加幅度相當大。黎族語言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黎語支，由於長期與漢人相處，不少黎族人都兼通漢語。黎族原未創制本民族文字，一般都使用漢文，但 1957 年，中共為之創制以拉丁字母拼寫黎族語言的「黎文」，在外觀上與歐美文字毫無差異。

在信仰上，早期是泛靈信仰及祖先崇拜，因此有「巫師」、「道公」、「娘母」，黎人認為巫術能使人生病甚至死亡，行使這種巫術者，如是男性，黎人稱之為「禁公」，如是女性，則稱之為「禁母」，近代以來由知識增進、教育普及，這種迷信已不常見。

黎族基本上是小家庭制，一般都是由父母子女組成家庭，間或有三代同堂的家庭，家長是一家之主，負一家主要責任，婦女在家庭中地位雖較低，但對子女婚姻大事仍有發言權，女子沒有財產繼承權，傳統上成年子女婚嫁後，都另行組織家庭，由幼子與父母同住，財產也由幼子繼承。黎族的婚姻採一夫一妻制，認為姨表，同宗（同姓）是不能通婚的，黎族青年男女到了一定年齡，都享有充分的戀愛自由，在黎人聚居區盛行「放寮」，也即青年男女可去寮房談情說愛，寮房，黎語稱為「布隆閨」，是一間簡易的茅草房，通常是以竹為支架，其上鋪以茅草，空間很小，除放一張床外，只有狹小的通道和爐灶，供青年男女約會之用。

黎族婦女穿對襟長袖長衣，下著桶裙，束髮腦後，扣以骨簪或金屬簪，戴綉花頭巾，頭巾沿邊綴以各色垂絲，喜戴銀或錫耳環。男子則結髮額前或腦後，以紅或黑布纏頭，穿無領對襟上衣，下身穿前後兩幅布之「吊襪」，男子也有戴耳環者。

在飲食方面，黎族主食以大米為主，其次為玉米、蕃薯，一般也是一日三餐，副食多樣化，但多以水煮，較少吃炒菜；肉食多以火烤或生腌，腌肉摻以米粉、野菜等，腌漬成酸肉可以長期貯存，以備食用。黎族男子及部分女子好吸水煙，無論男女都好飲糯米酒，也好吃檳榔。

黎族居住的房屋有船形和金字塔兩種形式。船形房屋是以傳統的竹木為建材，外形像船蓬，像半圓柱狀，兩端各開一門。金字塔房屋，以樹幹作支架，竹片編牆糊一層泥，屋的兩端與正面各開一門。

黎人對於喪葬因地區不同而有所差異，以土葬為主，但不建墓塚，都葬在本村的公共墓地，如係外村嫁來的女子，則將其遺蛻抬回其娘家，由其娘家料理其喪葬事宜。

黎族節慶基本和漢人一樣，有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等節日，某些地區如海南省萬寧市千家小鄉，每年六月初十有民族性的軍坡節。黎族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每當婚宴或節日時，或豐收時，總是歌舞不息，以示慶賀。

目 錄

漠南君子李永新、鶴齡先生小傳	金兆鴻	1
《夢溪筆談》有關邊疆部分介敘	劉學銚	53
西藏阿裏古格佛教壁畫中的人體藝術	周菁葆	81
近年內外蒙情況	孟 鴻	99
乾隆朝清初開國神話辨析	張華克	119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二十二）	華 華	161
稿 約		166

**2014年海峽兩岸
學術研討會**

**邊疆研究
論文集**

中國邊政協會 編

出版日期：2016年3月
出版社：致知學術出版社
ISBN：9789865681593
定價：300元

中國邊政協會是一個純民間的社團，致力於各民族的和諧與團結，自兩岸開放以來，曾舉辦多次兩岸學術交流、參訪活動，獲致相當成果，近年以來更與北京社科院合作，每年輪流舉辦有關邊疆問題學術研討會，使兩岸人民重視邊疆研究，也獲致相當好的成效。

2014年輪由中國邊政協會主辦，事前曾經過詳細討論，深以近百餘年來，帝國主義者對我邊疆地區及邊疆少數民族，極盡侵掠、分化之能事，今兩岸中國人努力於經濟、政治之革新，臺灣地區曾創下傲人的經濟奇蹟，而大陸地區更由世界工廠進化為世界市場，中國人應該實現長久以來自立自強、不受欺凌的中國夢，因此將研討會主題設定為「如何圓一個少數民族的中國夢」。承蒙大陸方面十餘位著名學者，提供大作，使研討會添增學術成就，深致謝忱。

新書上市，歡迎洽詢！

 惠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www.tec2c.com

聯繫電話：+886-2-2331-8262#13
傳真電話：+886-2-2331-8272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99號11樓之6（1103室）

漠南君子李永新、鶴齡先生小傳

金兆鴻
前輔仁大學教授

摘要

一般人總以爲要作下一些驚天動地的事功，或者寫下藏諸名山的巨著，才算偉人，才值得後人敬仰，其實所謂一將成名萬骨枯，而立言必須要有天賦，不是用功就能寫下傳世作品，唯有從平凡中展現謙謙君子之風，循規蹈矩忠於其所事，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從平凡中展現其不平凡特質，這是立德，是真正的不朽。漠南蒙古李永新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忠其所事終身不渝，很值得懷念的蒙古長者，本文就其一生事蹟酌爲敘述。

關鍵詞：李永新、漠南蒙古、喀喇沁左旗、
國民黨邊疆黨務處

壹、蒙古主體在漠南

李永新先生是漠南蒙古喀喇沁部蒙族平民，因此對蒙古民族的背景，應該要有所認識，現在許多人不瞭解，總以爲在漠北的外蒙古已經是一個國家，並與一百多個國家有外交關係，而且還是聯合國會員國，所以認爲蒙古的主體應該是在漠北的外蒙古，初看這個說法似乎頗有道理，但如深一層探究，這個看法就站不住腳，且從下面幾個面向看：

就人口而言：

大漠南北的蒙古族，也就是所謂內、外蒙古（其實蒙古人稱之爲腹蒙古、背蒙古）其總人口不會超過八百五十萬，據中國大陸第六次人口普

查，全大陸蒙古族人口有五百九十八萬一千八百四十人，這樣看來漠北的外蒙古人口不會超過二百六十萬，何況其中還有十來萬哈薩克人，就人口而言，蒙古的主體當然在漠南。

就文字文化言：

如所周知文字是文化的載體，蒙古之創制蒙古文字，始於鐵木真征服乃蠻，獲乃蠻大臣塔塔統阿，命其以畏兀（即今維吾爾）字母拼寫蒙古語言，這是蒙古族有文字之始，稱之為老蒙文或畏兀蒙文，其後忽必烈建立元朝後，一度命吐蕃（即今西藏）薩迦派喇嘛八思巴以類似吐蕃字母另行創制蒙文，稱八思巴蒙文或新蒙文，雖然一時通行，但民間仍然習慣使用老蒙文，元帝脫懽帖穆爾退出大都（今北京）後，這種八思巴蒙文就沒有再使用了，所有蒙古主要著作都是老蒙文，一直到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漠南內蒙古仍然使用成吉思汗時代所創制的老蒙文，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承載著蒙古民族的歷史、文化。漠北蒙古原本也是使用老蒙文，可是廿世紀四十年代，在前蘇聯的強迫下，改用與斯立夫字母同一系統的息立克字母拼寫蒙古語言，稱之為息立克蒙文或新蒙文，在外觀上與俄文一模一樣，不但失去蒙古民族特色，更使這種息立克蒙文或新蒙文成為俄文的附庸，就這一點而言，漠北外蒙古當然不會是蒙古的主體。

就蒙古大汗系統言：

鐵木真攻滅乃蠻後，於西元 1206 年受漠北各民族、各部落領袖擁戴，並上尊號「成吉思汗」，其意義雖眾說紛云，但總不脫「汗中之汗」、「萬王之王」，從此開疆拓土建立大蒙古國（蒙語讀作伊克、蒙兀兒、烏魯斯），並規定成吉思汗一系「博爾濟錦（或作孛兒只斤氏）氏」為黃金氏族，同時還規定：「非黃金氏族不得為大汗」成吉思汗的話語，就是全體蒙古民族的鐵律，其孫忽必烈雖然建立了中國傳統式的元朝，並且稱皇帝，但是他仍然有一個「薛辰可汗」的號，以統治各游牧民族與屬國，元朝歷代皇帝也幾乎都有可汗的名號。元朝或皇帝是用以象徵統治中國，可汗則代表是大蒙古國的君主，可以說是一個領袖兩個稱號（皇帝、可汗），或者一個機構兩塊招牌（元朝、大蒙古國），其後，脫懽帖穆兒退出大都，因為有許多漢人大臣與軍隊隨之北上，仍然沿用元朝與皇帝的

名號，可是時日一久，這些隨之北上的漢人大臣、軍隊的第二、三代都蒙古化了，再使用元朝或皇帝的名號，已經沒有意義了，但仍然是大蒙古國，元首也仍然稱可汗，而這個可汗系統一直延續到明末的林丹汗，林丹汗被後金（就是之後的清）打敗，逃往今寧夏青海一帶病死，其子額哲降後金，獻上元朝傳國璽，後金皇太極認為是繼承了大蒙古國的可汗，這時才可以說大蒙古國滅亡了，以上從忽必烈以至林丹汗，蒙古大汗系統才算終結，而這些大汗不是在大都，就是在漠南內蒙古，蒙古的主體當然是在漠南而非漠北。

就重要文獻歷史言：

元朝建立後，蒙古重要人物當然都在大都以及各行省（行中書省之省稱），雖然創制了八思巴蒙文，也用以製作官文書，但全國人民以漢人居絕對多數，無可避免地漢文仍然是使用最多的文字，及至退出大都之後，八思巴蒙文已不再使用，恢復使用老蒙文（即畏兀蒙文），主要的蒙文歷史文獻如《蒙古源流》、《黃金史綱》、《俺答汗傳》（俺答汗或作阿勒坦汗）等重要蒙文歷史文獻作者都是生長在漠南蒙古，說蒙古主體在漠南，誰曰不宜。

一、漠南蒙古蒙漢混融

所謂漠南，是指在中國正北方有一片大沙漠，通稱戈壁，或作瀚海，在這片大沙漠以南、長城以北之地稱漠南，以北稱漠北。自古以來大漠南北向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息空間，秦漢時的匈奴，東胡，東漢時的匈奴、烏桓（或作烏丸）、鮮卑，之後諸胡列國（也即一般文獻所說的五胡十六國，但以當時既不止五胡，所建立的政權，也不止十六國，以諸胡列國稱之較為妥適），至於舊史所謂「五胡亂華」，尤屬不當稱謂，蓋古往今來從無一部律法宣稱，中國大地只能由華夏或漢人建立國家，如有胡族命王稱帝建元立號，則稱之為「亂華」，這是一極霸道詞彙），大漠南北分布著敕勒（或作鐵勒、丁零、突厥、回紇、黠戛斯、薛延陀……等都屬敕勒系民族，有時也稱之為高車），匈奴、鮮卑、烏桓、稽胡、羯族、柔然……等民族，南北朝後期也即西元六世紀中葉以後，大漠南北突厥獨大，隋末唐初，天下大亂，中原群雄並起，紛紛向突厥稱臣納貢，縱然建

立唐朝之李淵也不能免，直到唐太宗貞觀四年（630 年）始攻滅北突厥汗國（就是東突厥汗國，以其雄踞大漠南北，在唐之北，故稱北突厥），大漠南北於焉入於大唐版圖，之後原生息於今貝加爾湖周邊的回紇、黠戛斯……等敕勒系民族逐漸南下，進入漠北地區，尤以回紇所建之回紇汗國最稱壯盛，唐朝屢次與之和親，與唐朝維持良好關係，唐玄宗李隆基天寶十四年（755 年）有「安史之亂」，洛陽、長安相繼失守，唐玄宗入蜀避禍，太子李亨於靈武自立（史稱肅宗），乞師於回紇，回紇出兵助唐收復兩京，唐朝從此就弱，而大漠南北都成為回紇疆域，大約七、八十年後，在回紇北方之黠戛斯崛起，於西元 841 年攻破回紇汗國，黠戛斯汗國擁有大漠南北，但黠戛斯汗國其祚不永，隨即崩潰，大漠南北陷於部落林立不相統屬之局面，西元十世紀初葉，有鮮卑族遺胤之契丹，崛起於大興安嶺西側松漠之間，建立遼朝，聲威所及，大漠南北各草原游牧民族無不臣服於遼朝，而此際大興安嶺西側、額爾古納河、黑龍江一帶的諸室韋部落開始茁壯，其中有部蒙瓦（或作蒙兀）室韋，就是稍後的蒙古族，也逐漸發展壯大，其最初居地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倫池、貝爾泊一帶，慢慢渡過額爾古納河進入今外蒙古東部，但是各氏族林立，彼此互相兼併，一直到十二世紀末，博爾濟錦氏族鐵木真崛起，聯合操突厥語的克烈部長王汗，才次第整合蒙古各部落，鐵木真於西元 1189 年統合蒙古各部稱蒙古汗，實力漸見壯大，鐵木真與王汗合作十四年後，雙方利益衝突，鐵木真於 1203 年攻滅克烈部，盡併其眾，成為日後衛拉特蒙古（清代作額魯特或厄魯特）四部中的土爾扈特部，次年再攻滅突厥系的乃蠻部，今外古全境都在鐵木真統治之下，1206 年，受各部擁戴稱成吉思汗，建國號曰大蒙古國（伊克、蒙兀兒、烏魯斯），從此開疆拓土，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疆域最廣袤的帝國，大漠南北當然都在大蒙古國範疇之內。

成吉思汗四傳之後（雖四傳，但只有三代），由忽必烈獲得大汗之位，但他實際統治之疆域，約略與清末相當，忽必烈定都今日北京，約九十多年後，元帝脫懶帖穆兒被朱元璋逐出大都，但仍統有大漠南北、甘肅、山西及東北地區，但不久甘肅、山西等地都被明朝奪得，僅保有大漠南北，這種南北對峙情勢，終明之世都未改變，及至努爾哈赤崛起，與蒙古科爾沁部聯姻，逐漸綏服了東部蒙古，經過皇太極、順治（改國號為

清）、康熙四朝，大漠南北各部蒙古都歸順了清朝，清朝將蒙古原來基於血緣組織的部落打散，改以類似滿洲的旗制，再合若干旗為一盟，而且每旗有固定的游牧地，如此一來基於血緣的部不見了（如喀喇沁部分為左、右、中三旗），失去了凝聚力，固定了游牧地，失去了機動性；游牧民族之所以能夠快速的凝聚武力，以少勝多，所憑藉的就是凝聚力與機動性，一旦失去這兩個特性，就失去了武力，而清朝更輔以喇嘛教，鼓勵蒙古人出家當喇嘛，於是無法增加人口，也失去了勞動力，蒙古民族從此走向衰微，但是其所擁有的土地卻非常廣大，可以說是地廣人稀，漠南共有六盟一部，它們是哲里木盟、卓索圖盟、昭烏達盟、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及察哈爾部，其中前四盟，一般稱之為東四盟，大多是土地肥沃，水豐草美既可放牧，更宜農耕，內地漢人早就有偷偷前往，向蒙古王公租地從事農耕，一般稱之為闖關東，清廷以其龍興於東北，初期禁止漢人出關，但乾隆以來華北冀魯豫三省，常有旱澇蝗蟲之災，數百萬災民嗷嗷待哺，如不妥善處理，必然會引起大亂，不得已准許這三省災民出關墾荒，惟只准春去秋回，但時日一久，往往春去秋不回，一則官吏執法不嚴，再則出關漢人既勤勞而又會多種手工藝，所繳給蒙古王公的地租，遠超過放牧所得，而出關漢人又會釀酒、蓋屋、製陶……等，為蒙古王公提供較高的生活需求，就在這種「蒙利民力、民利蒙地」（蒙，指蒙古王公，民指出關漢人）兩皆有利的情況下，蒙古王公包庇出關漢人，使之可以春去秋不回，時日一久，出關墾荒漢人，有了積蓄，便向蒙古王公購買土地進行農耕，這種情形越來越普遍，尤以卓索圖、哲里木兩盟逐漸形成蒙漢混雜而處情形，也有一些蒙古牧民眼見務農收益高於放牧，便棄牧從農，此所以卓、哲兩盟有不少蒙人都是務農的，如果不瞭解以上背景，對於蒙人務農不免覺得奇怪，也因此卓、哲兩盟蒙漢混融的情形，相當普遍，因此一般蒙人也多能說漢語識漢文，當然也有一些漢人歸化入蒙古而成為王公所屬的旗民。

二、漠南盟旗州縣並存

漠南地區在漢人進入「墾荒」前，可以說地廣人稀之處，清朝之將編設為盟旗，基本上只求安定，不希望蒙古民族壯大，以免威脅到清朝的統治，所以清代「治蒙」政策目的在弱化、馴化蒙古，所以相對內地各省而

言，整個蒙古顯得落後，自咸、同之後，整個中國都比歐美落後，如是整個蒙古的落後情況可想而知。之後由於內地冀魯豫各省天災頻仍，許多漢人到漠蒙古墾荒以謀生，時日一象，漸有落地生根者；朝廷為管理內地前來的漢人，以及徵收各項稅賦，遂在漠南漢人聚居較多地區設立州縣，在州縣之上更設有府廳，如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共十三年）設熱河廳，十一年改設為承德州，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共六十年）改設為承德府（今為河北省承德市）；如在卓索圖盟喀喇沁左旗，乾隆之前已有頗多漢人前來墾荒務農，所以到了乾隆三年（1738年）設置塔子溝廳，以為管理漢人兼收稅賦，及至乾隆四十三年改設為建昌縣，（入民國後，民國三年改為塔子溝縣，同年八月再改為凌源縣，今則為遼寧省朝陽市所轄凌源市）。有清一代在漠南內蒙古地區設置了許多州縣的地方行政組織，除了以上所敘承德，建昌之外，如灤平、豐寧、平泉、赤峰、朝陽、圍場、萬全、蔚、宣化、張北、延慶、懷來、涿鹿、龍關、多倫、沽源、赤城、寶昌、商都、康保、歸綏、薩拉齊、和林格爾、托克托、清水河、包頭、武川、豐鎮、涼城，興和、陶林、集寧、五原、臨河、固陽、東勝、安北、未倉、狼山、晏安、陝壩、昌圖、懷德、康平、洮南、洮安、開通、安廣、突泉、農安、乾安、遼源、彰武、景星、肇源、泰康、法庫……等縣市均屬之，因此漠南地區既有管理蒙古人的盟旗行政組織，也有管理漢人的州縣，在同一個地區有兩套不同的地方行政組織，這在清代並無問題，因為無論盟旗或州縣之上還有將軍或都統，但民國肇建後，於民國三年（1914年）設立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行政區時，沒有明確規定蒙古盟、部、旗的歸屬（察哈爾為部，不是盟，沒有盟長，所轄的族群之長官不稱扎薩克，稱總管，也不得世襲），種下後日盟旗省縣的爭執。

貳、李永新先生出身

一、出身及就學

李永新先生字鶴齡，蒙古族，屬喀喇沁部左旗，蒙古名「蒙袞滄」，生於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民國前十一年）農曆十月二十九日誕生於漠南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左旗四道營子，世代務農，屬於平民而非貴

族。按蒙古喀喇沁部係元初有札爾楚泰者生子濟拉瑪，姓烏梁罕氏（或作烏梁海，但與唐努烏梁海完全無關，唐努烏梁海係突厥系民族，而喀喇沁之烏梁罕是蒙古本支），助成吉思汗開疆拓土立下汗馬功勞，七傳至烏梁罕和通有眾六千戶（帳），游牧於額沁河，遂號所部為喀喇沁，其地既富鉛礦，且農牧兩宜，早在乾隆年間已有蒙人從事農耕，乾隆經過喀喇沁部時，曾有詩稱「也知稼穡望西成」，可見喀喇沁部蒙人之務農已有很長的歷史，李氏一族世代務農一點也不為奇，據李永新先生手書自傳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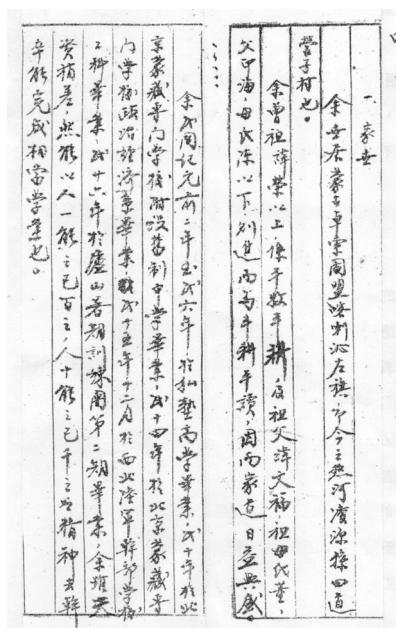
「余世居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左旗，即今之熱河凌源縣四道營子村也。余曾祖諱榮以上係半牧半耕，及祖父諱文福，祖母氏董；父印海、母氏陳，以下則進而為半耕半讀，因而家道日益興盛。」

惟自遭成年洪水大患後（此處成年，應為庚戌年，漏一庚字，此年為清宣統二年，西元 1910 年，時先生虛十一歲），不惟田園盡沒、廬舍為墟，即所有財產亦盡付之東流。余祖父母、父母等不惟毫未灰心頹志，且以毅然決然之精神，衝破無數難關後（原手稿「數」字字跡模糊，應以「數」字較能前後貫通），則一面辦理社會福利事業，以解除窮苦無告之人民痛苦，一面培

養余兄弟妹等六人，相繼成家立業。故余祖父、父親在社會上有李善人之稱也。（以下略，其手稿見附影本）」

從上引李先生這一段自傳可知先生一家自其曾祖父時，已經是半牧半耕，一般而言，每一世代以三十年計，自先生之生往前推三代共九十年，其時應為 1810 年前後，也即嘉慶十五年左右，李氏一家已是開始務農，之後更是棄牧就農而且是耕讀傳家，這一點與本文前段背景分析完全吻合。

李永新先生幼年時可能在家啟蒙，或許讀了許多儒家經典（李氏一家既以耕讀傳家，則讀儒家經典乃屬極自然之事），從民



資料來源：國史館

前二年（1910年）至民國六年（1917年）這前後八年先生分別就讀私塾與高級小學，民國十年畢業於北京蒙藏專門學校附設舊制中學，民國十四年於北京蒙藏專門學校就讀政治經濟系期間，適逢「五四」運動，先生深受其影響，率先剪去辮子，蒙藏學校同學也受其影響都剪了辮子，先生說：「這就是我們要從事革命運動的起點！」（見劉廉克先生口述、建瓴筆錄《大漠風雲匯中原》，文載《李永新先生紀念集》，頁 83~166，按劉廉克先生係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左旗蒙人，曾任熱河省教育廳長、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可見先生當時深受孫中山先生國民革命理論的影響而心嚮往之。

民國十三年元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發表了如下的宣言：

「本黨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于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之中華民國。」

先生與在北京的許多蒙古青年，受到這個宣言的鼓舞，在先生帶頭之下，紛紛加入中國國民黨，從此先生一生都忠於國民黨，加入中國國民黨後，先生就被任命為北京地區負責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北洋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在各界要求下，向廣州發出通電，邀請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國是，中山先生時在日本，應邀到北京，中山先生蒞臨北京時，歡迎群眾可說是萬人空巷，先生也率領了一批蒙古青年前去歡迎。中山先生在北京會談期間身體違和，及到次年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先生曾經痛哭地說：

「這位革命偉人的去世，不單是漢族人無可彌補的最大損失，也是我們蒙古人的一大不幸。我們今後的日子，將比前所預料的更為艱鉅。」（見前引劉廉克口述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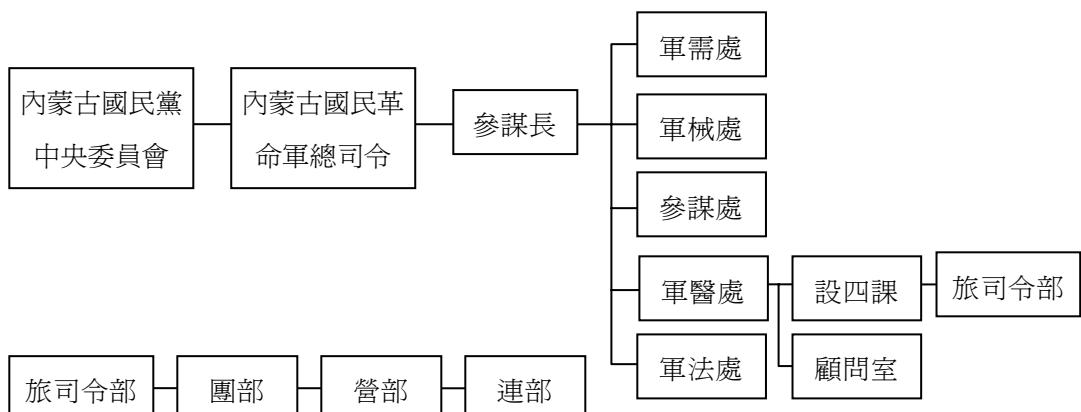
可見先生對孫總理感佩之深，寄望之大。民國十四年三月一日，也就是孫總理逝世前十一天，內蒙古國民黨在張家口宣告成立，先生也前往張家口去參加內蒙古國民黨，當時西北軍領袖馮玉祥也列席了內蒙古國民黨成立大會，可能此時先生與馮玉祥有了接觸，而馮玉祥在西北辦有西北陸軍幹部學校，或許由於國民黨的安排，先生進入馮玉祥的西北陸軍幹部學

校工科就讀，於民國十五年十二月畢業，先生對於軍事、兵學向有興趣，早在喀喇沁旗唸書時，對《孫子兵法》一類兵學之書就下了一番功夫，尤其對元太祖成吉思汗經常能以少勝多，以及善處逆境艱忍不拔精神，更是作了深入研究，所以先生之入西北陸軍幹部學校就讀可以說償了夙願，也從此造就了先生文武兼備的人格特質。

日後馮玉祥挾其軍事力量，強使內蒙古國民黨總部從張家口遷往包頭，遂以伊克昭盟（今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烏蘭察布盟（今內蒙古自治區同名之盟）為基地，先生此時已從西北陸軍幹部學校畢業，正式參加內蒙古國民黨工作，其實所謂內蒙古國民黨，就是國民黨內蒙古黨部。

二、軍旅生涯

李永新先生從西北陸軍幹部學校畢業後，投入內蒙古國民黨工作，當內蒙古國民黨從張家口遷往包頭的途中，特別到伊克昭盟東勝伊金霍洛元太祖成吉思汗陵寢致祭。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只是成吉思汗的衣冠塚，並無成吉思汗的遺蛻，因為蒙元帝國採「秘葬」制，因此成吉思汗究竟埋在那裡，至今仍是個謎。伊金霍洛的成陵，雖然只是衣冠塚，但卻是全體蒙古族人心目中的聖地，內蒙古國民黨之致祭成陵，當然含有效法成吉思汗奮鬥不懈精神，以鼓舞內蒙古國民黨的士氣。抵達包頭後，立即著手規劃建立內蒙古國民革命軍有關事宜，構想是藉內蒙古國民黨的組織發展，先在伊克昭盟與烏蘭察布盟所屬各旗，成立「革命自衛隊」，再將自衛隊納入內蒙古國民革命軍建制。由於依此構想推行，效果良好，因此內蒙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就在包頭成立，其組織架構大致如下：



先生初任軍需處處長，如所周知，軍需是軍隊能否作戰的先決條件，

當時物資匱乏，後勤補給談何容易，但先生都一一予以克服，使內蒙古國民革命軍的軍需制度，逐漸步入正軌。之後轉任軍械處處長並兼第一團團長，由於先生是西北陸軍幹部學校工科畢業，對軍械自是相當在行。先生雖然對武器（軍械）在行，但如何獲得軍械則是一大難題，當時在蘇聯控制下的外蒙古答應援助一批武器（見前引劉廉克專文頁 98），通知在內外蒙古交界處交付，這個任務自然就落在軍械處長先生身上。外蒙古之所以要援助這批武器，乃是別具野心，蘇聯及外蒙古希望內蒙古能併入外蒙古，絕非真心要幫助內蒙古。先生接下這個任務，就從他所領的騎兵第一團裡精挑細選了一批幹練的士兵編成相當一個營的隊伍，由先生親自率領，到邊界接下這一批武器。這個任務看似簡單，其實是充滿了危險，當時在漠南草原上有許多武裝的雜牌軍，說直白些就是土匪，他們最缺的就是武器，如果知道有這麼一批新式武器，豈有不下手搶劫之理。所幸先生事先對這種情況已有所準備，在接到武器回程中，曾三度遭到地方雜牌軍或土匪攔劫，由於先生早已料到會有這種情況，憑先生卓越的指揮、蒙古健兒勇敢的戰鬥力，擊潰三批雜牌軍，把武器安然運到內蒙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這次行動展現了先生臨危不亂的機智與膽識。

先生完成這次艱難且危險的任務後即晉升為旅長，但以其擁有的專長，仍兼軍械處處長，身兼兩職既要帶兵練兵，又要處理軍械，頗難兼善其事。先生任事向來謹慎，唯恐有誤公事，仍辭去所兼軍械處處長一職專任旅長，這可以看出先生淡泊名位，只求把事情做好，這種謙和、不慕名位的人格特質，實為平凡中的不平凡，也因此他成為內蒙古國民革命軍中的甘草型人物，處處都要他來調和然後才能成事。

先生所統率的這一旅，以駐防在阿拉善和碩特特別旗的部隊為最精銳的主力。阿拉善和碩特部是蒙古四衛拉特之一（衛拉特，明時稱瓦刺，清時稱額魯特或厄魯特），其統治階層為和碩特固始汗（或作顧實汗）兄之後人，其地約當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先生治軍基本原則是能與士兵同甘共苦，在生活起居上，與士兵打成一片，因而極受官兵的愛戴，革命隊伍原本就該如此，先生算是一個革命的實踐者。先生曾說：

「帶兵必須要以帶心為最重要的目的。若不能『帶心』而僅『帶兵』，那是很危險的事。因為兵事的本身是主殺的工

具，它固然以殺敵為其本份，但在喪失其『心』的情況下，它也會『自殺』。除却『自殺』的可能性而使守其殺敵本份之法，就是帶心。所以我的帶兵，並不囿於紀律或命令的形式服從，而須各人打從心裡的服從。因此我的兵，可能在形式的動作上，或不整齊劃一，但每一個人的心，都是劃一的。」

這一段話確屬的論，很值得帶兵者參考。從此也可看出服從是軍人的天職，而且要從內心服從。先生對於戰爭的看法是

「養戰而不求戰。戰必發自忍無可忍，迫不得已、忍無可忍，迫不得已之戰是義。凡義戰終必勝利，不義之戰，終必失敗。」

（以上兩段話，均引自劉廉克口述專文）

先生這一段話已臻兵學境界，可稱之為善知兵者，且與孫子所說相合：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見《孫子兵法》《作戰篇第二》末句）

內蒙古國民革命軍在李永新先生卓越領導下，配有新式武器，上下一心，馳騁於漠南大草原上，使平時殺人越貨的土匪如井岳秀、楊猴子之流，聞而喪膽，因而不敢再為非作歹打劫蒙民。但內蒙古國民革命軍這一股新銳之氣與聲勢，卻也引起西北軍的眼紅，想方設法要加以吞併，只是表面上絕不動聲色，甚至還故意示好，以降低內蒙古國民革命軍的戒心。民國十七年（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一路勢如破竹，同年底東北宣布易幟，服從國民政府。此時各地軍閥紛紛宣布歸順中央，西北軍馮玉祥也宣稱服從中央，把西北軍改稱國民革命軍，但其為軍閥的本質卻毫無改變，仍想割地自雄、稱霸一方。與此同時，內蒙古國民黨也併入中國國民黨，改稱為「中國國民黨內蒙黨務指導委員會」，先生出任指導委員之一，並從而開始步入黨務系統，這將在下節敘述。且說西北軍覬覦內蒙古國民革命軍的武器為時已久，馮玉祥便運用詭計，假冒國民政府中央名義，密令寧夏省主席門致中（門係馮玉祥部將），設下圈套，要將內蒙古國民革命軍繳械。原來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奠都南京後，將民國三年北洋政府所設置的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行政區及稍後又增設的一個寧

夏特別行政區，一律改爲行省，其中昭烏達、卓索圖、錫林郭勒、察哈爾（部）、烏蘭察布、伊克昭等五盟一部與熱、察、綏三省在同一地區，阿拉善和碩特及額濟納舊土爾扈特兩旗與寧夏省在同一地區。門致中銜馮玉祥之命依計而行，首先是邀請內蒙古國民革命軍與西北軍舉行「會操」，所謂「會操」其實近似閱兵，也與清代在蒙古地區定期舉行的「會盟比丁」相似，這在當時各部隊間是常有的事，內蒙古國民革命軍當然不知是計，便欣然整裝就道；接著門致中就以寧夏省主席名義，設宴款待內蒙古國民革命軍團長以上的高級軍官，並在酒酣耳熱之際，拿出僞造的國民政府中央命令要收繳蒙古軍的武器，以編入馮玉祥的軍隊，蒙古軍的高階軍官們這才面面相覩知道上了當、中了計，而門致中還說：

「你們的（內蒙古國民）黨已解散，你們的（內蒙古國民革命）軍隊當然也得要解散，我們奉『中央命令』，只接收你們的武器，其餘的任聽你們自己的便。」（見前引劉廉克口述專文，頁107）

在蒙古國民革命軍得知中了西北軍圈套後，便有一些人主張寧爲玉碎不爲瓦全，要與西北軍拼到底，但先生認爲不宜硬拼，在眼前情勢下，應行繳械，他作此看法的理由有以下幾點：其一，馮玉祥早已不容許在西北軍勢力範圍內，還有內蒙古國民革命軍存在的空間，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如要硬拼，只有全軍覆沒這一條路。其二，內蒙古國民革命軍如與西北軍硬拼，除了自取滅亡之外，更製造了蒙漢民族的仇恨，與國民革命提倡五族共和的理念相違。其三，中央既已將內蒙古國民黨改組爲中國國民黨內蒙古黨務指導委員會，但對內蒙古國民革命軍的未來並沒有作明確的指示，似在暗示自動解散。其四，馮玉祥之軍既已接受國民政府中央的領導，等同就是國民革命軍，於是向馮軍繳械亦與向國民革命軍中央繳械無異。先生是站在高處、大處看問題，於是下令繳械，這絕不是怯懦，而是大智、大勇，微先生誰能及之？

內蒙古國民革命軍從此消失，只成爲近代內蒙史上的一段過程。而先生卸下戰袍後，曾到南京盤桓了一陣子，大約一個月後（時爲民國十八年四月），眼見國民政府未作任何安排，便向在京同鄉（據劉廉克口述專文猜測是白雲梯巨川先生）借了盤纏，回到卓索圖盟喀喇沁左旗老家。他曾

任內蒙古國民革命軍旅長一事，在他老家也有所聞，當年的「旅長」是何其大的軍官，然而先生在回喀喇沁左旗老家時，竟然隻身一人，連行李都沒有。先生的令尊曾問他說：

「聽說你在革命軍裡幹旅長，是真的嗎？」

「是真的。」

「你不是到北京去唸書的嗎？怎麼跑到伊盟去鬧革命，連一封家信都不寄來。家裡不知道你實在的地址，也接濟不上你。你這幾年在外，生活是怎麼過的？你媽都快急瘋了。現在回來就好。」

他令尊又說：

「我可不管你做了什麼長不長，你就是做了皇帝，回到家來還是要照我們家的老規矩，該作什麼就作什麼。你可不能把你那旅長帶到我們家裡來。」

先生原本就是一個極踏實的人，去北京之前，就是耕田之餘，才讀書，這次回到老家，就和去北京之前一樣，依舊與兄弟一起忙農家該有的事務，一件沒少，這是從平凡中透露出不平凡的人格特質。

在老家務農務了四十多天後，接到白雲梯先生要他到南京的信，於是決定離家到南京，他的令尊令堂也同意他南下，並告以外面做事，若生活實在有困難，家裡一定會設法接濟，萬萬不可圖謀不該得的財物，又教以：

「孝子賢孫不以財貨事親，當以眾所共認的『好』以慰親。」

這是中國傳統儒門教子之方，先生一生清白，與家風有密切關聯。這次先生離家，從家裡帶了較為充裕的盤纏和一些生活費，於是兼程南下，及到南京，才知道中央發表他的職務是內蒙黨務特派員。這個職務的基本任務，是要將原有的內蒙古國民黨已發展成形的黨組織，重新加以整頓，將之歸納到中國國民黨的組織體系中，而他也就此脫離了軍旅生活，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在中國國民黨系統裡工作。

參、從事黨務

一、黨務工作

中國國民黨係孫中山先生號召許多志同道合者創建，但以中山先生高瞻遠矚自然成爲國民黨領袖，國民黨之容共爲中山先生所獨斷，國民黨內不少高級幹部自始即表示反對（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弘文出版社，1978年，頁561），但以中山先生之威望與堅持，仍通過容共政策，容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中國國民黨，因此國民黨內部已有意見不同之派系存在，而且只能靠中山先生個人之威望來穩住陣腳。直到中山先生逝世之同月，反對中共之張繼、林森、戴傳賢、吳敬恒、孫科等就在北京西山孫中山靈前自行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此即通稱之西山會議，議決取消中共黨員之國民黨黨籍，解除俄人鮑羅廷之顧問職務，懲戒汪兆銘，但因廣州中央黨部方面不承認此一決議，並斥之爲非法，渠等乃在上海另立中央黨部，國民黨由是分裂，此時爲民國十四年底或十五年初之事。未幾，蔣介石訪俄歸來，洞悉蘇共對中國包藏禍心，遂有之後的清黨作爲。

由於國民黨之清黨，內蒙親共分子乃乘機蠢動，而外蒙古早已由蘇共所控制，中國國民黨爲穩住內蒙古，遂有將內蒙古國民黨納入中國國民黨，成立「中國國民黨內蒙古黨務指導委員會」一事，民國十七年由蒙籍革命元老白雲梯向國民黨中央黨部提案在中央黨部設立蒙古黨務單位，案經決議「酌設蒙古黨務工作單位」，嗣以當時黨內意見分歧而有派系之爭，設立蒙古黨務工作單位一事，暫行擱置，一拖四年，直到民國二十一年夏，始在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之內，設置蒙藏組織科，當時中央組織委員會下分設：普通組織科、軍隊組織科、蒙藏組織科、訓練組織及調查登記科等五個科，科下設股。當時中央組織委員會的委員，概由中央委員兼任，由陳立夫爲主任委員，谷正綱爲副主任委員、白雲梯等爲委員，以先生爲蒙藏組織科科長，科下設兩股，組織訓練股（組訓股）總幹事爲劉廉克，編譯股總幹事爲趙文儒。先生處事向來認真，而且督導有方，因此業務發展迅速，深受陳立夫先生所賞識與信任。先生在出任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蒙藏組織科科長之前，曾先被任命爲內蒙黨務特派員，當時雖然已將內蒙古國民黨納入中國國民黨，並成立中國國民黨內蒙古黨務指導委

員會，但原有的內蒙古國民黨各盟旗地方黨部組織，並沒有體認到原來的內蒙古國民黨已經解散並改組的事實，仍然以舊名稱繼續運作，這種活動是失去方向、失去目標的活動，可以說是盲目的，也是危險的，所以國民黨中央才需要派出「內蒙黨務特派員」，到各盟旗對原有的內蒙古國民黨地方組織，詳細說明、並重新整合，使之成為中國國民黨內蒙古各盟旗的地方組織，這是一份很艱巨而且是吃力而不討好的工作，但先生不畏艱難，以苦幹實幹精神努力以赴，終於圓滿完成任務，內蒙古各盟旗既然已經有了國民黨組織，相對應的國民黨中央也應有專責處理內蒙黨務的單位，因此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才會設置蒙藏組織科，其所以蒙藏並列者，一則配合國民政府行政院下有蒙藏委員會，其次蒙古與藏族聚居區（含西藏、青海、西康、四川一部分、甘肅一部分、雲南一部分）都信仰喇嘛教（但青海有部分地區為信伊斯蘭教，而且有部分地區是蒙、藏、回等民族聚居處），因此把蒙藏並列，雖不盡合適，卻也無太大不妥。

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之下設蒙藏組織科，由先生出任科長，這是中國國民黨內部有關蒙藏邊疆組織的開始，可以說一切從零開始，李永新先生自己是東部蒙古族，精曉蒙、漢語而內蒙古國民黨及內蒙古國民革命軍活動多在西蒙，所以先生對蒙古實際情況及蒙古問題，自有深刻瞭解，但對西藏問題，則較為陌生。按西藏在清雍正時正式納入中國版圖，且派有大臣駐藏辦事，在西藏重要地點，也派兵駐防（見趙志忠，《清王朝與西藏》，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 年），其為中國領土，無庸置疑，且自第六世達賴喇嘛起，歷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認證、坐床，都需中國中央政府之核定，並且予以冊封。但自清末十三世達賴喇嘛受俄籍布里雅特蒙古間諜喇嘛道爾吉（或作德爾智、佐治野夫、道濟也夫、羅桑姑馬…等多個化名，其非善類，不待贅言）蠱惑、煽動而有離中、親俄、反英思想，而當時英印政府對西藏步步進逼，便迫使十三世達賴喇嘛離中、親俄由思想進而付諸行動。1904 年英軍入侵拉薩，十三世達賴逃往外蒙古，原意想進入俄境，接受俄國保護，但是年發生日俄戰爭，俄國戰敗，不敢接納十三世達賴，又為急於想返回藏地，不惜一改反英立場，轉而親英，民國二年且宣稱獨立，從此西藏與中央形成若即若離局面，直到北伐成功奠都南京，中國前景展現光明時，與西藏始有若干接觸，但進展緩慢。國民黨成

立蒙藏組織科時，西藏情勢仍然錯綜複雜，先生接掌蒙藏組織科後，首要之務便是要設法瞭解西藏方面歷史概況與現實情勢。

要瞭解歷代西藏中央的關係，原本就是一項艱巨的課題，甚至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西藏與歷代中央政府的關係，有些問題，仍有待更多文獻與學界的研究，始能作進一步的釐清。先生接掌國民黨蒙藏組織科時，在文獻、人才兩缺的情況下，不可能期望能有多大突破性的成就，更何況英印政府仍對西藏虎視眈眈，想方設法要把西藏從中國版圖中劃出，成為英帝國的屬國或印度的土邦。當時的情況頗不樂觀，但先生從未氣餒，一本勇於任事的精神，積極從事對西藏方面的研究與實務工作，由於資料的不完整，不敢確定西康藏族意見領袖格桑澤仁是否經先生聯繫努力而傾向國民黨（格桑澤仁曾著有《邊人芻言》一書，表達藏人的看法，頗具價值），但是我仍有理由推測先生與之必有聯繫，宣達《三民主義》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政治主張。當年仍處於訓政時期，以黨領政乃是常態（不宜以今日眼光、標準衡量當年制度），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經行政院核准備案之《修正西藏駐京辦事處組織大綱》（此項《大綱》共有十八條，詳見劉學銚編輯《民國以來蒙藏重要政策彙編》，蒙藏委員會，2001年，頁 51~53），同年又核定准予備案之《修正西藏駐平辦事處組織大綱》、《修正西藏駐康辦事處組織大綱》以及多項與喇嘛轉世、喇嘛寺廟管理有關條例或辦法（均詳見《民國以來蒙藏重要政策彙編》），這幾項有關西藏之辦法頒布，國民黨蒙藏組織科在幕後奔走斡旋無疑功不可沒，但以先生處事向來低調、不喜爭功的風格，因此對這幾個有關西藏事務法案之通過，鮮少有人提到國民黨蒙藏組織科之作用，此也正是先生腳踏實地默默耕耘以勤補拙有以致之。

民國二十六年（1937 年），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改組為中央組織部，同時蒙藏組織科也改組為邊疆黨務處，仍委先生為處長，處內分設兩科，為指導科與編譯科，指導科初由何兆麟任科長，稍後由趙石溪繼之；編譯科則由史秉麟任科長（史氏內蒙古卓索圖盟土默特旗人，字季高，行憲後任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兼蒙藏委員會委員）。是年日本全面侵華，中國被迫起而抗戰，以南京失守，遷都重慶，中央黨部也隨之西徙，內蒙古東部各盟旗大多落入日本控制之下，有部分懷有野心之蒙古貴族妄想藉

日本之力建立內蒙古政府，如錫林郭勒盟西蘇尼特旗（或稱蘇尼特右旗）扎薩克德穆楚克棟魯普郡王（袁世凱時對蒙古王公普遍晉爵一級，遂成爲親王，簡稱德王），結合有內蒙才子之稱之吳鶴齡（字梅軒，1949 年來



德王

台）及擁有蒙漢騎步兵之李守信，投向日本，先於 1936 年宣布成立「蒙古軍政府」（其時尚未宣布全面抗戰，但日本已侵占東三省建立傀儡式的所謂「滿洲國」，昭烏達、卓索圖兩盟也在日本勢力控制之下，錫林郭勒盟危在旦夕），及至民國二十八年（1939 年）改組爲「蒙古聯盟自治政府」，重要職位全操在日本人手中，這個「政府」俗稱「蒙疆政府」，妄圖「統一」全內蒙，「恢復」成吉思汗大蒙古國的「志業」。因此當時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阿拉善和碩特、額濟納舊土爾扈特

特別旗情勢岌岌可危，國民黨邊疆黨務處一方面既要在未被日本占領地區積極推展黨務，以激勵蒙古奮起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在被日本占領地區發動策反等敵後工作，可說是任務繁重，但先生舉重若輕，在上述兩方面都卓然有成，備受歷任組織部長陳立夫、張厲生、朱家驥、陳果夫諸先生之贊賞及倚重，而且充分授權，盟旗地方黨部的經費與人事均由先生全權處理，若非先生一向廉潔自持、大公無私，何能獲得如此之信任。

當時中央黨部對各省市黨部主任委員、委員，一般都由中央組織部部長親自遴定，但對蒙古盟旗黨部主任特派員，特派員，則授權由先生簽准派任，等於就是由先生決定了內蒙各盟旗黨部的人事，這是莫大的信任，但同時也是莫大的責任，至於經費只要先生與黨中央秘書處會計主管提出需求，無不如數核撥，這些都是長年無私、清廉換來的信任，先生晚年兩袖清風，可以證明其廉潔自持，設若當年黨、政、軍各界都能如先生一樣廉潔無私，相信不致山河易色退守台灣。

抗戰軍興後，東蒙地區大部分落入日寇之手，爲在淪陷區蒙古各盟旗

佈建反日種子及增強敵後乃至後方蒙古各盟旗抗日力量，成立蒙古各盟旗黨部有迫切之必要性，先生請准設立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各省境內蒙古盟旗黨部，隨即選定各黨部的負責人，經核定後（事實上只要先生所提名之人無不照准），命各該人迅即赴任，並展開工作，計有遼寧省境內哲里木盟旗黨部主任特派員金崇偉（金氏後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兼蒙藏委員會委員）、熱河省境內昭烏達盟、卓索圖盟盟旗黨部主任特派員薛興儒（薛氏後任第一屆立法委員）、察哈爾省境內錫林郭勒盟、察哈爾盟（察哈爾原為部，民國二十三年改為盟）盟旗黨部主任特派員于德純，綏遠省境內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吐默特特別旗盟旗主任特派員先由劉廉克出任，繼由趙城璧執掌，阿拉善和碩特特別旗直屬區黨部主任王枕華（後為第一屆監察院監察委員），額濟納舊土爾扈特特別旗直屬區黨部主任汪漪之；此外，張秉智（第一屆監察委員）、許占魁（第一屆立法委員）、札奇斯欽（第一屆國大代表）、胡格金台（第一屆國大代表），于榮寰（來台後任立法院專門委員）、旺克琪等，均曾擔任各盟旗黨部重要職務，而這些蒙古俊彥，都是經由先生提請任命出任黨職，渠等後來得以出任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則與其時擔任黨職，應有相當關係。

抗戰勝利還都南京後，先生曾代表國民黨中央視察全東北地區，以省而言有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之後東北遼、吉、黑三省改設為九省，為原三省之外，有遼北、合江、嫩江、松江、安東及興安六省），以蒙古盟部旗而言有：卓索圖盟、昭烏達盟、哲里木盟、呼倫貝爾部、布特哈部、伊克明安特別旗，視察這些廣大地區的黨務，卓索圖盟既在他視察範圍之內，他以中央代表身分蒞臨，可說是位高望重，依理他應該要回到老家喀喇沁旗探視高齡的父母，也可以帶給父母莫大的榮耀，然而先生卻過家門而不入，他的理由是：一沒有時間，二怕人家說「假公濟私」，先生這種憂讒畏譏、謹慎小心，公而忘私，正是先生人格上的另一特質，很值得後人效法。

二、推行邊疆語文文化

先生擔任邊疆黨務處處長期間，除了上述純黨務工作之外，蒙古、西藏、新疆等邊疆文化教育工作，也作出令人驚艷的貢獻。按以往蒙文、藏文、維吾爾文對許多漢文名詞的翻譯，常因人而異，這對宣達中央政令或

發展蒙古、西藏、新疆文化、教育，都是障礙，先生有見及此，認為審訂統一蒙文、藏文、維吾爾文名詞翻譯是一重要工作，隨即將其重要性向上呈報，旋准予成立蒙藏維語文研究委員會，其業務由邊疆黨務處編譯科負責辦理，民國三十年前後，以此工作極為繁重，改稱為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在表面上使其不隸屬於邊疆黨務處，以便提高其位階，而易於延攬學者專家參與此項工作，並且由組織部部長朱家驛兼任此一委員會之主任委員（來台後朱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聘任顧頡剛、韓儒林為副主任委員（以上二人為知名史學家），又禮聘專任及兼任編譯委員若干人，分為蒙文、藏文、維吾爾文三組從事編譯工作，另設秘書一人，先後參與蒙文組的編譯委員有白雲梯、樂景濤、杭景壽、戴清廉、伊德欽、白鳳兆、吳雲鵬（後為第一屆立法委員）、趙文儒、金淑慧、海永溥、江海清、陳翊周、蕭紹何、白潔琛等精通蒙漢文人士。參與藏文組的編譯委員有喜饒嘉措、李春先、歐陽無畏（來台後任國史館處長，並在政治大學教授藏文）、楊質夫、李全福及康朗柱等藏漢文專家。參與維吾爾文組的編譯委員，有麥斯武德（其後曾任新疆省主席）、艾沙、伊敏等（可惜此二人後來都成為「疆獨」分子）；以上這些編譯委員可說都是一時之選，尤其副主任委員顧頡剛曾主編《古史辯》巨著，享譽學界，另一副主任委員韓儒林留學德國，對蒙古史有深入而獨到的研究。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每月編印蒙藏維文刊物一冊，該委員會秘書由邊疆黨務處編譯科科長史秉麟先生兼任，故對許多人名敘之甚詳（以上多參考史秉麟《李永新先生事功》一文，文載《李永新先生紀念集》，頁 167~182）。這項工作初視之，似乎無關大局，其實此項工作深具歷史意義，中國主張五族共和、民族平等，而蒙古、西藏、維吾爾（古稱回紇）都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也有許多以蒙文、藏文、維吾爾文所撰就的歷史文獻，這些都是中國民族的文化瑰寶，不能任其流失，而漢文文獻也需譯為蒙、藏、維文，唯有如此才能促進五族共和，才有所謂民族平等，這是一項深具歷史意義且具有文化教育性的工作，李永新先生在忙於黨務之時，能考慮及此，可見其對文化教育是相當重視，先生雖不是學界中人，但對學術之重視、提倡及落實，均不亞於任何知名學者，益發顯得不平凡。

三、籌劃邊政措施

抗戰初期也即民國二十七年，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陳誠（來台後曾任台灣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副總統兼行政院長）聘先生為設計委員，當然是因為先生為蒙族俊彥，而當時東部內蒙古已在日本勢力籠罩之下，德王附日「蒙疆政府」傀儡組織即將成立；西部內蒙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吐默特特別旗（與綏遠省在同一地區）情勢岌岌可危，但內蒙自治問題也方興未艾，問題相當複雜，如何勸阻烏、伊兩盟各旗蒙人不受德王影響，進而激發蒙古族人奮起抗日，實為當務之急，先生受聘以還，即提出許多建言，當時中央與烏、伊兩盟各旗首長之多所聯繫、派員到烏、伊兩盟旗宣慰蒙人，激勵阿拉善和碩特、額濟納舊土爾扈特兩特別旗蒙人支援前線等貼近蒙人之措施，多出自先生之建議，而此等措施也確實收到預期效果。

四、協助成陵西遷

元太祖成吉思汗開疆拓土，創建人類有史以來疆域最廣袤的大帝國，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其豐功偉蹟震古爍今，不但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帝王，更是全世界各地區蒙古族心目中神聖不可侵犯的先祖，雖然逝世後採



秘葬方式，其真正的陵寢所在至今仍是個謎，但在伊金霍洛的成陵（衣冠塚）至今仍是各地蒙古族人心目中的聖地，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一日各地蒙人都會到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寢致祭。抗戰期間，內蒙古德王附日，妄想奪取成吉思汗陵寢，以便藉此

號令全部蒙古族人，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秋，日本陸軍省邀請德穆楚克棟魯普、李守信、于品卿、夏恭這一批附日分子（都是蒙疆聯合委員會成員）赴日訪問，德王在一次單獨會見坂垣征四郎時，提出要攻奪成陵的想法，說明只要奪得成陵，各部蒙古必會俯首聽命，此說一提出，坂垣

征四郎立即贊同，其所以贊同者，乃是想將成陵運到日本展出，一則一雪元世祖忽必烈曾經多次派船艦攻打日本之恥，再則藉此號召所有蒙古族人降服於日本。於是日本與德王遂有了奪取成陵的計畫，不料事機不密，被一個留日的內蒙古青年無意中聽到此項消息，趕忙返回內蒙古伊克昭盟（成陵所在地伊金霍洛屬伊盟）盟長沙克都爾札布郡王報告。沙王既是伊盟盟長，也是綏境蒙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守護成陵不但是伊克昭盟的神聖天職，也是伊盟盟長沙克都爾札布的莫大榮幸，得知德王竟敢甘冒大不諱作民族罪人，夥同日寇前來奪陵，既憤怒又畏懼，沙王不能忍受在他任內成陵遭到任何損失，但也深知憑伊盟之力，絕對無法抵抗德王與日寇的武力攻擊，必得向中央求援，於是不辭年邁，於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元月十九日翻山涉水奔向重慶，於元月底到達陪都，向國防最高委員會詳細敘述始末。可是當時國民政府初遷重慶，一切都還未上軌道，對日本欲盜奪成陵一事，並未十分重視（關於德王與日本之欲盜奪成陵一事詳情，可參見蔡桂林《成吉思汗靈櫬西遷紀實》一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另德穆楚克棟魯普所撰《偽蒙古軍成立前後》及《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始末》二文，也提到盜陵之事，該二文輯入《內蒙古文史資料》第六輯，頁143~229，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另劉學銚《成吉思汗陵寢的遷移與中樞致祭成陵》一文也詳述此事始末，該文輯入劉著《少數民族史新論》，台北南天書局，2011、2014年兩度出版）。沙克都爾札布郡王曾親撰《成陵危在旦夕，呈請最高當局謀計保護》的書面報告，但一時之間最高當局無暇加以處理。沙王係伊克昭盟盟長，十多年前先生在西蒙任內蒙古國民革命軍旅長，而且又同為蒙籍人士，兩人必係舊識，何況成陵乃是蒙人心目中之聖地（物）不容侵犯，沙王既到重慶，而先生又是國民黨中央蒙藏邊疆事務之主管，兩人不可能未就此事有所洽商。成陵對蒙人之重要性，沙王與先生看法完全一致，中央既未將此事排上議事日程，免不了由先生居中奔走、呼籲，吳忠信（禮卿）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氏與最高當局蔣介石私交頗篤，我們有理由推測，先生曾向吳忠信訴說成陵對蒙人、對整個抗戰前途之重要性，吳氏對邊疆問題頗有認識，因而安排沙王進見蔣介石，蔣氏終於在官邸接見沙王，沙王本諸蒙古民族豪邁之氣與三寸不爛之舌，說服蔣委員長，決定

移陵。這中間李永新先生必然出了許多力氣，只是先生爲人向來低調、從不與人爭鋒，以致有關成陵遷移諸多文獻，都未提到先生，然則我們以常情推論，先生當時在國民黨主管蒙藏邊疆事務單位任職，又是蒙古籍，成吉思汗陵寢遷移之事豈可能不參與？

成陵遷移既成定案，時行政院長孔祥熙裁示由蒙藏委員會會同伊克昭盟盟長沙克都爾札布郡王，擬定妥適地點後即行遷移，雙方幾經研商，最後決定暫移甘肅省榆中縣（今甘肅省蘭州市榆中縣）之興隆山，其所以遷往興隆山者，據沙王說有其歷史淵源，按興隆山原本就是甘肅省風景勝地，其東是榆中川，西則爲蘭州屋脊馬後山，牧草豐美，山巔有兩處火山口，其中蘊積清澄的礦泉水；南北都是崗巒起伏的山丘，芳草如茵，喬木、灌木參差其間，形成一座天然牧場，自古以來這裡就是各游牧民族拼死爭奪的好牧場。西元 1221 年（南宋寧宗趙擴嘉定十五年、宣宗完顏珣元光元年），成吉思汗命大將者別等率大軍北越高加索入阿蘭部占領欽察草原的同時，成吉思汗親率大軍討伐西夏，就駐軍於榆中馬後山麓的馬蓮灘，當時就深感此處水豐草美、景色宜人。四年之後，也即西元 1226 年秋，成吉思汗又親率大軍伐西夏，在攻克甘州之後（今甘肅張掖），部眾在阿爾布和草原上追逐野馬取樂，時已高齡七十一歲的成吉思汗不幸墜馬受傷（關於成吉思汗生年有各種不同說法，此處採生於西元 1155 年之說，是此年爲七十一歲，如以虛歲計，則爲七十二歲），而且傷得不輕，經部將提議到興隆山暫住，因興隆山盛產各種草藥能治百病，山上佛、道寺廟頗多，成吉思汗選了一座「眼光殿」，他命部屬在殿旁搭建帳篷，也即俗稱的「蒙古包」住下。部將問何以不住進眼光殿？成吉思汗說：我生於蒙古包、長於蒙古包，此生已與蒙古包連爲一體，再說此殿爲佛的眼光，如果住進去，豈不是我就沒眼光了？興隆山景色優美，成吉思汗在此養好傷，因此對興隆山有特別感情。這一段故事是沙王對蔣委員長說的，所以就決定將成陵暫移甘肅榆中興隆山太白宮，既經決定地點，遂按計畫進行遷移工作，於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順利移到太白宮，並於七月一日下午二時正式舉行安靈儀式，由甘肅省主席朱紹良主祭並親自誦讀祭文。由於這是首次由政府致祭成陵，具有歷史意義，特將祭文全文引錄如下：

「維中華民國二十有八年七月一日，第八戰區司令長官、甘肅省黨部主任委員兼甘肅省政府主席朱紹良，恭率僚屬謹以香花清酒牲餚之儀，敬祭于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靈前曰：

亘古英雄，民無能名。鳴鋒專征，止戈為武。乃蠻亂德，難逃涿野之誅鋤，遼夏不庭，爰正朔之撻伐。橫絕沙漠，驚雷閃電；縱極獲里，功無與偉。志匡社稷，吞吐山河；武烈文謨，邁古鑠今。是用民族之共戴，亦由我武之維揚。伊金霍洛，靈寢巍然；稍就陵夷，忽遭窺覬。狂倭蠢犯，飛海鷗張；侵占我版圖，奴役我民眾；神州到處，遍染腥膻；文化同胞，備受壓迫。國人齊起，共赴殤難；必遏凶鋒，雖死無二。洎今搏戰，卓絕兩載，敵勢已竊，內外周遮。乃其既敝，磔彼長蛇；還我國土，光復故物。敢告王靈，庶幾克家。神其降止，風馬雲車。今日者，掃一坯之仙塵，俎豆虔供；靖萬國之方輿，河山不改。時屆仲夏典循夏祭，伏冀靈霄雷雨，助華夏之中興；復旦星雲，啟神州之景運。伏維尚饗。」

這一篇祭文可說是文情並茂、鏗鏘有力，這是政府正式致祭成陵之始，民國三十年十月，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氏，赴甘肅視察黨政，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特派吳氏為代表，前往興隆山致祭成陵，並宣讀蔣氏之祭文，其文也極為可觀，且為中樞致祭成陵之始，也特錄之如下：

「維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三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以馬羊帛酒香花之儀，致祭於我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靈，而昭告以文曰：

繁我中華，五族為家，自昔漢唐盛世，文德所被，蓋已統乎西域，而極於流沙，洎乎大汗崛起，武功熠熠，馬嘶弓振，風潑雲擎；縱橫帶甲，馳驟歐亞；奄有萬邦，混一書車；其天縱神武之所肇造，雖歷稽往古九有之英傑，而莫之能加。比者蝦夷小醜，虺毒包藏，興戎間鼎，豕突猖狂；致我先哲之靈寢，乍寧處而不遑。中正忝領全民，撻伐斯張；一心一德，慷慨

慨騰驤；前仆後興，誓殄強梁；請聽億萬鐵馬金戈之凱奏，終將相復於伊金霍洛之故鄉。

緬威靈之赫赫天倉倉，撫大漠之蕩蕩兮風泱泱修精誠以感通兮，興隆在望；薦馬胙而陳醴漿兮，神其來嘗。

尚饗。

這也是一篇極富文彩的佳文，此後有十多年中央未曾致祭成陵，在政府遷台後，由來台蒙籍民意代表（時先生為立法院立法委員）要求中央繼續舉辦成陵祭典，自是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一日中樞均舉辦致祭成陵大典，總統均指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代表致祭，先生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當然也會代表總統致祭成陵。

五、協助設立邊疆學校、聯絡邊族俊彥

有清一代的邊疆政策，從制度上看，似是最稱完備，但其基本精神是採民族隔離措施，如禁止蒙古民族學習漢語、取漢名，禁止蒙漢來往，對維吾爾、藏人也復如此，因此無論內外蒙古、青海、西康、西藏，基本上都沒有所謂教育設施，直到清末，內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札薩克貢桑諾爾布親王才以私人出資在王府辦了一所學堂（崇正學堂），後來又辦一所毓正女子學堂，不過都只十幾二十名學生，教授蒙漢文。民國肇建之初，由於北洋軍閥割據，在內蒙古等地區也談不上興辦教育，北伐完成奠都南京後，全國形式上宣告統一，才開始注意到各項建設，但注意力仍未及於內蒙古、西藏等邊疆地區。直到國民黨在中央組織委員會下設立蒙藏組織科，之後前者改組為組織部，後者擴大為邊疆黨務處，由先生擔任科長及處長，深知教育為一切的根本，要提升蒙藏等邊疆民族地位，必須從教育著手，這是極其正確的看法，可見先生做事之深謀遠慮，不會急功近利只做表面工夫。教育是樹人的工作，非長期耕耘不可，經過先生的努力呼籲，當時是「訓政」時期，以黨領政乃是常態，其時國民黨內設立了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同時教育部也設立了「國立邊疆文化教育館」乃至邊疆教育司，專責發展邊疆文化、教育。

據劉廉克展一先生前引專文稱：「國立拉薩小學是國民政府設於西藏的第一所學校，這所學校的設立，在表面上似與邊疆黨務處無關，是教育

部和蒙藏委員會協力合作的結果，但在實際上，它正是邊疆黨務處多年努力的一項總的成就。而先生爲人向來不提個人的成就，這種功成不居，又是先生的一種人格特質，這種但開風氣不爲師、成功不必在我的謙遜態度，令人景仰。

先生在邊疆黨務處處長任內促請教育部在內蒙古地區設立學校，當時教育部長爲陳立夫先生，陳氏原爲國民黨組織部部長，正是先生的頂頭上司，對先生處事態度與操守都極信任，認爲先生所提的意見，確爲有利於國家、民族，因此都予以同意，計設立有：國立伊盟中學；此外不經教育部，由邊疆黨務處直接設立的學校主要有：拉卜楞職業學校，拉卜楞在甘肅南部，爲藏族聚居地區；松理茂職業學校，松理茂是三個縣，在今四川省北部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松潘縣、理縣、茂縣。無論拉卜還是松、理、茂都是相當邊遠的地方，一切都相當落後，在這些地方設立職業學校確屬必要，可見先生處事確實針對需要，目的是在提高邊遠地區藏族青年受教育機會，並學得一技之長，有利於謀生，這是高瞻遠矚的工作，也是給釣竿的工作。對於設立在蒙古地區的學校，如國立伊盟中學，其校長由邊疆黨務處推薦，由教育部任命；在藏族地區所設立的職業學校，其校長則直接由邊疆黨務處任命。先生是希望透過教育宣達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理論，以達成五族共和建立中華民族的目的，這也是從最基本處落實三民主義理念，先生做事，向來是按部就班腳踏實地，一步一腳印，絕不好高騖遠。

抗戰期間最需要的是全國各民族團結，以凝聚力量，因此聯繫、團結邊疆各民族，增強全民各族抗戰力量，就成爲邊疆黨務處的另一項重要工作，當時蒙古、藏族、維吾爾等邊疆各少數民族俊彥，多聚集重慶展現全民各族抗日氣勢，先生在其間奔走聯繫更是功不可沒。

肆、議壇參政

中華民國係由各民族共同建構而成，各民族都是中華民國的主人翁，都有權參政，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元年（1912 年）九月一日，在北京「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講演時曾明白說：

「今我共和成立，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壓制

於一部者，今皆得為國家主體，皆得為共和國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國家參政權。」

但中山先生讓位於袁世凱後，袁氏竟欲帝制自為，自是將國民參政權置之不理，之後北洋政府為軍閥所把持，也無國民參政之空間，直至國民黨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奠都南京全國統一後，始從頭探討國民參政權問題，依照中山先生所定中華民國建國程序、依次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而且不排斥蒙、藏、維、滿、回、苗、僂……等任何邊疆少數民族參政，換言之，國內任何民族皆有參政之權，如民國元年八月十日公布之《參議員選舉辦法》，其中有關邊疆各少數民族的條款為：

(一) 第三章「蒙古及青海」1.名額分配：哲、卓、昭、錫、烏、伊、土（指外蒙古土謝圖汗部）、車（指外蒙古車臣汗部）、三（指外蒙古三音諾彥部）、札（指外蒙古札薩克圖汗部）等各盟部及烏梁海各二名，科布多及舊土爾扈特、青海各三名，阿拉善、額濟納兩旗各一名。2.蒙古青海選舉會以各王公世爵或世職組織之。

(二) 第四章「西藏」，1.名額分配：前後藏各五名。2.西藏選舉會由達賴及班禪會同中央駐藏辦事長官遴選相當人員，分別於拉薩及札什倫布組織之。

同日又公布《眾議員選舉法》，其中有關邊疆之條款為：

(一) 第三節「蒙古、西藏、青海議員之選舉」，其名額與參議員同。

(二) 參眾議員候選之資格，其有值五百元以上之不動產者，於蒙藏青海得就動產計算之，但需通曉漢語。經依據此項規定辦理選舉結果，參議員部分計蒙古有阿穆爾靈圭等二十四人，青海有洛藏達等三人；眾議員部計蒙古有富勒渾等二十七人，青海有花力旦等三人。其後西藏選出參議員札希土噶等七人，眾議員一喜託美等八人。

可見從中華民國肇建伊始，就主張並實踐全民各族都有參政權，其後

北洋政府以軍閥把持，多次更迭，以致未能落實國民參政權；及至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制定憲法草案（即習稱之《五五憲草》）時，其中明列蒙古、西藏為中華民國固有疆域外，並在相關條文中明定國民大會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員、監察院監察委員應有蒙古、西藏等邊疆少數民族之名額。次年（1937年）日本就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實施憲法時程，不得不向後推遲。稍後首都南京失守，政府西遷，至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中央依據抗戰建國綱領，組織國民參政會，以期團結全國力量、集中思慮與見識，而利國策之擬定與執行，遂由國民政府公布《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其中第三條有關蒙藏之規定，其條文為：

「國民參政會置參政員，總額一百五十名，其分配如下
 （原文『下』字為『左』，為適應橫排，改為『下』字）：(一)
 略。(二)由曾在蒙古西藏地區公私機關或團體服務，著有信望，
 或熟諳各該地方政治社會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員中，選任六
 名，蒙古四名、西藏二名。」

可見政府雖在抗戰期間，仍注意到國民參政權利，而且也顧及到蒙古、西藏應分配之名額。

一、任國民參政員

國民參政會既經成立，也定有蒙、藏應分配之名額，抗戰期間國民參政會共有四屆，每屆蒙古參政員四名，其名單如下：倉吉周威古、榮祥、何永信、李永新、金志超、榮照、阿福壽、蘇魯岱、迪魯瓦呼圖克圖（呼圖克圖俗稱「活佛」，迪魯瓦係外蒙古三音諾顏部活佛，1924年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圓寂，在蘇聯操控下，將外蒙古改設為「蒙古人民共和國」，迪魯瓦呼圖克圖不滿外蒙古被赤化，逃到內地，至1949年被美國情報單位接去美國）、齊木公旺扎勒拉布旦、席振鐸等多人（其中有連任多屆者），藏籍方面有：喜饒嘉措、丁傑呼圖克圖、羅桑扎喜、阿旺堅贊、拉敏益喜楚臣等多人。先生之出任國民參政員，不是因為他是國民黨邊疆黨務處處長，而是因先生是蒙古族俊彥，而且先生連任四屆國民參政員，可見他對國家、對國民黨之忠誠，不僅如此，當國民參政會休會期間，先生還是執行常務的駐會參政員。當時國民參政會是集全國各黨各派

領袖、各民族俊彥、地方意見領袖、社會賢達於一堂的政治組織，舉凡政府重要措施，都要經過國民參政會討論通過後，才能付諸實行，可見國民參政員有極高的政治與社會地位，可是先生從未以此自矜，更不會以此向人誇耀，這與他一向低調、謙沖的人格特質完全符合。

國民參政會是一個一百多人的合議性政治性組織，俗語說：人一上百，形形色色，也就是說多口雜，更何況國民參政員每個人都是一時之選，對每件事情都沒有看法，每當政府提出一項政策或法案交國民參政會時，總會遇到各種不同意見的阻撓。由於先生本職是邊疆黨務處處長，自然要負起溝通、協調的責任，而所謂邊疆，絕不於蒙藏兩族，舉凡東北四省（遼、吉、黑、熱四省）、察哈爾、綏遠、寧夏、甘肅、新疆、青海、西康、雲南、貴州等省都在邊疆範圍之內，都要先生出面協調、溝通乃至辯論。先生一向不以口才見長，但是為了政府，為了國民黨，先生都能據理陳說、展現了辯才無礙的一面，都能達到政府、黨交給他的任務，或許這也是先生連任多屆國民參政員的一個原因。先生雖然為政府、為黨的政策，盡力與各方面斡旋，但是他從未忘卻為邊疆少數民族力爭合法的權益，只是先生低調，因此外界鮮有知者。

二、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中華民國全國軍民經過八年浴血抗戰，自民國三十二年起逐漸扭轉局面，而日本的攻勢，也已如強弩之末，敗象已漸顯現，及至民國三十四年，美國在日本本土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舉國上下在歡欣鼓舞之餘，要求制憲之聲又起，政府為俯順民意，乃就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國民政府公布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加以補充，按原辦法關於蒙藏代表之選舉，其選區及應選名額之分配，作如次之規定：

甲、蒙古選出之國大代表，由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青海左翼盟、青海右翼盟、察哈爾部（按察哈爾部於民國二十三年頒布《蒙古自治原則八項》時已改為盟，此處仍稱為部，可見其辦事人員之不經心）及阿拉善特別旗、額濟納特別旗、土默特特別旗選出者九名；由巴圖塞特奇勒圖中路盟、烏拉恩素珠克圖四路盟及青塞特奇勒圖盟選出者三

名；由哲里木盟、卓索圖盟、昭烏達盟、呼倫貝爾部及伊克明安特別旗選出者五名；由其他蒙古各盟部旗選出者七名。

乙、西藏選出之國民大會代表，由在西藏地方有選舉權人選出十名；由在其他省區內有選舉權之西藏人民選出者六名。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進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時，即將上項選舉法加以補充，是為補充條例，其補充之處為額濟納特別旗、安多藏各增加一名，於是蒙古、西藏之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共有四十二名。以上四十二名蒙藏制憲國民大會代表，除依補充條例新增蒙、藏各一名，由國民政府遴選產生外（國民政府遴選，事實上就是由國民黨邊疆黨務處提出名單，經國民政府發布，時先生仍為邊疆務處處長），其餘四十名，均由選舉人選舉產生，包括蒙古二十四人、西藏（含內地省區藏人）十六人，而蒙古二十四人中有二十人，已於民國二十六年依法選出，其未選出者僅在新疆各盟三人及錫林郭勒盟一人而已，經國民政府依選舉法第五十七條規定予以指定，另依選舉法第二十八條第一款，烏蘭察布盟選出之代表一名，因附逆而註銷名籍，同條第二款也有代表一名附逆、一名死亡出缺，而無候補人可資遞補，均由國民政府遴選補充（當然也是由邊疆黨務處提供名單）；至於西藏籍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十六人，其中六名已於民國二十六年由其他省區選出，但延至民國三十五年，原選出之代表大部分死亡或返回西藏，無法出席制憲國民大會，復經蒙藏代選舉事務單位轉據班禪行轅另行推薦候選人，報經選舉總事務所轉呈國民政府予以遴選，其應由西藏地方選出之十名制憲國大代表，因故未選出，均連同選舉補充條例所增加之額濟納特別旗及安多藏區代表各一名，統由國民政府依法遴選，茲將選舉與遴選結果名單引錄如次：

甲、蒙古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吳雲鵬、雄諾、奇全禧、索南扎布、蘇呼得力、陳愛爾德尼
巴圖、賈鴻珠、經天祿、拉德那伯德、喬嘉甫（原當選人呂
樂甫因病辭職，經國民政府遴選喬嘉甫遞補，並於三十五年
十一月十六日明令公布）、烏靜彬、李永新、白瑞、劉踪
萍、巴文峻、白雲梯、卜文林、榮照、白鳳兆、陳效藩、李

春霖、多爾吉、金志超、達瓦。

乙、西藏選出之制憲國大代表：

圖丹桑批、索朗汪堆、土丹桑布、策汪頓珠、土丹參烈、土丹策丹、圖登生格、絳巴阿汪、益喜達結、多吉歐珠、計晉美、拉敏益西楚臣、蔡仁團柱、宋之樞、何巴敦、滇增堅贊、黃正清。

先生除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外，在許多遴選代表遴選過程中，先生以邊疆黨務處處長身分，必然對遴選作業提供頗多意見，這是許多人從未想到者。復次，當年制憲多以民國二十五年之《五五憲草》為藍本，但畢竟事隔十年，客觀條件有頗大改變，如制定《五五憲草》時（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在法理上外蒙古仍為中華民國領土，此因民國十三年中俄簽定《中俄解決懸案大綱》時，蘇聯仍承認外蒙古屬中華民國所有，但民國三十五年元月五日，中華民國受制於前一年與蘇聯簽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已公開承認外蒙古獨立，因此民國三十五年制憲時，對中華民國領土之規定改採模糊、概括式之描述，其條文為：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列現行《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

按制憲時，中華民國已公開承認外蒙古獨立，照理說制憲時外蒙古已非中華民國領土，但憲法條文中之「依其固有之疆域」，從語句上看，既是「固有」，顯然包括外蒙古在內，否則大可寫為「依其現有之疆域」，其所以作模糊、概括之描述者，顯然是在為後代子孫留下一個窗口，據此可以想見，當年制憲時對此條文必然有極大的討論與爭執，先生既是制憲國大代表，又是蒙古籍，更重要的是先生是國民黨邊疆黨務處處長，當年在制憲會場必然多方協調、溝通，才定下如上的條文，可惜目前無法找到制憲時所有檔案，否則應可進一步瞭解當年先生是如何協調溝通，以及現行憲法第四條有關領土的條文，是在何種情形下定案的。

三、立法院議政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完成制憲，民國三十六年元旦公布中華民國憲法，並依憲法相關條文規定，產生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立法院

立法委員及監察院監察委員，結束訓政時期，正式進入憲政時期。依照憲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蒙古選出國民大會代表為每盟四人、每特別旗一人，總額為五十七人，其中應有婦女保障名額六人；依照憲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立法院蒙古籍立法委員由各盟旗選出二十二名；依憲法九十一條規定監察院蒙古籍監察委員可選出八名，依此規定選舉之第一屆國民大會蒙籍代表名單如下（西藏部分從略）：

金崇偉（隨政府來台）、包晉祺、白尚勤、楊立君（隨政府來台）、史秉麟（來台）、白海風、蘇崇阿、邢復禮、白雲梯（來台）、卓力格圖、烏爾貢布（來台）、篤多博（來台）、阿格棟噶、札奇斯欽（來台）、超克巴圖爾（又名陳紹武）、伍雲格爾勒（來台）、巴雲英、都格爾札布、寶德巴子爾、拉布色拉朝珠爾、奇忠義、賈文華、汪震東（又名達爾濟旺楚克）、奇文卿、俄羅布仁慶、官寶嘉、札喜才讓、張承邦、戴海蘭本、陳秉淵、才仁加、安吉卓瑪、格恩當德爾、達瓦、道爾吉、杜固爾（來台）、西謀珍、策丹多爾濟、賈自信、魯宗札木甦、易西、海玉祥（來台）、愛力克巴依爾、恰克德、關蔭南、榮寶麟、陳那筭巴圖、牛頓、胡格金台（來台）、紀效威（來台，後因故取消資格）、達格瓦敖斯爾、何兆麟、趙城璧（又名烏雲畢利克）、胡鳳山、樂竹芳（又名巴音比利格）、郭木佈札普、紀貞甫、倪純義（來台）、多淑秀。

依照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規定，國大代表選舉時，同時選出候補人（每盟、特別旗可以四位候補人，也有不足額者），遇到代表出缺時，可以依次遞補，為節篇幅僅列來台後候補上者計有：劉廉克、史耀青、賽春阿、阿谷墨爾根。

第一屆立法院蒙古籍立法委員依規定應選出二十二名，經全部選出其名單如下（西藏部分從略）：

德古來（來台）、白蓮貞、許占魁（來台）、金養浩（來台）、白大誠（來台）、李永新（來台）、薛興儒（來台）、吳雲鵬（來台）、楊俊生（來台）、吉利占泰、席振鐸（滯港

未如期來台，遭撤銷資格），巴圖畢力格、榮照（來台）、杭嘉驥（來台）、達穆林旺楚克（來台）、達瓦、齊木公旺札勒拉卜旦、阿福壽、胡海濱、喬嘉甫、烏靜彬、汪鵬程。

依規定立法委員也有候補人，來台初期曾候補李清一名，其後就停止候補。

至於監察院監察委員，依憲法規定蒙籍應選出八名，其名單如下（西藏部分從略）：

摩爾根、張秉智（來台）、于德純、奇世勳、任秉鈞、王枕華（來台）、龍舟、宮世臣。

監察委員部分沒有後補人。

先生當選第一屆立法院立法委員，以先生當年在國民黨的職務，從提名蒙藏籍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人選，到輔選乃至當選，先生都很難置身事外，例如當選立法委員之許占魁，係卓索圖盟，但卻在伊克明安特別旗當選；監察委員王枕華，也為卓索圖盟，但卻在額濟納舊土爾扈特特別旗當選，這中間一定經過相當曲折的過程，先生必然居中協調斡旋，以當年情況而言，捨先生之外，他人也難有這份「能耐」，然而時過境遷，如今能知其過程者少之又少。

如所周知，國民黨內有派系，尤以陳立夫、陳果夫昆仲最具聲望，俗稱之為 C.C. 派，行憲後立法院內也以 C.C. 派擁有最多席次，在我國立法院如同外國之國會，國會之責任在於監督政府，因此國會與政府基本上是對立的，國會如不監督政府，就是失職，而政府為求便宜行事，或為提高行政效率，往往視國會之監督為干擾行政，雙方對立乃是民主政治之常態，我國立法院等同歐美日各國之國會，則立法院監督行政院施政，乃是理所必然，而行政院對立法院之監督，視為掣肘，此也屬常態。來台後立法院仍以 C.C. 派居多數，而先生到國民黨任蒙藏組織科科長時，中央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正是陳立夫先生（後出任教育部長），因此許多人認為先生是 C.C. 派中人，而且是 C.C. 派「大將」，其實所謂 C.C.、新 C.C. 或新中央等派，從無明確的定義，只不過某些立法委員在理念相近的情況下，對一些法案有共同的看法，於是被歸為某某派，其實他們都是忠於國

民黨，忠於國家。

民國四十七年三月初，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有意以陳誠（辭修）為行政院長，當時陳誠也知道依憲法規定，一旦被提名就得經立法院同意，陳誠自認為大部分立法委員都贊成他出任行政院長，但對所謂 C.C. 派卻頗有意見，在《陳誠先生日記》中，有以下一段記載：

「立委之態度大部贊成余任行政院長，中有一部分人士希望總統予以招待，但亦有分贓式作為投同意票之條者（C.C.），此種風氣絕不可繼續存在，此種行為絕不能接受。」（見《陳誠先生日記》三十九年三月三日。）

同年三月四日，又在日記中記下：

「中午，總裁請元老及黨部負責人員，提出行政院長人選問題，谷正鼎要求假投票，總裁對此極不滿，並謂如黨員不信任他，他可復引退，並說明時局之危急與其決心（余未參加）。

用心之苦，下午五時，總裁請中央常委開話會，…最後提余就行政院為最適當之人選，……首先由居正先生發言，表示贊成；繼由李宗黃發言，認為余一切均勝，惟每出規行事；蕭錚發言，認為余最好專任軍事，邵華認為余不能駕人；谷正綱認為現役軍人不能任行政院長。除以上四人，所謂 C.C. 之死硬派反對外，餘均贊成。余認為余原不願出任行政院長，如有人反對是最好的事，尤其 C.C. 反對，對余個人並無絲毫損失，惟 C.C. 年來對於國家無事不阻礙，對於有為之同志無不反對，殊為可惜耳，真不知死之將至耶？」

從這段日記，可知陳誠對 C.C. 派懷有相當成見，不過其日記所記也有可疑之處，如是日（三月四日）中午，「谷正鼎要求假投票，總裁對此極不滿」，之後又特別標明「余未參加」，則如何知道「總裁對此不滿」？按其時尚未正式提名陳誠出長行政院，就已經對 C.C. 不滿，宰相之肚量何其小也。

及陳誠出長行政院，或許由於心中已有定見，與 C.C. 派立法委員相

處並不十分融洽，或許對國會監督政府，乃是民主政治之常態，未能深入瞭解，也可能在心態上仍有威權思想，對 C.C. 派立法委員不具好感，依據憲法規定，立法委員一旦擔任政府官員，就喪失立法委員資格，因此在不傷和氣，而能使立法委員喪失資格的作法，就是讓立法委員進入行政院擔任政務官，而政務官是沒有任期保障的，可以隨時撤換，這是一個巧門。照理說，立法委員任期為三年，第一屆立法委員於民國三十六年選出，三十九年已就任期屆滿，但因大陸淪陷，無法改選，於是大法官解釋，在未能改選前，可以繼續留任（其後國大代表、監察委員均循例延任），於是許多立法委員有鑑及此，絕不肯出任部會首長，這是政府遷台後的一個政治現象。

或許陳誠唯恐在立法院受到 C.C. 派的掣肘，於民國四十七年七月初行政院局部改組，想到上面說的巧門，預定以李永新出長蒙藏委員會，表面上以蒙人出長蒙藏會是人、職相合，而且又是行政院下八部二會之一，地位崇高，而立法委員多達四、五百人，物以稀為貴，在某種層面看從立法委員轉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部會首長（八部二會之長必須是政務委員）算是「高升」，但是如果從務實的層面看，蒙藏委員會之成立，乃是承襲北洋政府之蒙藏院，而蒙藏院或其前身蒙藏事務局，乃沿續清代理藩部（稍前為理藩院，再早則為蒙古衙門）的部分功能，清代理藩部（院）可以（治）理各藩部（除蒙藏外，回疆的伯克、西南的土司都歸其所管），頗有統理各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功能，而清代是採取民族隔離措施的民族政策，所以北洋時代的蒙藏院（或蒙藏事務局），既不瞭解清代民族政策旨在隔離各民族，以利滿族的統治，也不明白孫中山先生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真義，是要建構中國民族（時稱中華民族，其實此一稱謂，目前兩岸仍在使用，但並不妥適，需知所謂「中華」乃是「華夏」之同義詞，而華夏與夷狄自古便是兩組對立的混合名詞，試想強使夷狄之族或其後裔而為中華，強其承認也是炎黃之胄，其能甘心情願乎？所以稱為中國民族較為中性）的國族意識，因此北洋政府的蒙藏院只是點綴式的機構，不可能期望其能有多大作為。北伐後，國民政府對邊政之無知，一如北洋政府，遂依葫蘆畫瓢，設立了蒙藏委員會，在大陸時期就無甚作為，來台後，蔣介石一心一意要「光復大陸」，維持中國之統一，因此在行政院下仍保留蒙

藏委員會，其目的只是在維持中華民國仍有完整的形貌而已，在八部二會之中，無論預算或員額都是最少的，只是裝點門面的機構，早期其內部職員無一人懂何謂「邊政」者，因此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雖然名位頗高，但既無足夠的預算、可用之職員，不可能期望其能有多大作為，委員長一職，等同清代的「閑散王公」。陳誠局部改組內閣時以李永新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等於在立法院拔掉 C.C. 派的一根大釘子，是穩賺不賠的作法，因此在民國四十七年（1958 年）七月十四日正式發表李永新接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當時也曾有人勸先生應拒絕出任政務官，因為政務官毫無任期保障，而依時大法官的解釋，只要在光復大陸以前，立法委員都可以繼續擔任，其按月所領的待遇與部會首長同，既可以質詢部會首長，又不負任何責任，更沒有需要辦的業務，何苦去接沒有任期保障的委員長？但先生是國民黨的死忠分子，對國民黨總裁，更是絕對服從，認為是總裁要他出長蒙藏委員會，便毅然放棄可長可久的立法委員職位，於四十七年七月十四日走馬上任，結束了長達十一年的立法委員職務。

先生在立法院時期，只要邊政委員會開會，先生從不缺席，也曾多次提出質詢，從立法院邊政委員會會議紀錄中可以看出先生質詢的重點都偏重於蒙藏青年的教育，如當年政府恢復舉辦公費留學考試，先生在質詢中要求保留蒙藏生名額（當時並沒有藏籍大學生），結果政府採納了，首次獲得公費留學的是劉廉克的女公子。此外，依當年全國公務人員高等考試辦法規定（在大陸時期訂定），是按各省分配錄取名額，但未列蒙藏族應分配名額，對蒙藏人而言頗不公平，先生乃提出質詢（見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六日，立法院邊政委員會第八會期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這是一項具創意的政策性質詢，可見先生念茲在茲的都是蒙藏民族應合法擁有的權益。復如先生也曾在質詢中提出：

「蒙藏委員會兩副委員長尚在虛懸，似應即遴選忠誠幹練
久著勤勞，素孚邊胞眾望之蒙藏人士各一人充之以資號召。」
(見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五日立法院邊政委員會第十二會期第
二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當天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田炯錦答詢時說：

「關於副委員長的事，以前曾由行政院轉報過總統，總統找我去說：現在邊疆人很少，人選不易，是不是你可以偏勞多作一點事，暫時先擺一擺，待反攻以後，選擇蒙藏人士充任，因此就擺下了。」（同上引會議紀錄）

這一問一答是很清楚的，按田炯錦氏係西北甘肅省人，為憲法學者，一向拙於口才，其所答應屬實情，何況在當時威權時代，田委員長也不敢杜撰：「總統找我去說……因此就擺下了。」這一段話，而且立法院邊政委員會會議紀錄，是可以公開的文件，田氏絕不敢捏造總統找他去談副委員長之事，而先生為人一向忠厚樸實，質詢者真心希望蒙藏委員會能補實兩位副委員長，而且希望是由蒙藏人士各一人出任；兩者都是出自內心，並無虛假成分。但是我們看看《陳誠日記》怎麼說，陳誠發表李永新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一個禮拜後的七月二十一日《日記》記下如次幾個字：

「（上午）十一時，李委員長永新決定副委員長兩員暫缺。」

從字裡行間看來，好像是先生主動不設副委員長，這與五年前先生在立法院邊政委員會的質詢完全相反，與先生一向誠實的特質也背道而馳，更忽略了不設副委員長乃是總統蔣介石的決定（田委員長在立法院邊政委員會的答詢），陳誠似乎有意將不設副委員長的責任歸諸先生，以便蒙藏人怪罪先生，這是相當高明的移花接木之術，同時也顯現陳氏對 C.C. 派之怨懟頗深。

陳誠於民國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星期五接見昭烏達盟蒙籍國大代表（無投票權）吳化鵬（民國十年生，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政治系畢業，民國三十六年為無投票權之國大代表，民國三十七年任蒙藏委員會委員，民國七十五年至八十二年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其時吳氏在美國奧勒崗大學讀碩士，可能暑假返台，其兄為立法委員吳雲鵬，陳誠在接見吳氏後，在《日記》記下：

「接見吳化鵬，國代，在美求學，蒙籍優秀青年，對蒙藏委員會李永新派系做法頗不滿。」

這幾個字對先生構成極大的殺傷力，誠然在台蒙人人數雖不多，派系

卻不少（有何派系，此處不便細說），但來台後，都支持國民政府則為不爭之實，陳誠在日記中不無借吳化鵬之口，一吐心中對 C.C. 派李永新之不滿，有失宰相之量。果然民國四十九年五月二十日，蔣介石三任總統時，先生就被撤換。

伍、出長蒙藏委員會

蒙藏委員會是一個性質特殊的機構，如無明確之政策、充裕之經費、專業之人才，則不可能展現其功能，可惜自北伐成功奠都南京，在行政院下設立蒙藏委員會以來，上述三者無一具備，截至二十一世紀時，中華民國政府始終拿不出一份完整的有關民族政策的法典，也拿不出如何解決內蒙古地區省縣盟旗雙軌政治制度的辦法。在民國五十二年（1963 年）以前，全蒙藏委員會七、八十個委員、職員中，除委員一人（胡耐安，其本職為政治大學邊政系系主任）具有民族學、社會學、中國邊疆政制、宗教專業學識外，其餘全與邊政知識無關，人才貧乏是其缺陷之一。當年整個政府都感經費不足，而蒙藏委員會尤其不足，截至上世紀末，蒙藏委員會年度預算，僅占國家年度總預算不足萬分之零點捌，換言之，國家年度預算為一萬元，分配到蒙藏委員會的尚不足八角，此後每年國家總預算都在增加，但蒙藏委員會的預算則在逐年遞減，在這種三不全的狀況下，期望蒙藏委員會能有大作為，無異緣木求魚。

李永新先生接掌蒙藏委員會時，由蔣經國監交（右邊為先生），距今已將近一甲子，其時全會的預算，較上世紀九十年代更少，除人事費、濟助貧困蒙藏人士、補助蒙藏學生外，幾無經費可以從事蒙藏業務。先生於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十日，應邀到立法院邊政委員會作施政報告，除書面報告外，先生另有現場口頭提要說明，其重點約有以下幾項：



一、蒙藏委員會施政計劃推行情形

(一)規劃研究蒙藏政務

- 1.加強研究蒙藏問題（以下尚有若干子項，略）
- 2.研討對蒙藏措施之各種方案（子項略）

(二)團結並培植蒙藏，反攻力量

- 1.培植蒙藏青年幹部
- 2.團結在台蒙藏反共力量

(三)加強對蒙藏地方之宣傳工作

- 1.舉辦蒙藏維語廣播
- 2.研判並揭發中共對蒙藏之陰謀

(四)聯絡海外蒙藏同胞支援蒙藏反共運動

- 1.聯絡海外蒙藏同胞
- 2.支援蒙藏反共運動

二、對蒙藏情勢之研判

敘述中共在蒙藏地區之諸種措施，以當時之政治氛圍全為負面之批判，以下又分為多個子項，占相當篇幅，此處皆從略，如欲知全文，可查看立法院邊政委員會第二十二會期第二次委員會議紀錄。

三、今後工作重點

(一)加強對中共心理戰宣傳戰

(二)研究對蒙藏措施之方案

(三)擬訂最富號召力量之蒙藏民族政策

憲法有關條文之規定及中央對蒙藏之決策，固為對蒙藏施政之重要依據，惟為適應當前事實需要，一個具有最富號召和統一性之蒙藏民族政策，確實遵照中央政策，參考世界各多種民族國家之有關資料，並廣徵蒙藏人士之意見，從速慎重擬訂，俾資加強對蒙藏地方之號召。

(四)加強輔導蒙藏青年工作

(五)有效支援蒙藏抗暴運動

看以上先生所作之施政口頭補充報告，其中最值得重視者應為三之(三)項「擬訂最富號召力量之蒙藏民族政策」，可惜仍只是原則性的宣

示，並未見到具體的政策，按當年政治體制制定國家之民族政策，非蒙藏委員會這一層級所能提出，應是國民黨中央層級才能提出，先生這一步似乎衝得太快了，所幸只是宣示要擬定最富號召力量之蒙藏民族政策。此一施政報告口頭補充資料，雖然並無新意，但以當時蒙藏委員會之經費與人力，能有如此報告，已屬難能可貴，而且在報告之附件中列有幾項統計資料，至今仍具參考價值，如附件三《蒙藏在台人士籍貫統計表》：

族別	籍貫別（盟、部、旗）	人數	備註
蒙古	布特哈部	18	統計至 46 年 12 月
	呼倫貝爾部	22	原稿誤為 211 人
	伊克明安特別旗	6	
	哲里木盟	63	
	昭烏達盟	21	
	卓索圖盟	223	
	察哈爾盟	33	
	伊克昭盟	7	
	歸化土默特特別旗	4	
	阿拉善和碩特別旗	4	原稿漏和碩特三字
	青海左翼盟	2	
	烏納因素珠克圖盟	6	
	青塞特奇勒圖	10	
小計		409	
藏族		20	
合計		429	

以上是截至民國四十六年十二月底，在台蒙藏人士總數，這在以前從未有過統計，可見先生出掌蒙藏委員會之後，已注意到數字管理，這在當時而言，可說是相當先進的行政管理；另附表二表明當時在大專院校就讀的蒙籍學生有 29 人，在中學就讀的蒙籍學生有 60 人，兩計共有 89 人，在小學就讀的，因沒有發給補助費，故沒有統計數字，據推估其人數應不會少於 60 人，如是則在學蒙籍學生（藏族當時無在中學以上學校學生）

近 150 人，所占比率高達 36% 以上，此與蒙藏委員會重視培育蒙藏青年有密切關係，而先生對蒙藏青年之教育至為重視。另外，附表五《蒙藏在台人士職業分類統計表》，也極具參考價值，茲也將之引錄如下：

職業類別	人數	備註
民意機關（按指國民大會、立、監兩院）	35	統計資料係截至四十六年十二月底止
行政機關	33	
教育機關及學校	14	
軍事機關及部隊	31	
警政機關	5	
金融機構	3	
公營事業機構	2	
黨務機構	8	
其他	13	
合計	144	

從這數據再加上在學學生數字，總計共有 294 人左右，是則在台蒙藏人士無工作者極少，大多是家庭主婦及嬰幼兒，尤值得注意者是在民意機關任職者有 35 人之多，其中 32 人為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僅三人，其二為立法院職員、一人為監察院職員，以三十二位中央民意代表來監督蒙藏委員會，任誰當委員長都會感到掣肘之苦。

先生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半年多後，大約九個月左右，也就是民國四十八年（1959 年）三月十日，大陸西藏地區發生大規模的反共騷動事件，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康巴武裝的所謂衛教簇擁之下，逃離西藏進入印度，此事舉世震驚，同年三月二十六日，台北蔣介石總統發表《告西藏同胞書》，全文如下：

「西藏同胞們：你們這次奮起反共抗暴，浴血作戰，乃是
我中國大陸全體同胞反共革命最莊嚴光輝的歷史成就第一頁開
始。今日我雖身在台灣，但我這一顆心，仍是與你們始終一
起，反共作戰。尤其是這次拉薩戰爭，我藏胞僧侶，壯烈犧
牲，更使我關懷倍切，時刻難忘。我中華民國政府，正在集中

一切力量，給你們以繼續有效的援助，並號召海內外全體同胞共同一致，給予你們以積極的支持。

你們不是孤立的，你們的反共抗暴運動，不僅是為了藏族全體的生存，為了藏胞個人的自由，發揮了大無畏的精神，並且對於自由亞洲各民族、各宗教的自由與安全，擔當了英勇無比的前鋒。所以世界上一切愛好自由、主張正義的國家和人民，都站在你們這一邊，支援你們！禱祝你們的成功！

我中華民國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政治社會組織，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傳統生活的自由。我現在更鄭重聲明：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一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地表示其意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

西藏同胞們！朱毛共匪的傀儡政府，對於你們反共抗暴的革命運動，使用殘忍、狂暴、恐怖、屠殺的手段，企圖加以鎮壓和控制。我深信共匪的武裝暴力，縱能一時破壞你們的寺院，劫掠你們的城市，絕對不能毀滅你革命的意志、和宗教的信仰，只要你們更加堅決、更加勇敢，繼續不斷的奮鬥到底，我必領導全國軍民，很快的與你們在大陸上約期會面，共同作戰來完成我們反共抗暴，救國家救民族救同胞的神聖使命。」

這篇《告西藏同胞書》曾經翻譯為藏文，透過特殊管道（非蒙藏委員會）送到流亡印度的藏人組織，當拉薩反共事件消息傳出後，先生曾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名義，致電十四世達賴喇嘛，表示政府對西藏同胞之英勇反共，倍切關懷，並表示願予積極支援之意，但達賴喇嘛方面未作任何回應，可見當時蒙藏委員會並未能掌握有關西藏方面事務。真正處理有關西藏實務，尤其有關達賴喇嘛出逃聯繫工作的，不是蒙藏委員會，而別有專責單位，在表面上蒙藏委員會是全國最高蒙藏事務機關，但在處理這次西藏反共事件，蒙藏委員會無法介入核心工作。1970 年代，筆者與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劉廉克展一先生有所交談（劉係國大代表，為李永新前一任委員長），據說當中央擬定《告西藏同胞書》時，並沒有邀請蒙藏委員

會委員長參與研擬（關於這一部分，從劉廉克口述專文中頁 139，也可看出國民黨中央在處理某些「機密」或「敏感」邊疆事務時，會刻意撇開蒙藏委員會），這讓蒙藏委員會在面對拉薩反共事件時，相當尷尬，也由於研擬《告西藏同胞書》時沒有先生參與意見，所以顯得不夠專業而且也與憲法精神有違。先看專業性部分，拉薩之所以發生反共事件，是因中共軍隊進入西康後，摧毀頗多喇嘛寺廟、有一些喇嘛受到迫害，激起康巴（西康藏人）的反抗，在反抗失敗後，這群康巴武裝分子攜帶武器進入拉薩，自稱是衛教軍，以維護喇嘛教與十四世達賴喇嘛為訴求，鼓動西藏高層親英派分子，與中共入藏軍方進行抗爭，我們看通篇《文告》都沒有提到達賴喇嘛及喇嘛教，正顯現其專業性不足；其次，《文告》中稱：

「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一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地表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

我們且看十四世達賴喇嘛及其噶廈（地方政府）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 年）在拉薩進行「驅漢事件」時，就已經暴露了其獨立的野心。至 1959 年，其逃離西藏拉薩，於三月二十六日（藏曆土豬年二月十三日）到達藏印邊境隆子宗時（今西藏自治區山南地區隆子縣），發表了一份文件，全文長達一千七、八百字，形同一篇「西藏獨立宣言」（該文件全文可參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下冊，此處從略），十四世達賴喇嘛及其噶廈政府圖謀西藏獨立可說是已經昭然若揭了，而《告西藏同胞書》中還說「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達成你們的願望。」這個「願望」很明顯的就是「西藏獨立」，「獨立」，就是要脫離中國，變更中國領土，我們且看《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有關領土的規定為：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

可見除國民大會之決議外，任何人無權變更中華民國領土。因此這份《告西藏同胞書》所作的承諾，有逾



先生接見藏胞（資料來源：中央社）

越憲法之處，此外，《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二十條，明白規定：

「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

從憲法條文看可以承諾給予西藏任何位階的自治，但不能改變西藏為中華民國領土的事實，《告西藏同胞書》中之「達成你們的願望」，等於開了一張空白的支票，其金額可自行填寫，其違背憲法精神，乃是顯而易見的，先生曾任制憲國大代表，又是蒙籍人士，對於憲法有關領土之條文，必然有深刻之認識，對於蒙、藏地方自治制度



先生接見藏胞（資料來源：中央社）

也必有相當之瞭解，憲法第一百十九條是關於蒙古自治制度，其條文為：

「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定之。」

其與西藏地方自治制度，有明顯不同，而蒙古民族絕大部分都信奉喇嘛教，蒙人對喇嘛教之認識，不在藏人之下，而且內、外蒙古在清朝刻意扶植下，也產生了章嘉呼圖克圖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在喇嘛教中之地位，不亞於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設若 1959 年三月國民黨中央黨部研擬《告西藏同胞書》時，能邀先生參與，其結果必然是更具專業性，也不致有違憲問題發生。當然今天再提此事已無多大意義，但俗語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自有其意義。

在那個年代，還是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年代，有一個訓練機構叫「國防研究院」，是國民政府培訓黨、政、軍高級幹部的機構，由各部會首長或知名學者專家擔任講座，先生既是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又是蒙古族，自然被聘為國防研究院有關邊疆課程的講座，先生擔任《邊疆》及《邊疆現勢》兩個課程的講座，這兩個課程的講義內容篇幅都不小，茲將其綱目引錄如次，若有需要介紹及補充者，則在相關章節中加以摘錄或補充。

《邊疆》

第一章 邊疆概況

第一節 蒙古地方

一、蒙古之行政區劃

(一) 清代之行政區劃概況

1. 內蒙古方面。在這一細目中，先生文稿中提到（乙），由清廷委任蒙籍官吏管轄之地區，包括布特哈部、呼倫貝爾部、土默特部及達里岡厓牧場。養息牧牧場與多倫喇嘛印務處轄區。（丙），不屬盟之旗，計有伊克明安，厄魯特旗及錫埒圖庫倫喇嘛旗。

此部分先生所提，他書較少有論及者，彌足珍貴，不過也有需要補充者，在不屬於盟之旗中，漏列阿拉善和碩特特別旗；另有關錫埒圖庫倫喇嘛旗部分，似應專列一項，敘明喇嘛旗之形成，另在漠北共有五個喇嘛旗，另兩個，其一為錫埒圖庫倫喇嘛旗，在內蒙古卓索圖盟境內，另一在青海，稱察罕諾門汗喇嘛旗，此為較特殊者，特加以補充，至於喇嘛旗之形成，為另一專題，須較大篇幅始能敘述明白，於此不贅。

2. 外蒙古方面。在此部分也有需要訂正之處，原文稱「三音諾顏汗」有誤，按清代只承認漠北喀爾喀蒙古（即後日所稱之外蒙古）有車臣汗、土謝圖汗及札薩克圖汗三個汗部，後增設之三音諾顏部不稱汗，這點在張穆的《蒙古游牧記》中說得非常清楚，另《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中，也都載有其事。

3. 西部蒙古方面，按此即通稱之漠西蒙古。

(二) 現行之行政區劃

二、蒙古之人口

(一) 各盟部旗人口，文中詳列各盟部旗人口，並敘明調查時間，雖然距今已近一甲子，但正好可作為蒙古族人口增長之比較數據，因此極具參考價值。

(二) 蒙古地方之人口，係指外蒙古人口。

三、蒙古之社會生活

第二節 西藏地方

一、西藏之行政區劃

(一)清代之行政區劃

(二)現行之行政區劃概況

1.前藏方面

2.後藏方面

二、西藏之人口

(一)青海藏族人口

(二)西康藏族人口

三、藏胞之社會生活

第三節 新疆

一、新疆之沿革與地位

二、新疆之行政區劃

三、新疆之人口

第二章 中央對蒙藏之重要政策

第一節 民族平等之政策

第二節 扶植其自治之政策

第三節 協助其經濟發展之政策

第四節 推廣教育之政策

第三章 中央主管邊政機構及地方行政制度

第一節 中央主管邊政機構之沿革與職權

第二節 蒙古之盟旗制度

第三節 西藏地方之政教制度

第四節 其他邊疆地方行政組織

第四章 中央對蒙藏之重要施政情形

第一節 研究規劃蒙藏政務

第二節 團結並培植蒙藏反共力量

第三節 加強對蒙藏地方之宣傳工作

第四節 策動並支援蒙藏抗暴運動

第五章 當前中共對蒙藏之陰謀措施

第一節 實施以「民族區域自治」為掩護之分割統治

第二節 加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以榨取軍事資源

第三節 積極發展文教之毒化措施

第四節 發展邊疆戰略交通路線之陰謀

第六章 蒙藏抗暴運動之成因及其發展趨勢

第一節 蒙藏抗暴運動之成因及其發展趨勢

第二節 蒙藏抗暴運動之發展概況

第七章 今後邊政工作應努力之方向

一、加強對共心理戰宣傳戰

二、研訂對蒙藏措施之方案

三、擬訂最富號召力之蒙藏民族政策

四、加強輔導蒙藏青年工作

五、策動並支援蒙藏抗暴運動

伍、結論

該文之末附有《蒙藏委員會組織法》、《清代蒙古盟旗組織系統表》、《現行蒙古盟旗組織系統表》及其說明、《西藏地方政府組織系統表》，此表相當詳細，極具參考價值。此外附有蒙藏委員會所研訂之各種措施方案，以及《中共行政區域系統表》，並附有多幅地圖及說明。以當年蒙藏委員會之員額不會超過五十人（不上班之委員占有十人左右），而有此項文稿出現，雖然文稿僅屬蒙藏新疆概論性質，但以當年之人力，已然相當不易，也可以想見先生當年如何強力督促該會同仁作出此一文稿。

先生在委員長任內，對國防研究院另有一篇講稿題為：《邊疆現勢》，含圖表，約有二萬四千多字，以當時而言，乃是對大陸蒙藏邊疆地區最新的資訊，縱然時至今日，仍具若干參考價值。此兩篇有關蒙藏邊疆之文章，雖未必由先生親自動筆，但絕對有先生之理念，自不待言，因此這兩篇文章為研究蒙藏問題者必須一讀。

當 1959 年（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十日，拉薩發生反共動亂，十四世達賴喇嘛在眾多康巴武裝衛教軍簇擁下（或者可以說是裹脅下），更有外國勢力（主要是美國情報單位）協助下，出逃印度，從此以西藏獨立為訴

求，而且混反共與反漢爲一談，是年六月六日，先生向行政院長陳誠報告蒙藏情形，陳誠作了以下三點指示：

- (一)對藏胞使其反共不反漢。
- (二)須擴大範圍，化敵爲友，不愈做愈小。
- (三)派至大陸工作人員，不可求急功。

(見《陳誠日記》) 陳誠這三項指示，雖極正確，但以當時蒙藏委員會之員額僅五十人左右，其中委員近十餘人，不必上班，就記憶所及其時委員爲：胡耐安（專任政大邊政系主任）、羅桑益西（國大代表）、金崇偉（國大代表）、史秉麟（國大代表）、吳化鵬（國大代表）、熊耀文（兼藏事處事）、庫耆雋（滿族）、馬恕基（新疆回族）、羅平、李春霖（兼政大蒙文教授）等，其他職員有少許因隨政府來台之邊族人士，安置在蒙藏委員會工作，事實上並無多少工作能力，能提筆屬文者不過三、五人，陳誠院長作以上三項指示，不無強人所難，事實上所指示之三項工作在國民黨有專責單位在進行，且不使蒙藏委員會介入，這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先生之出長蒙藏委員會，可說是忍辱負重，大有背十字架意味。但是先生任事從不氣餒，據劉廉克先生口述專文稱（見頁 140），先生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時，「甚至計劃由他親自到印度去，與達賴及西藏領袖們懇談，希望先從反共的基本認識上溝通意見，進而再調和其彼此的政治願望。這是真了解『西藏問題』的作法。」可見先生是不避艱難勇於任事，可惜國民黨內已有專責單位處理西藏事務，先生的熱心顯然沒有得到回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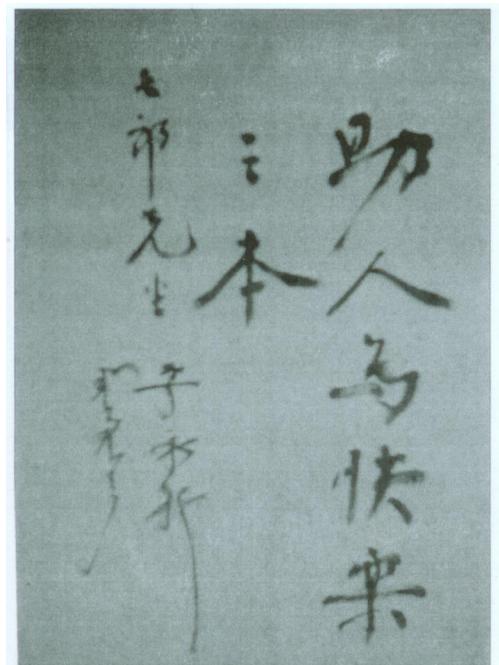
民國四十九年五月，陳誠內閣再度改組，先生未獲續任，僅被聘爲總統府國策顧問，領一份薪資以養家活口，先生一生廉潔自持，據說委員長任內的首長特支費，先生從不支領，這是何等的清高，甚至可以說在所有部會首長中是空前絕後的，這是平凡中的不平凡。

陸、謙謙君子一代完人

先生離開蒙藏委員會後，無法回任立法委員，所幸獲聘爲總統府國策顧問，此爲名譽性職位，於是先生乃致力於中國邊政協會工作，這個協會是民間社團，是盛世才主新時，曾濫捕國民黨入新工作人員，以及新疆當

維、哈、錫伯……各族人民，來台後這些在新疆曾被濫捕的各族精英，如張志智（立法委員）、阿不都拉（立法委員）、廣祿（錫伯族立法委員）、宋念慈（新疆日報社長）……深深瞭解新疆、蒙古、西藏等邊疆地區，雖位處邊陲，但卻是中國賴以生存，壯大的重要地區，於是聯絡在台蒙古、西藏民意代表如李永新、許占魁、劉廉克、羅桑益西、王枕華等，以及研究研究邊疆之學者專家如胡耐安、芮逸夫等，又聯絡曾在邊疆地區生活工作者如徐伯達、宋念慈等數十人於民國四十二年（1953年）發起成立「中國邊政協會」，從事邊疆研究，以及聯絡各邊族與漢人之感情，所以稱協會而不稱學會，其故在此，十年後也即1963年，開始發行《中國邊政》季刊，至今（2016年）仍賡續發行，在台灣可說是一份相當「長壽」之刊物，該協會歷屆選舉先生都當選理事，進而當選常務理事，而且還當過好幾屆理事長，先生對中國邊政協會的貢獻良多，就在他最後一次理事長任內，正準備召開年會（早年中國邊政協會都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行憲紀念日召開年會），未料在民國六十一年（1972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突然發病進住台大醫院，當天就辭世了，令人惋惜不已。

先生生平樂於助人，因此經常手書《助人為快樂之本》送給親朋好友（見附圖），以上所說先生的言行，或者有許多奉公守法的人也能做到，但李先生夫人自民國四十六年（1957年）起，因勞過度，不幸中風，而成了半身不遂之人，從此李夫人再也不能操持家務，當然也不能照顧家人，反而成為要被別人照顧的人，而且是每下愈況，這種情況拖了十六、七年，先生總是無怨無悔親自照顧夫人的飲食起居，並不時進行翻身按摩，俗語說，久病床前無孝子，而先生卻能十六、七年如一日，這是人間的至愛，記得是在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召開的中國邊政協會年會，是在



立法院借個場地開年會，年會之後循例會有一場餐會，先生是理事長，在開完年會，安排所有會員入席坐定後，先生向大家說明：因為家中有病人需要照顧，不能陪大家用餐，不過希望大家還是要其樂融融開懷暢飲，先生這種既照顧了中國邊政協會年會的召開，又準時趕回家照顧生病的夫人，這種情況可說是絕無僅有，所以余井塘在輓先生的聯語中說：

大半生求民族團結堅強，功在黨國。

十七年為病妻慇懃看護，事泣鬼神。

這一幅輓聯工整貼切，也可見當年的撰寫輓聯多是親自為之，不像今日多委由「禮品店」代辦，雖不致出錯，卻不見真摯情意。劉廉克先生形容李永新伉儷的愛是：

我們互相的愛，

今天比昨天多；

明天比今天更多。

先生伉儷的愛是人間真愛，先生不用華麗的語句來表達對夫人的摯愛，而是以行動來實踐對夫人的愛，這是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格特質。因為先生深知愛是責任，愛是忍耐，這也是既平凡又不平凡的愛的解釋。

李永新先生辭世後，於民國六十二年（1973年）元月七日上午舉行出殯，八時家祭，九時公祭，十時大殮，以先生一生忠黨愛國，中國國民黨推派陳立夫、谷正鼎、余井塘及白雲梯四人，在先生靈柩覆蓋中國國民黨黨旗（見附圖）。先生從此走入了歷史。

綜觀先生一生都是平凡中呈現其不平凡之處，這比轟轟烈烈與敵對拼，要困難多了，就以先生親自照顧生病的夫人十七



年如一日，這絕不是常人所能做到，但先生做到了，而且無怨無悔，這一份夫妻之情，豈是常人所能？余井塘輓先生的聯語中的：

「十七年為病妻慇懃看護，事泣鬼神。」

真是說得頂真而貼切，這一份夫妻之愛，是人間的至愛，先生對國民黨之愛，也是終生不渝，而且對國民黨總裁蔣介石之維護與擁戴，更在眾多黨員之前。有一則傳說，1949 年，正是風雨飄搖的時節，國民黨在廣州召開大會張治中（其後與邵力子等到北平與中共進行和平談判，全部附共）等都對總裁有所批評，按先生與谷正綱先生都是五短身材，對張治中之言論至表不滿，先生與谷氏乃搏張氏，而其時國共之爭，勝敗幾已是定局，見風轉舵如張治中，邵力子、陶峙岳者，可說是比比皆是，而先生始終不改其愛黨擁戴領袖的本質，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貞，這種不平凡的人格，幾人能有？

不過也有一事，對先生身為蒙古籍立法委員，當民國四十二年（1953 年），立法院立法委員祁志厚等二十四人連署提出《咨請政府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否認蘇聯非法併吞唐努烏梁海一事，請大會公決》之臨時提案（全案頗長，有意者可參見第一屆立法院關係文字，院總字第 110 號，1953 年二月二十三日，此處從略），祁志厚所提出之案，並未經詳細討論，整個會議僅在宣布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為無效，或宣布廢止該約，其間蒙籍立委薛興儒曾提出「本席認為關於外蒙古獨立問題，以及蘇聯單獨宣布之唐努烏梁海問題，也是應該提出，這點要請葉部長答復一下」，外長葉公超有如下之答復：「薛委員問到唐努烏梁海問題，蘇聯宣布唐努烏梁海為蘇維埃六大自治區之一的時候，我國曾提出抗議，並於報端發表，現在單獨提出來，不會有力量，至外蒙古問題，其中許多事實，提出來也於我不利，這些問題如何解決，完全要看將來國家的力量，如今天談廢約，我們不願把這些問題，一個一個提出來，沖淡本案的作用。……對外蒙問題，如果留在臺灣的蒙古籍同胞，聯合起來共同發表一個聲明，這種聲明，也許更有力量。……」立法院會全天進行，至下午立委王寒生認為對本案決議文應加入以下之文字：「查外蒙獨立，係由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既已廢止，外蒙獨立之承認，應予取銷，同時聲明，外蒙仍為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分」。會議經過冗長之發言，至當日下

午六時許通過決議文如次：

「中華民國 34 年 8 月 14 日在莫斯科簽訂之中華民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予以廢止，並保留我國及人民對於蘇聯違反條約及附件所受之損害向蘇聯提出要求之權。」

此項決議文並未涉及是否宣布外蒙古仍為中華民國領土，及蘇聯侵占唐努烏梁海一事，同時外交部長葉公超所提「如果留在臺灣的蒙古籍同胞，聯合起來共同發表一個聲明」一事，竟未見先生或蒙籍立法委員作出反應，按當時在台蒙籍立法委員除先生外尚有薛興儒、達穆林旺楚克、白大誠、許占魁、杭嘉驥、德古來、榮照、吳雲鵬、金養浩及楊俊生等共十一人，就人數而言頗為可觀，如能作一提案表示外蒙古在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後，其主權仍應回歸中華民國，此一聲明或提案，雖未必會產生實質效果，但會為未來處理外蒙古問題，留下有利條件，因此先生當年保持緘默，令人頗感不解，至於發動在台蒙人（其中有國民大會代表金崇偉、楊立君、史秉麟、劉廉克、白雲梯、烏爾貢布、篤多博、史耀青、札奇斯欽、伍雲格爾勒、杜固爾、海玉祥、胡格金台、紀效威、樂竹芳、賽春阿、倪純義等十七人，另有監察委員王枕華、張秉智二人）聯名主張外蒙古仍為我所有，則聲勢更為浩大，但不知何故竟未見後續動作，或許仍有頗多資料尚待發現，但以先生忠黨愛國秉性，絕不至悶不作聲，這是可以肯定的。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人勤，窮不久；人懶，富不長。（瑤族）

人勤，金銀堆眼前；人懶，衣物掛天邊。（白族）

閒著手脚，餓著肚皮。（哈尼族）

人越睡越懶，嘴越吃越嘍。（赫哲族）

能幹者不一定會說話，懶惰者只會動嘴巴。（德昂族）

駿馬舉鞭飛騰，懶馬千鞭不動。（柯爾克孜族）

懶馬找不到道路，懶漢找不到幸福。（烏孜別克族）

勤勞者滿面紅光，懶惰者面如土色。（維吾爾族）

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藏族）

牛耳先出軟，牛角後出硬。（仫佬族）

龍眼樹大果小，冬瓜藤小果大。（黎族）

牡丹雖俏難當飯，茅草雖醜能蓋房。（哈尼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夢溪筆談》有關邊疆部分介敘

劉學銚
前文化大學兼任教授

摘要

沈括爲宋代科學家，其所著《夢溪筆談》涉獵的範圍極廣，全書分二十六卷，另有《補筆談》三卷，《續筆談》一卷，其內容天文、曆法、音律、物理、化學……乃至周邊少數民族史事，均曾涉及，可說是一部集科技、哲學、人文、藝術、民族之大成，其中有周邊少數民族者，尤值珍貴，蓋北宋與契丹、黨項同其時代，則《筆談》中所載與之有關者，等同第一手資料，本文擬就《夢溪》各談中有關邊疆民族部分予以敘述分析。

關鍵詞：沈括、夢溪筆談

壹、沈括與《夢溪筆談》

北宋，在我國歷史上，就政治、武力而言，是個弱勢朝代，承繼五代之後，趙匡胤目睹五代軍人奪權，因此得到政權後，以比較平和的「杯酒釋兵權」方式，解除了軍頭們的武力，致力於文化發展，因此在文化上北宋反而是個強勢朝代，這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沈括生當其時，遂致力於學術研究，他不是學究型人物，而是善於分析、推理的學者，茲就其人其書敘述如下：

一、沈括

沈括生於北宋仁宗趙禎天聖八年（西元 1030 年，或云生於天聖九年。北宋仁宗共在位四十一年，1023~1063 年），卒於北宋哲宗趙煦元祐九年（1094 年），享壽六十五歲，沈括字存中，浙江錢塘人（今浙江杭

江），世代書香，他自幼敏而好學，據傳他十四歲時，就讀完家中所有藏書，並常隨其父游歷各地，語云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由是識見大開，並養成凡事究理窮源的辯證思維，這與當時理學家談心性之學是全然不同的思維方式。

沈括究理窮源的思維邏輯，凡事都務求合理解釋，如他讀到詞句中的：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沈括就思考何以居家附近的桃花都已凋謝了，而山上的桃花才開始盛放呢？為了解開這個疑團，他特別到山上實地考察，這才瞭解山上的氣溫低於山下，所以才會有「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的情況，這種實證的態度，讓《夢溪筆談》所敘述的許多事，顯得言之有據，令人信服。宋仁宗至和三年或嘉祐元年（西元 1056 年，同年改元嘉祐）進士及第，從此步入仕途，由於他的實事求是精神，在政治上自然會與推行新政的王安石（1021~1086 年）相契合，沈括入仕之初，任海州沐陽縣（今江蘇省宿遷市沐陽縣）主簿，上任後主持整治沐水的工程，動員上萬民工，終於解除沐陽當地的水患威脅，還開墾出良田七千頃，使一向貧窮的沐陽，有了新的面貌，此後他還多次負責治水，而且都獲得成功，這些治水的經驗，都收入了其所著的《夢溪筆談》之中。

按終北宋一代（960~1127 年）都與契丹之遼與黨項之西夏鼎足而立，因此《筆談》也必然會涉及契丹、党項之事，何況沈括曾充任赴契丹使者，則其所敘遼國之事，應屬「第一手」資料，沈括因為參與王安石變法，當司馬光一批舊黨推翻王安石後，沈括被貶官為鄜（音夫）延路經略使，按鄜延，或稱鄜州，春秋時為白翟（同狄）國，考其地望當今陝西省延安市富縣，宋時鄜延路應指鄜州至延安一帶，其他近党項之西夏，因之對党項必然也有所瞭解。《筆談》中對契丹、党項間有所記載。沈括博通古今，《筆談》涉獵極廣，本文僅就與邊疆少數民族有關部分加以分析介敘。

二、關於《夢溪筆談》

沈括致仕之後，築室夢溪之傍，據他自稱：「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

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于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是知此書名之由來，《夢溪筆談》全書二十六卷，另有《補筆談》三卷、《續筆談》一卷，成書迅受學界重視，並為世人所認可，不久即被刊刻印行，按沈括與活版印刷發明人畢昇（？~1051 年）雖同時代，但依常理判斷，《夢溪筆談》之刊刻仍非活版印刷，可惜北宋時版本早已遺失，僅知現存之版本為南宋孝宗趙眘（音大）乾道二年（1166 年）之刻本，但也是元、明時期覆刻之乾道本。通行之正、補、續三編本，首出於《稗海》，按「稗海」原意為傳說中遠方之海，漢、王充《論衡·談天》：「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稗海，九洲之外，更有瀛海。」另「稗海」為叢書之名，明神宗朱翊鈞萬曆年間（萬曆共四十八年，1573~1620 年，明代諸帝都僅用一個年號），有浙江會稽人商濬編刊之叢書，名之曰《稗海》，共收入七十四種、四百四十八卷，所收皆歷代筆記、小說，而以唐、宋時人所撰述為多，《夢溪筆談》三篇南宋乾道本即出於《稗海》。

由於此書內容豐碩，包羅萬象，早已東傳日本，十九世紀中期，日本以活字版排印《夢溪筆談》三編本，更由於此書內容精彩，乃廣泛向國際流傳，法、德、英、美等國均曾予以出版。1956 年，大陸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胡道靜之《夢溪筆談校證》，對原書作精確考據，1957 年，北京中華書局又出版胡道靜之《新校正夢溪筆談》，時至今日仍有新版本問世。《夢溪筆談》一書對活字印刷術有相當詳細的記載，引起法、德、英、義、美、日等的注意，對之作深入之研究，1978 年，日本又以分三冊出版《夢溪筆談》日文本，可見此書具有相當之影響力。按中國古書原無標點，侯真平曾為斷句，使讀者易於閱讀。

貳、《夢溪筆談》有關邊疆之記載

一、《胡服》

按原著但列卷幾，無標題，茲為明瞭起見，就其內容加以標題，其原文為：

「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緣短衣、長勒靴、有蹀躞帶，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馳射，短衣、長勒皆

便于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間，予使北時皆見之。雖王庭亦在深薦中。予至胡庭日，新雨過，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無所沾。帶衣所垂蹀躞，蓋欲佩帶弓劍、幘幘、算囊、刀礪之類，自後雖去蹀躞，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蹀躞，如馬之鞚根，即今之帶鎔也。天子必以十三環為節，唐武德貞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衷博矣。然帶鈎尚穿帶本為孔，本朝加順折，茂人文也。」

上引《筆談》中的蹀躞，就是腰帶上垂挂的小帶子；而長勒靴，就是長統靴，北方胡人腰帶上之所以要有許多小帶子，是要垂挂許多小東西、像弓劍、磨刀石、幘幘（手巾）……等；鞚根是絡於牛、馬股後的革帶。其實無論早期的華夏或後來的漢人（所謂漢人是秦漢以後才有的名稱，最早期的漢人是由華夏、東夷、百越及荆吳四大系民族融合而成，之後不斷吸納四周各民族，越至後期，其內涵越多元），在服飾上都有胡化的現象，如戰國時代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之後，西晉末期，南匈奴劉淵建立漢魏政權，建國號為「漢」，自認係繼承兩漢及蜀漢之後，時為西元 304 年，自此北方諸胡族紛紛起而建立漢魏式政權，前後二百多年間，所建政權或王朝有二十多個，整個北方都為諸胡族所統治，漢人服飾之胡化，乃成為無可避免之事，《筆談》中所謂「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北齊」即由東魏蛻化而來，東魏權臣高歡原為北方六鎮戍卒，屬稽胡爾朱榮所轄，漸次坐大，託稱出身於渤海蓚縣望族高氏，事實上已全然鮮卑化，其子高洋篡東魏建立齊王朝，史稱北齊，以與南朝之蕭齊有所區隔，北齊朝廷可能以鮮卑語為「官話」，北齊境內可說是一片鮮卑化，顏之推之《家訓》曾有如下之一段話：

「齊朝（按指高氏之北齊）有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

至於西魏及稍後之北周，根本即為鮮卑宇文氏所建，尤其北周時，更普遍賜其文武大臣以鮮卑姓，如賜創建隋朝之楊堅姓「普六茹」氏，賜創建唐朝李淵之祖父李虎姓「大野」氏，因此可以想見自諸胡列國以至北

朝，北方中國是一片胡化景象，也可說是胡漢民族、文化大混融時代，唯其混融，始有之後大唐之璀璨之文化。

二、《羯鼓》

《筆談》列卷五《樂律一》，原無標題，其原文爲：

「吾聞《羯鼓錄》序羯鼓之聲云：『透空碎遠，極異眾樂。』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滴泉》之曲。余在鄜延時，尚聞其聲。涇原承受公事楊元孫因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遺音遂絕。今樂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遠』，了無餘跡。唐明帝與李龜年論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為藝可知也。」

在分析《筆談》這段話時，得先將「羯」作一解釋，傳統史傳五胡之中有羯族，而一般都將之歸爲「匈奴別部」，而未加細究，羯族石勒建有後趙政權，羯族曾經被匈奴統治，但不是匈奴，不但體質特徵與匈奴不同，也有與匈奴語不同的羯語，據《晉書·石季龍載記》稱石氏羯族的體質特徵是「深目、高鼻、多鬚」，這完全是高加索種（即俗稱的白種人，或稱操印歐語系的印度歐羅巴人種）的特徵，就體質人類學而言，羯族不是匈奴，是很明白的事實，因爲匈奴是蒙古利亞種（即俗稱的黃種人是操阿爾泰語系的一支黃種人），此其一；其次，羯族自有其語言也不同於匈奴語，建立後趙的羯族石勒時，有西域高僧佛圖澄在前後趙境內弘揚佛教，頗得石勒賞識，某次石勒與匈奴前趙劉曜戰，難卜勝負，乃問訊於佛圖澄，佛圖澄特別以「羯語」摻雜漢語對石勒說：

「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見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348）

前說從體質特徵上看，羯族是高加索種，其語言屬印歐語系，在語言結構上爲曲折語型，而匈奴語言屬阿爾泰語系，在語言結構上屬膠著語型，兩者完全不同，羯族不可能爲匈奴別部。如果再從葬俗上看，羯族有

火葬之俗（見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台北中華書局，1974年，頁二背面），凡此都足以證明羯族不是匈奴，然而羯族又是什麼民族？從何而來？首先要瞭解「羯」為何義，按廣義的西域（指今新疆以西地區），分布所謂的昭武九姓諸國，其中以康國為首（在今中亞薩馬爾罕一帶），若曹、何、史、畢、安、石、火燭……等國，此等昭武九姓諸國稱驍勇善戰者為柘羯，或作赭時、柘折，如《唐書、安國傳》稱：

「募勇健者為柘羯。柘羯，猶中國言戰士也，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析、曰赭時……」

可知「羯」乃柘羯之省稱，而昭武九姓之族乃西遷大月氏之遺胤，與烏孫、塞種等，均為高加索種（此部分可參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匈奴盛時曾西入今中亞地區掠得其驍勇善戰者東歸，置之於上党（今山西省長治市長子縣）、武鄉（今山西省長治市武鄉縣），稱其地為「羯室」（指羯人聚居之地），後人不察，以為羯族源於羯室，此實倒果為因之說法，應予駁正。

從上引體質特徵、特有語言、葬俗及族源諸方面均足以證實羯族非匈奴，既非匈奴，則必有異於匈奴之文化，羯族善擂鼓到唐時還流行羯鼓，唐明帝（即玄宗李隆基，712~756年在位）就善擂羯鼓，曾擂斷鼓杖達四個櫃子之多，可見擂羯鼓時，用力之大。然而到了北宋沈括的時候（1030~1094年）據說只有邠州，其地當今陝西省咸陽市彬縣，沈括在鄜延當經略使時，還曾聽到這個老人擂羯鼓，這個老人會擂《大合蟬》、《滴滴泉》等曲子。有涇原承受公事的楊元孫借回京（北宋都汴涼，今河南開封）述職時，向朝廷報告了有關這個邠州老人還會擂羯鼓一事，朝廷就要徵召這老人來京，這是很珍貴的文化遺產，理應需予以保護、傳承，但是楊元孫回到邠州時，這個老人已去世了，就這樣羯鼓在中國就絕跡了。可見文化流失是很快的。

三、《打回回》

《筆談》卷五《樂律一》有《打回回》軍歌，這是沈括在鄜延邊地時，因原來的歌詞過於市井鄙俚，沈括為之別作歌詞，《筆談》原文如下：

「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高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余在鄜延時，制數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篇，其一：

先取山西十二州，別分子將打衙頭。回看秦塞低如馬，漸見黃河直北流。

其二：

天威卷地過黃河，萬里羌人盡漢歌。莫堰橫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

其三：

馬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自怨單于。彎弓莫射雲中雁，歸雁如今不記書。

其四：

旗隊渾如錦綉堆，銀裝背嵬打回回。先教淨掃安西路，待回河源飲馬來。

其五：

靈武西涼不用圍，蕃家總待納王師。城中半是關西種，猶有當時軋吃（根勿反）兒。

按沈括任鄜延經略使時，爲宗神宗趙頊元豐三至五年（1080~1082年），其時北宋正與西夏處於戰爭狀態，西夏，係由党項羌所建，關於党項羌，許多漢文史料都稱之爲西夏，如《魏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隋書》、兩《唐書》、兩《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兩《元史》等正史，對党項羌都有所記載，唯獨《遼史、西夏傳》所載頗爲特別：

「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則赫連國也。」

而《金史、西夏傳》也有類似記載：

「……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爲托跋氏（按即拓跋氏）。」

從遼、金兩史所載，可見党項羌與鮮卑拓跋部存在著某些關係，此處非探討党項羌之專文，且略過，但沈括所撰凱歌第四首中有「銀裝背嵬打回回」一句，此為「回回」一詞最早出現於文獻者，特值注意，且與元代以後所指的回回並不相同，有加以探討之必要。按在沈括以前，尚未有「回回」一詞，元以後的「回回」，則明指是阿拉伯人、中亞操突厥語系的各民族、波斯人，是則沈括《筆談》中的「回回」，指的是什麼民族，按沈括的時代，西夏所統轄的疆域大約在今甘肅、寧夏、青海一帶，且為其中心地帶，當時河西走廊的瓜州（今甘肅省敦煌一帶）、甘州（今甘肅省張掖一帶）有回紇（唐時稱回鶻），而且人數相當多，按回紇汗國盛時擁有大漠南北，且曾與唐多次聯姻，更曾助唐敉平安史之亂，收復兩京，但於西元 840 年因內訌，召致北方之黠戛斯攻擊，汗國崩解，部眾潰散，除進入唐境者，最後融入漢人之中，大部分向西南甘州、瓜州、高昌（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遷徙，回紇盛時，請改稱回鶻，取其梟勇之義，後世以「紇」或「鶻」字均非常用字，且其讀音與「回」字相近，因此以「回回」代指西夏境內之回紇，沈括《筆談》中之「打回回」可能只是一種鼓舞士氣的俚語（見敏賢麟《蒙古游牧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交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年，頁 288），與元代以後的回回，其所指完全不同。又《筆談》第五首末句「猶有當時軋吃（根勿反）兒，之「軋吃兒」，是指說關西方言的漢人後裔，所謂關西，是指長安（關中）以西，也就是隴西以至河西一帶，曾被吐蕃（就是清代以後的西藏）所占領，為時頗長，但其地漢人仍不改其關西口音（也即並未吐蕃化）。

四、《柘枝的遍數》

《筆談》的原文為：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曰，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

這一段列於《筆談》卷五《樂律一》，關於柘枝，在《羯鼓》一項中已有敘述，關於柘枝舞，顧名思義是出於柘枝，而柘枝就是石國（今西亞塔什干一帶），《新唐書·西域傳下·石國》所載：

「（石國）或曰柘枝、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

按大宛，為今費爾干那盆地，其北就是塔什干一帶。柘枝舞實出自西域，應無庸疑，但宋人郭茂倩於其所編《樂府詩集·柘枝詞》小引中稱：

「一說曰：《柘枝》本《柘枝舞》也，其字後訛為柘枝，沈亞之賦云：『昔神祖之克戎，賓雜舞以混會。柘枝信其多妍，命佳人以繼態。』然則似是戎夷之舞。按今舞之人衣冠類蠻服，疑出南蠻諸國也。」（《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上引文字見頁818）

按郭茂倩係南宋時人（南宋 1127~1279 年），去唐已遠（柘枝舞盛行唐代），其所見柘枝「舞人衣冠類蠻服」，這是宋代舞柘枝者的衣冠，不能據以推定唐（或唐以前）時柘枝舞者之衣冠也類蠻服（傳統稱南方之非漢人各民族），因此郭茂倩疑柘枝舞出自南蠻諸，乃是不可信者。另《圖書集成·樂律典》卷八十八《樂部》引又稱「柘枝」一辭由（鮮卑）拓跋氏而得名，遂以為：

「舞柘枝之本出於拓跋氏之國，流傳誤為柘枝也，其字相近耳。」（轉引自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 98~99）

這個說法以「柘枝」與「拓跋」字形相近，遂訛拓跋為柘枝，純出臆測，「拓」與「柘」容或相近，「跋」與「枝」豈能混淆？且拓跋氏所建之北魏，威名播於西域，由是西域各國以「拓跋氏」稱中國，訛讀為「桃花石」（見邱處機門弟子李志常之《長春真人西遊記》，台北中華書局，1974年，頁十背面），拓跋與柘枝毫無關聯。再看《樂府詩集》輯有薛能《柘枝詞》三首，其中第二首為：

「懸軍征柘羯，內地隔蕭關。日色崑崙上，風聲朔漠間。
何當千萬騎，颯颯貳師還。」

此詩已明指柘枝在西域，何況末句「颯颯貳師還」，指的便是漢武帝命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遠征西域大宛，其所以命為「貳師」將軍者，以大宛都貳師城，意在必得大宛之汗血馬、柘枝在西域，絕無疑問。至於柘枝舞究竟是什麼樣子，據唐代詩人劉禹錫（772~842年）有《觀柘枝舞二首》，且看他如何形容柘枝舞：

「胡服何葳蕤，僂僂登綺墀。神飄獵紅葉，龍燭映金枝。」

「垂帶覆纖腰，安鈿當嫵眉。翹袖中繁鼓，傾眸遡華棟。」

「燕秦有舊曲，淮南多冶詞。欲見傾城處，君看赴節時。」

「山雞臨清鏡，石燕赴遙津。何如上客會，長袖入華裯。」

「體輕似無骨，觀者皆聳神。曲盡回身處，層波猶注人。」

（見《全唐詞》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3972。）

詩中「葳蕤」意為紛紛重下；「僂僂」，僂音仙，僂僂意為舞時飛揚狀。「垂帶覆纖腰，安鈿當嫵眉」，是指女舞者纖細腰肢繫上長長的腰帶（意為舞動時腰帶會隨舞飛揚），頭上插著西域安國的金花，益增嫵媚。唐詩人張祜有四首有關柘枝舞的詩，茲以《周員外席上觀柘枝》為例：

「畫鼓抱環錦臂攘，小娥雙雙舞衣裳。金絲蹙霧紅衫薄，銀蔓垂花紫帶長。鸞影乍迴頭並舉，鳳聲初歇翅齊張。一時歛腕招殘拍，斜歛輕身拜玉郎。」（見《全唐詩》頁5872）

這首詩中「金絲蹙霧紅衫薄，銀蔓垂花紫帶長」是指舞柘枝的女子衣著式樣，當「紅衫薄」、「紫帶長」一旦舞動起來，是輕衫飄浮、紫帶飛揚，此等景觀，何其曼妙。唐朝詩人詩柘枝之作，非常之多，此處不多引錄。沈括《筆談》中的寇萊公是指寇準，寇準（961~1023年）是北宋初期時人，字平仲，華州上封上（今甘肅天水），北宋太宗趙匡義（後改名趙炅）太平興國四年（979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真宗趙恒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入寇，時朝臣多主議和，時寇準官同平章事，力排眾議，促使真宗親征，進澶州督戰，卒與契丹訂《澶淵之盟》，寇準喜歡觀賞柘枝舞，而且可以觀賞一整天，所以時人稱之為「柘枝顛」，不過宋代的柘枝舞的曲目與遍數，都比唐代少了很多，而且服飾也有所改變，這是

文化傳播或移植過程中，無可避免的現象。沈括時鳳翔還有一位老尼，據說就是當年寇準宅邸裡的柘枝伎（注意是伎不是妓），這位老尼還能唱當時那些曲子，有雅興的人往往也在傳唱那些曲子。

《夢溪筆談》在卷九《人事一》提到北宋真宗在寇準建議下，御駕親征契丹，當時朝中大臣意見不一，《筆談》對此事有如下一段記載：

「景德中（景德為宋真宗年號），河北用兵（指御駕親征契丹一事），車駕欲卒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寇準歿後謚忠愍，寇準歿後三年，沈括始生，故用其謚號以示尊敬）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于城下，人情恠恂。上使人微覘（寇）準所為，而準方酣寢于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這一段記載美化了宋真宗，事實上宋真宗是在寇準建議下，才御駕親征，其內心是懷有懼意，所以才要派人去覘看寇準動靜，見寇準如常酣睡，這才安下心來，眾人見寇準鎮定自若，就認為如同東晉時的謝安，當時前秦苻堅正統九十多萬大軍準備攻滅東晉，雙方對峙於淝水，謝安毫不慌亂，如常與友人對奕。這裡提到契丹有必要略加敘述，按契丹是鮮卑族的遺亂留在大興安嶺西側松漠一帶，北魏後期開始逐漸崛起，及至唐朝後期，已經非常強大，五代時更是銳不可當，十世紀初（916年），耶律阿保機統一契丹各部，建立遼政權，攻滅渤海國，建立為東丹國（意為在契丹之東），以其太子耶律倍為東丹國王，耶律阿保機後被謚為遼太祖，由其次子耶律德光嗣為帝，是為遼太宗，石敬瑭為要稱帝建立後晉，不惜割燕雲十六州予遼，且對遼自稱兒皇帝，遼得燕雲十六州（燕，指今北京一帶；雲，指今山西大同一帶。也即自今北京至大同之間的各州），遼得燕雲十六州後，勢力更熾，北宋建國後（北宋於960年建國），北方幾無險可守。但以國家初立，仍充有一股朝氣，趙匡胤出身軍旅，深知北宋軍隊是否能戰，是以在位期間絕不輕言北伐，且習於戰事之將領，多在「杯酒」之下釋出兵權，及至趙匡義繼立，朝野銳氣仍在，希望能規復燕雲十六州，北宋大臣搜集遼朝情報，以為遼為契丹族所建，但當權者則為漢人蕭德讓，因此判斷其內部必然矛盾重重，將相不和，胡漢對立，為北宋北伐建立理論基礎；其中最荒謬者當數知北宋雄州的賀令國及其父岳州（今

湖南省岳陽市) 刺史賀懷浦，賀氏父子上書朝廷稱：

「契丹主年力，國事決於其母（蕭太后），其大將軍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畔以取幽薊」

賀氏父子之「敵情分析」迎合當時北宋朝野的意識需求，於是激起北宋太宗揮師北伐之雄心壯志，遂於西 986 年正月，兵分北、中、西三路北伐，戰爭初期，北宋輕而易舉克復寰州（今山西省朔州市東）、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應州（今山西省北部）、雲州等地，戰況一時有利於北宋，但在遼蕭太后決定率軍親征後，遼軍士氣大盛，幾經纏鬥，戰況逆轉，北宋全面南撤，從此不再輕言北伐。及至西元 997 年，北宋太宗薨，由趙恒繼立，是為真宗，遼蕭太后認為北宋新君初立，可能發生政局動盪，遂引軍南下伐宋，遂有宋真宗御駕親征之事。

宋真宗自幼生長於深宮，錦衣玉食，何嘗見過戰爭之殘酷，一旦踏上征途，始知戰爭與想像中天差地別，於是暗中派崇儀副使曹利用到遼軍大營探查有無和談之可能，雙方對於和議並無歧議，只在北宋每年應給遼多少銀、絹，最後在澶淵定下和約，每年由宋給遼白銀三十萬兩、絹三十萬匹，這就是所謂《澶淵之盟》漢文史料稱每年給遼的白銀為「歲幣」，其實就是向遼朝進貢，說「歲幣」似乎是賞給遼朝的「壓歲錢」，在「面子」上好看而已。

五、赫連城

《夢溪筆談》卷十一《官政一》第三則談到延州故豐林縣城係諸胡列國時匈奴族赫連勃勃所建，故此處標之為赫連城，先看《筆談》原文：

「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之赫連城。緊密如石，斫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馬面極長且密。予親使人步之，馬面皆長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馬面密，則城不須太厚，人力亦難兼也，余曾親見攻城，若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則矢石相及，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敵人不能到城下，乃為良法。今邊城雖厚，而馬面極短且疏，若敵人可到城下，則城雖厚，終為危道。其間更多其角，謂之團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以覆護城腳，但使敵人

備處多，則自不可存立。赫連之城，深可為法也。」

在解析赫連城之前，應先對赫連勃勃其人作一解說始能瞭解諸胡列國時匈奴夏政權，以及統萬城之梗概；且說司馬炎篡曹魏建立晉朝後，大事分封眾建，司馬炎在世時以其個人威望，以及所封諸王，皆其子侄，所以並無問題，及其薨，由其類似白癡之司馬衷嗣立，史稱晉惠帝，「何不食肉糜」一詞，即出於晉惠帝之口，兼以其后賈南風既醜又胡作非為，枉殺司馬氏諸王，終於激起八王之亂，此際原為質於洛陽的南匈奴單于後裔劉淵（字元海）趁隙逃回五部匈奴聚集之地（曹操時將匈奴分為：左、右、北、南、中部，其地皆在今山西省），受匈奴五部擁立起而建立政權，定國為「漢」（其後其侄劉曜篡位，改國號為趙，史稱前趙，但應稱「漢趙」較合史實，如僅稱趙或前趙，則置劉淵於何地？），時為西元 304 年，也從此掀起北方諸胡族建立漢魏式政權的序幕。

按匈奴單于一系，原姓彌鞮氏，但到東漢之後，北匈奴西徙，南匈奴勢衰力微，遂以自冒頓單于以來，常與漢和親，漢室劉氏乃匈奴舅家，遂冒姓劉氏，「漢趙」或前趙後被羯族石勒所建後趙攻滅，匈奴貴族劉氏乃各率其部眾散布今山西、內蒙一帶，其中有劉衛辰者，曾降服於氐族前秦苻堅，使統一方之眾，劉衛辰有子劉勃勃，勇而有謀，苻堅敗於淝水後，羌族姚氏趁勢建立後秦，劉勃勃曾臣於後秦，後又叛後秦自立，建立政權，國號為夏，時為西元 407 年，他在建立政權時，頗以前此隨母姓劉氏不妥乃下詔書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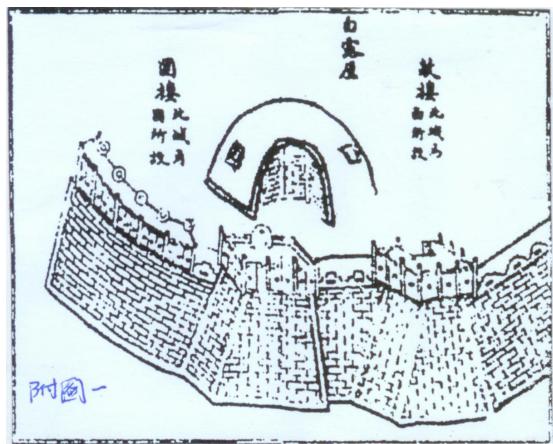
「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史記·匈奴傳》稱匈奴之先出自夏后氏，而夏禹姓姒氏，故有此語），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為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為姓、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繫天為子，是為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名為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見《晉書·赫連勃勃載紀》）

從而可見「赫連」之姓乃是漢語，向者多有人認為「赫連」係匈奴語，非也。赫連勃勃既建立夏政權，於西元 413 年（赫連勃勃鳳翔元年）在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建都城，以便「君臨天下，統御萬邦」，名其

城爲「統萬」，所謂朔方水，就是無定河，以此河水流徙不定故稱無定河，此河源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原伊克昭盟，2011 年改市）烏審旗境，由黑水（今名哈柳圖河）、金河（今錫拉烏蘇河）及奢延水（今名額吐河）三河匯流而成，無定河雖非源遠流長的大河，但其周邊卻是古往今來有名的兵家必爭之地，多少青年男子埋骨於此，所以在歷史上無定河名氣頗大，唐代詩人陳陶就曾以《隴西行》爲題，敘述無定河是多少戰士的墳場，全詩四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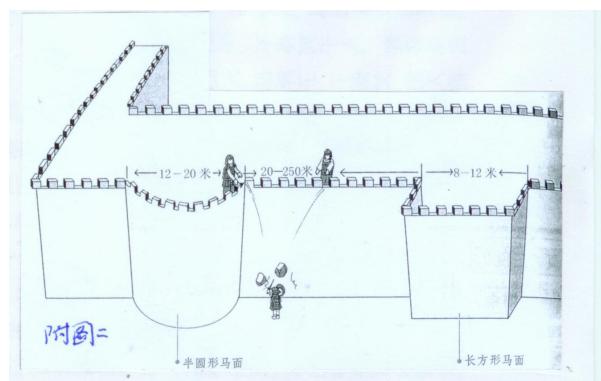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



讀來令人感傷不已。赫連勃勃選在無定河畔建築統萬城，自有其眼光獨到之處，而且這座統萬城的建築方式更是匠心獨具，可說是巧奪天工，除了堅固之外，在城牆每隔一段距向外凸出一部分，稱爲「馬面」（見附圖一），因爲城牆均與地面呈垂直狀態，會形成死角，敵人一旦靠近城牆，守城的人就對之莫可奈

何，因此一般城牆都築得很厚，但只要敵人一旦躲在死角，只要假以時日，再厚的城牆也被挖破的一天，但是如有了凸出的馬面，等於消滅了死角，如此就不必耗費太多的人力、物力去修築很厚的城牆，「馬面」是防禦戰術上的一項重大發明，而這項重大發明，是出於赫連勃勃，沈括對這項發明給予正面評價。另有一說指馬面也可築成半圓形（如所附圖二），則防禦效果更佳。統萬城（也就《筆談》所指的赫連城）從赫連勃勃鳳翔元年（413



年)開始興建到鳳翔六年(418年)始告完成，北魏酈道元於其所著《水經注》中，曾提到統萬城，說北魏後期統萬城仍然「崇墉若新」，此時上距統萬城之建築完成已經一百多年(按酈道元卒於527年)，沈括曾任酈延經略使，親自到過統萬城，上距城之築成已經五百多年，而且還完好如初，可是後來為了守不住這些地方，又不願被西夏占有，強以人力加以摧毀，而今統萬城只臘下破垣殘壁埋在滾滾黃沙之中。

六、狄青妙計欺敵致勝

《夢溪筆談》卷十三《權智》，記載了兩則有關狄青卻敵及窮寇莫追事跡，茲將妙計欺敵制勝原文引錄如下(窮寇莫追原文略，僅略加敘述)：

「寶元中(寶元為宋仁宗趙禎年號共三年，1038~1040年，寶元中應為1039年)，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青為將，一曰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眾，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才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卻。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也。」

狄青(1008~1057年)，北宋汾州西河人(汾州地當今山西省呂梁市汾陽市)，北宋仁宗寶元初為延州指揮使，勇而多謀，時范仲淹為經略使，教以兵法，狄青因折節讀書。當時党項西夏經常入侵邊塞，其時新招募的「萬勝軍」，都還沒經過訓練、也是沒有戰鬥經驗的新兵，所以每遇敵人，大多戰敗，狄青擔任這支軍隊主將後，有一天把萬勝軍的旗幟全部交給虎翼軍，讓虎翼軍出戰党項軍一見是萬勝軍的旗幟，就相當輕視，乃全軍出擊，結果被虎翼軍(拿的是萬勝軍的旗幟)，党項軍被打得幾乎全軍覆沒。另一次，狄青駐守涇原，曾經面臨我寡敵眾的情形，必須出奇始有勝算，於他下令部隊把弓，弩都扔掉，聽到第一聲鉦響時，就停止前

進；聽到第二聲鉦響時，就整好隊形佯裝要退卻，鉦聲停止時，就大聲呼叫向敵營衝殺，士兵，都照他所命行事，結果兩軍相遇，還沒有交戰，立刻鉦聲就響了，部隊立即停止不動；當鉦聲第二次響起時，士兵都整理好隊形，像是要撤退的樣子，党項軍見狀大笑，彼此說：「誰說狄天使勇武呢（党項稱狄青爲天使）？」就在此時，鉦聲突然停止了，宋軍立刻高呼衝向敵人，党項軍由是大亂，互相殘踏而死的不計其數，狄青妙計欺敵致勝，相當令人敬佩。

至於狄青認爲窮寇莫追，保全部隊生命比建立奇功更爲重要，同樣在《筆談》卷十三《權智》中，有一則提到狄青駐守涇原時，與與党項交戰，獲致大勝，並追擊西夏軍好幾里只是忽見敵軍擁塞在山道上，很可能是前面遇到險阻，宋軍將士們都希望趁機全力追擊，可是狄青卻下令鳴金收兵，敵軍得以撤退。事後探勘那個山道果真前臨深淵，部將們都深悔當時沒有全力攻擊，但是狄青卻說：事情不是這樣的，當時正在逃命的敵軍，突然停下來，怎知沒有陰謀，我軍既已獲得大勝，萬一中了敵軍的圈套，不但前功盡棄，現在是死是活都還難說，窮寇莫追古有明訓，保全部隊比建立奇功還重要。這真是至高的兵法，試想漢代名將李陵，雖然勇猛無比，屢建奇功，可是他的部隊也往往死傷慘重，狄青的是名將。

七、李繼隆出其不意，擒獲西夏李繼捧

西夏爲党項羌，係羌族之一支，但西夏的統治階層，則可能與鮮卑禿髮（即拓跋）部有血緣上的關聯，唐太宗李世民於其貞觀九年（635 年）派大軍討伐吐谷渾（其統治階層係族出鮮卑慕容部，係慕容廆之庶兄吐谷渾之後人），此際諸多羌人部落見唐軍威盛壯，紛紛降於唐，唯拓跋赤辭所部堅不肯降，其與鮮卑吐谷渾必有密切關係可知，後唐太宗派岷州都督李道彥前往勸拓跋赤辭降唐，此際赤辭之侄拓跋恩頭也力勸與其勉戰以致族滅，不如降唐，自是拓跋赤辭始降唐，此拓跋赤辭及其所統之眾就是党項羌，因此其與鮮卑禿髮或拓跋部有血緣上之關係，應屬可以理解，党項拓跋赤辭既降唐，唐乃賜以李姓。之後党項羌逐漸遷往洮州、渭州折而已上至慶州而夏州，落腳黃河以南之平夏部，從此立住陣腳，並以李爲姓，平夏部位置偏西，是由內地稱之爲西夏，但此爲「他稱」，党項於建立政權後自稱「大夏」或「大白上國」、「白上大夏國」。自是代代相傳，至

北宋太宗淳化年間（淳化共五年，自 990~994 年），党項李繼捧及其弟李繼遷叛服無常，宋朝派李繼隆率軍討伐，李繼隆所率的軍隊人數並不多，於是飛快趕到克胡（地名），渡過黃河進入延福縣境內，從鐵茄驛連夜進入綏州後，正在思考下一步進攻方向，李繼隆想直接進襲夏州，但部將有人認為夏州是敵軍統帥所在，必然有重兵駐守，而我軍兵少，恐攻之不易，不如先占領石堡，觀察党項的動向。但李繼隆認為：正因我軍兵少，如果直接進擊夏州，就能出其不意，何況對方尚不知我軍究竟有多少兵力；如果先攻石堡，則我寡敵眾情勢已經暴露，那有再進擊夏州的可能？於是領軍飛速趕到撫寧縣，李繼捧還不知道宋軍已兵臨城下，只得倉皇出城應戰，由於沒有充分準備，李繼捧戰敗被宋軍所俘押送朝廷，李繼捧只得降宋，但其弟李繼遷繼續統領党項之眾與宋朝對峙，至其孫、李元昊（恢復党項名嵬名囊霄）正式稱帝，時為西元 1032 年，西夏之稱帝始於李元昊，一直延續到 1227 年，始被蒙古成吉思汗所徹底攻滅。李繼隆之臨陣判斷的是正確。



八、宋將換弓欺敵獲勝

宋神宗趙頊（1068~1085 年在位）熙寧年間（熙寧共十年，1068~1077 年），西夏梁太后領兵進犯慶州的大順城，由於敵眾我寡，只得據城以守，但西夏軍圍城不退，如果時日一久，城內恐有糧食不繼之危，宋守城的將領林廣乃想出欺敵之策以期退敵，遂命守城士卒改用射程不遠的弱弓弱箭，西夏圍城的軍隊就根據這些弱弓弱箭的射程，漸漸向城牆逼近，到了一定距離，林廣下令換上強弓勁弩，密集射向圍城的党項軍，敵軍多被射死，遂相擁而潰退。這一段也是出現在《筆談》卷十三《權智》，原文如下：

「熙寧中，党項母梁氏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帥遣別將林廣拒守，虜圍不解。廣使城兵皆以弱弓弩射之。虜度其勢之所

及，稍稍近城，乃易強弓勁弩叢射，虜多死，遂相擁而潰。」

《筆談》的「党項母梁氏」，是指西夏毅宗李諒祚的皇后，這個皇后原是權臣沒藏訛龐的兒媳婦梁氏，李諒祚看上了梁氏，與之勾搭成姦，事為沒藏訛龐父子察覺，綠雲罩頂，是可忍，孰不可忍，沒藏父子遂設計要在梁氏的寢室中誘殺李諒祚，沒想到沒藏父子在密議時，被梁氏竊聽到，趕忙通知李諒祚，諒祚佯作不知，以計誘擒沒藏訛龐，消滅了沒藏家族在西夏政壇的勢力，把梁氏立為皇后，梁氏家族從此躍上西夏政壇的勢力，梁氏掌握西夏大權，生下李秉常，及至西元 1067 年李諒祚崩逝，由李秉常嗣立為帝，是為西夏惠宗，李秉常嗣位時，年僅七歲，梁氏以太后之名垂簾聽政，梁氏一族把持西夏政秉，梁后之弟梁乙埋為國相，而梁氏又與党項強宗大族都羅尾以及岡萌訛交好，以平衡党項與漢人之間的關係，不僅如此，岡萌訛更成為梁太后的面首，梁太后之私通岡萌訛，或許純出於男女私情，但也可能出於岡萌訛是党項大族，有相當勢力，梁太后與之私通，可以引為外援，既滿足了私慾也維護了政權，可見梁氏不僅姿色姣艷（否則何能引致李諒祚與之私通），而且富於政治手腕，使岡萌訛甘為其面首，梁氏可說是相當利害的角色，只是沒想到親自率兵包圍北宋大順城時，卻被北宋守將林廣以弱弓弱弩所欺，貿然逼近城牆，結果林廣命士卒易以強弓勁弩，吃了一個大敗仗，狼狽而退，可見臨陣作戰機智更勝於勇力。

九、黑山、黑水

說起黑山，就自然會想起《木蘭詩》裡的：「……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見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373~374），但黑山究何所指，歷來有諸多說法，如近人姚大榮氏於其所撰《木蘭從軍時地表徵》一文，就指黑山是阿巴漢喀喇山，也就是殺虎山，在殺虎口東北九十里，但從地圖上看，便知從黃河到殺虎口，非朝暮可達，是則黑山未必就是阿巴漢喀喇山（殺虎山）。但沈括在《夢溪筆談》卷二十四《雜志一》也提到黑山，且看他怎麼說：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同漠）之北，今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余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余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底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為龍，盧龍即黑水也。黑水之西南有連山，謂之夜來山，極高峻。契丹玟墓皆在山之東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上，有龍舌藏于廟中，其形如劍。山西別是一族，尤為勁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達靼』接境。」

後這段記載來看，沈括曾奉命出使契丹，曾在黑山下搭帳過夜，稱黑山在大漠以北，這裡的大漠，不是指橫亘於今內、外蒙古的大戈壁，只是今內蒙古的某個小沙漠，北宋時稱聚居在這裡的人為「姚家族」，有城在黑山的西南，稱之為慶州，經查譚其驤所主編之《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宋、遼、金時期》，遼的慶州，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烏珠穆沁旗之東南、赤峰（原昭烏達盟）市之西北，在慶州稍北有黑水鎮（見《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頁 7，上海地圖出版社，新華書店發行，1982 年），這座黑山顯然與《木蘭詩》中的黑山無關，《筆談》中指稱：「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極高峻，契丹玟墓皆在山之東南麓。」這裡沈括可能把方向搞錯了，按遼代在慶州的東南有祖州，契丹先人之陵寢多在祖州，祖州地近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左旗，遼臨潢府附近。《筆談》中的連山，可能是今之大興安嶺，而祖州正好在大興安嶺的東南麓，《筆談》中稱在連山之西者為「山西族」，極為勁悍，啖生肉血，不火食，指的可能是塔塔爾部或蒙古部。至於「北與黑水胡、南與達靼接境」，「黑水胡」可能是黑水靺鞨，而達靼可能是指後來的汪古部。

十、元昊自立

党項羌雖早在唐貞觀年間（貞觀共二十三年，627~649 年）其首領拓跋赤辭已漸露頭角，但一直到 1032 年其首領元昊始正式稱帝，其間經過三個世紀多，唐代賜拓跋赤亂姓李氏，及至宋朝建立，又賜党項酋姓趙氏，因此有稱元昊為李元昊者，也有稱之為趙元昊者，其實党項首領之接

受賜姓，只是貪圖中原王朝豐厚的賞賜，對內仍一本其原有之姓，元昊稱帝後就自稱姓名爲「嵬名曩宵」，又自稱「吾祖」或音譯爲「烏朱」、「兀卒」，在党項語裡有「青天子」之意，如此一來就可以與漢人天子平起平坐，而且他用漢字「吾祖」兩字音譯党項語「青天子」，可以看出他想在這種小地方討便宜，這正可以反應出他對漢文化懷有自卑感，所以要在文字上呈現自大感，這與中原王朝動輒賜邊族以國姓，同樣是無意義的動作。且看《夢溪筆談》如何描述天昊稱帝：

「景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官楊告入蕃吊祭。（楊）告至其國中，元昊遷延遙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於人』既而饗告于廳，其東屋後若干百人鍛聲。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秘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朝廷興師問罪，彌歲，虜之戰士益少，而舊臣宿將如剛浪、凌遇、野利輩，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稱蕃。朝廷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兀卒曩霄。慶曆中，契丹舉兵討元昊，元昊與之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加重。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此之眾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陣。元昊又為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餘里，每退必盡焚其草萊，契丹之馬無所食，因其退，乃許平。元昊遷延數日，以老北師。契丹馬益病，亟發揮攻之，大敗契丹於金肅城，獲其偽乘輿、器服、子婿、近臣數十人而還。」

這一段敘述元昊稱帝經過，及其與契丹交戰情形，談及党項軍撤退時採堅壁清野之策，使契丹軍馬無草可食，可見元昊乃有勇有謀者。接著《筆談》以一段敘述元昊與其子寧令哥的關係（《筆談》作寧令受，略有不同），上引景祐，是宋仁宗趙禎年號，共五年（1034~1038年），景祐中約爲1036年，党項首領趙德明（原爲李德明，以宋朝賜姓趙，故沈氏作趙德明）卒，宋朝派郎官楊告前往吊祭，楊告已經察覺元昊態度不恭，

必會自行稱帝，但返回後，居然不敢向朝廷說明，如此使節，實屬有虧職守。回過頭來看，沈括在《筆談》中敘述到元昊與其太子寧令哥的關係，雖然文字較多，但沈括與元昊是同時代的人，所述自有其價值，其原文爲：

「先是，元昊之后生一子，曰寧令受。『寧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藏訛龐之妹，生諒祚而愛之，寧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沒藏氏，授戈于寧令受，使圖之。寧令受間入元昊之室，卒與元昊遇，遂刺之，不誅而走，諸大佐沒藏訛龐輩撲寧令受，梟之。明日，元昊死，立諒祚。……」

這一段敘述與一般有關西夏文獻頗有出入，實有加以補正必要，按元昊後宮到底有幾個后妃，從文獻上看有八個：契丹的興平公主耶律氏、皇太后的姪女衛慕氏（也是元昊的表姐）、索氏、多拉氏（或作都羅氏）、密克默特氏（或作咩迷氏）、野利氏（或作葉勒氏）、沒移氏（或作摩移克氏）、沒藏氏。其中野利氏生子寧令哥，被立爲太子，母以子貴，野利氏遂立爲后，野利氏家族兩個哥哥野利旺榮與野利遇乞也水漲船高得到元昊的重用，前段沈括說元昊命（野利）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也就是野利遇乞創制了西夏文，如所周知創制文字是一項艱鉅的工作，西夏文之創制自有歷史意義，可見野利遇乞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不僅有才華，而且還能征善戰，讓宋朝很頭痛，想用招降的方式，許以重利，但是野利遇乞不爲所動，又想派刺客去西夏進行暗殺，也沒得逞，後來宋朝青潤城守將種世衡用了反間計，元昊果然上當，殺了野利遇乞，爲宋朝除去一個大患。

野利遇乞死後，其妻沒藏氏先是出家爲尼（党項族極其佞佛），然而她年輕貌美，元昊對她一見鍾情，極迷戀，把她從佛寺中接回宮中通私，可惜被野利氏發現，很可能與元昊吵了一架，元昊只好把沒藏氏送到興慶府戒壇寺再度爲尼，可是元昊並未斬斷情絲，仍然繼續私通，而且還生一子，取名寧令兩岔，後來改名諒祚。原來太子寧令哥長得很像元昊，很得元昊的寵愛，因而從小嬌生慣養，相當任性，長大後元昊爲他選妃，選定党項大族沒移皆山的女兒爲太子妃，後來元昊見到這位未來的太子妃有羞花閉月之容，沈魚落雁之貌，竟然據爲己有，稱之爲「新皇后」，這對寧

令哥的母親野利氏而言，是一項挑戰，對寧令哥而言更是莫大的恥辱，於是有了《筆談》中所說野利氏授戈寧令哥刺殺元昊之事，只是《筆談》中漏了元昊搶娶寧令哥未婚妻沒移氏這一段（詳情可參看劉學銚《神密的黑水城——西夏王朝》台北風格司藝術創造坊，2012年，頁178~181）。

十一、遼帝祝宋主千萬歲壽

自遼宋訂《澶淵之盟》遼宋之間大致和平相處，而每逢新正，或雙方君王壽誕，或駕崩，雙方均會派使慶賀或吊唁，因此宋遼之間常有使者往來，宋仁宗慶曆年間（慶曆共八年，1041~1048年，湖南岳陽樓即成於慶曆四年，范仲淹曾為之作序），宋朝派王君貺使契丹（貺音況，賜予、加惠之意，也有遺留之意）。遼主宴王君貺於混同江邊，觀釣魚，契丹主置酒賜宴並對王君貺說：「南北修好已久，只恨沒有親自去見一見，南朝兄皇帝，（當時遼稱宋為南朝，宋遼約為兄弟，所以才有此語）託卿（指王君貺傳一杯酒），當時遼主為遼興宗耶律宗真，親自斟酒以相當誠懇、恭敬的態度把酒交給王君貺，又親自鼓琴瑟，祝南朝宋仁宗千萬歲壽，之所以如此者，沈括在《筆談》中有所分析，沈括是當時的人，可以說是身在歷史事件中，所說自有其可信度，且看《筆談》如何記載此事：

「慶曆中，王君貺使契丹。宴君貺於混融江（應即混同江），觀釣魚。臨歸，戎主置酒謂君貺曰：『南北修好歲久，恨不得親見南朝皇帝兄。託卿為傳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親授君貺舉杯；又自鼓琴瑟，上南朝皇帝千萬歲壽。先是，戎主之弟宗元為燕王，有全燕之眾，久畜異謀。戎主恐其陰附朝廷，故特效恭順。宗元後卒以稱亂誅。」

十二、以契丹語入詩

北宋曾派刁約出使契丹，刁約在飲宴之餘，曾以契丹語入詩，按契丹為鮮卑之遺胤，其語屬阿爾泰語系，在語言類型上為膠著語型，與漢語的孤立語型，有極大的差異，阿爾泰語系為多音節語，要以之入詩，有其難度，《筆談》提到刁約使契丹時，就曾以漢字音譯契丹語入詩，其詩曰：

「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

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狸。」

每句後三字都是契丹語的音譯，「移離畢」，或作夷離畢，係契丹官名，據《遼史國語解》指即參知政事，後置移離畢院以掌刑政。「賀跋支」，如執衣防閣。「匹裂」，指小木罌（罌，原為陶製容器，口小肚大，但此處標明為木罌，則其為木製小口大肚之容器），以色綾木為之，如黃漆。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穀梁，嗜肉，狄人視為珍膳，味如獐子而脆。就沈括氏對貔狸之解釋，貔狸似為今日內蒙人俗稱之「旱獺」，今日尚有人以之為珍餚。以漢字音譯胡語入詩，有其難處，必須深解胡語，從刁約能以契丹語入詩，可能北宋時，漢人頗有能契丹語者。除刁約使契丹以契丹入詩外，北宋尚書余靖也曾出使契丹，余靖也曾以契丹語入詩，其詩曰：

「夜筵設罌臣拜靖洗，兩朝厥荷情幹勒。」

「微臣稚魯祝若統，聖壽鐵擺俱可忒。」

詩中首句的「設罌」或作「設邏」，因字形相近，或刊刻之誤，究以何者為是，至今未有定論，其為契丹語的音譯，則無疑義；其意為「侈盛」或「厚盛」。「拜洗」也為契丹語，意為「受賜」。「厥荷」意為通好。「情幹勒」或作「情幹勒」，「幹」、「幹」當係字形相近，而有刊刻之誤，其意為厚重。「稚魯」或作「雅魯」，意為拜舞，北方胡族每遇吉祥，足以慶賀之事，每每起而舞蹈。「若統」，意為福佑。「鐵擺」意為嵩高。「俱可忒」意為無極。（以上請見宋人葉隆禮《契丹國志》，台北廣文書局，1968年，頁201。另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有賈敬顏、林榮貴點校本問世，頁264有較詳細之注釋，可資參考），從上引余靖詩中可看出其出使契丹，乃是為祝契丹主壽誕，余靖詩罌，契丹國主欣然「舉大杯，謂余（靖）曰：『能道此，余為卿飲』復舉之，國主大笑，遂為醻觴。」（見《契丹國志》）「醻」同酬；「觴」為盛有酒之杯。「遂為醻觴」意為「又舉杯勸酒。」從上引兩例，可知當時宋廷頗有能知契丹語言者，以知曉契丹語者出使契丹，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如進一步看，語言只是人與人之間交通（溝通）之工具，不必賦予任何政治含義，能掌握越多的工具（指語言），越有利於交通（溝通），當時契丹自帝王以至平民，也多習漢文經典、語文；如遼道宗耶律洪基時，曾請漢人為其講解《論

語》，據宋人洪皓所著《松漠紀聞》有如下一段記載：

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道宗曰：『北極之下為中國，此豈其耶？』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

（按洪皓，宋時人，於南宋高宗趙構建炎三年（1129年）出使女真金，被金拘十五年始返，期間多據傳聞載錄金朝政事，稱《松漠紀聞》，於南宋高宗紹年間（1131~1162年）由其長子洪適編刊付梓，有正續二編；南宋孝宗趙眘（音大）乾道（1165~1173年）間，由其次子洪遵又增補所遺十一事，以洪皓所居留之冷山為唐松漠都督府，故題書名曰《松漠紀聞》此書台北商務印書館於1979年以舊木刻版影印出版，字跡多模糊不清。另上海古籍出版社由陽羨生校點、略加箋注，以鉛排出版輯入《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列頁2788~2810）

可見契丹朝野也在學習漢文化，其後女真金滅遼之後，根本把在華北的契丹人，視同漢人，而蒙古滅金之後，更將在華北的契丹人、女真人及原來的漢人統稱為漢人，可見民族之混化，乃是人類歷史演化之必然趨勢。

十三、青堂之吐蕃

吐蕃，清以後稱西藏，吐蕃，應讀為「圖伯」、「圖博」，此因唐時「番」字讀音為「伯」或「鉢」，至今播、鄯、幡、幡等以「番」為字根的字仍讀為「伯」或「鉢」，「吐」則是形容詞，為漢字「大」字之音訛，吐蕃語法是把形容詞置於名詞之後，吐蕃語「大」，音譯為「青布」，所以最初與唐廷來往文書都自稱「蕃・青布」，唐人不解其意，遂依唐人習慣作「大蕃」，而唐時讀「大」字若「吐」（今吳儂方言讀大字仍帶有吐音），遂以吐蕃之名，為中原所習知，直到清朝將之納入版圖後，才改稱西藏。

吐蕃王朝在唐代曾盛極一時，疆域遼闊，不僅擁有河湟地區，更擁有河西走廊、天山以南乃至今中亞東部，甚至一度攻入唐都長安，然而至郎

達瑪滅佛之後，吐蕃王朝崩解，部落林立，不相統屬，直到蒙古興起，眼見眾多吐蕃依山據谷，各自爲政，乃稱之爲「吐蕃特」、「圖伯特」，此因蒙古語之複數形在語尾加「特」音，如眾多之瓦刺稱「衛」刺特」然，從此乃有「圖伯特」一詞，西方據以音譯爲 Tibet，今日藏獨分子以爲西藏係中國舊有詞匯，圖伯特始是新稱謂，其實圖伯特（Tibet）乃是更古老之中國詞匯（元朝係中國正統王朝之一，且有兩部《元史》傳世），搞政治運動，而對歷史無知，何其荒謬。

且說吐蕃王朝崩解後，部落林立各自爲政，有關其時河隴地區混亂情形，今人祝啓源著其夫人趙秀英整理之《青唐盛衰一唃廝羅政權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出版）有極詳細之敘述，於此不贅。沈氏《筆談》中之「青堂」，就是青唐，且看《筆談》如何敘述（《筆談》列卷二十五《雜志二》）：

「青堂羌本吐蕃別族。唐末，蕃將尚恐熱作亂，率眾歸中國，境內離散。國初，有胡僧立遵者，乘亂挾其主箋逋之子唃廝囉，東據宗哥邈川城。唃廝囉人號瑕薩箋逋者，胡言“贊普”也。唃廝，華言“佛”也；唃，華言“男”也。自稱佛男，猶中國之稱天子也，立遵姓李氏，唃廝囉立，立遵與邈川首領溫（音溫反）。逋相之，有漢隴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宗哥邈川，即所謂“三河間”也。祥符九年，立遵與唃廝囉引眾十萬寇邊，入古渭州，知秦州曹瑋攻敗之，立遵歸乃死。唃廝囉妻李氏，立遵之女也，生二子，曰瞎氈、磨氈角。立遵死，唃廝囉更娶喬氏，生子董氈，娶契丹之女為婦。李氏失寵，去為尼；二子亦去其父，瞎氈居河州，磨氈角居邈川。唃廝囉往來居青堂。趙元昊叛命，以兵遮廝囉，遂與中國絕。屯田員外郎劉渙獻議通唃廝囉，乃使渙出古渭州，循末邦山，至河州國門寺，絕河，逾廊州，至青堂，見唃廝囉，授以爵命，自此復通。磨氈角死，唃廝囉復取邈川城，收磨氈角妻子，質于結羅城。唃廝囉死，子董氈立，朝廷復授以爵命。瞎氈有子木征，木征者，華言“龍頭”也。以其唃廝囉嫡孫，昆弟行最長，故謂之“龍頭”。羌人語倒，謂之“頭

龍”。瞎氈死，青堂首領瞎藥雞羅及胡僧鹿尊共立之，移居滔山。董氈之甥瞎征伏，羌蕃部李鉞星子之也，與木征不協，其舅李篤氈扶瞎征居結古野反。河，瞎征數與篤氈及沈千族首領常尹丹波合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鄉城。有巴斯溫者，唃氏族子，先居結羅城，其後稍強。董氈河南之城遂三分：巴欺溫、木征居洮河澗，瞎征居結河，董氈獨有河北之地，熙寧五年秋，王子醇引兵，始出路骨山，撥香子城，平河州。又出馬蘭州，擒木征母弟結吳叱，破洮州，木征之弟已氈角降。盡得河南熙、河、洮、岷、疊、宕六州之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西一千餘里，降蕃戶三十餘萬帳。明年，瞎木征降，置熙河路。」

上列引文之「餽通」乃吐蕃君王「贊普」之另一漢字音譯；「祥符九年」指北宋真宗趙恒年號，共九年（1008~1016 年），其九年即西元 1016 年。

十四、娼婦退西夏兵

如所周知無論何種人，皆有可用之處，正所謂雞鳴狗盜皆有可用之時，宋神趙頊元豐中（元豐共八年，1078~1085 年），元豐中當為西元 1081 年左右，當時西夏皇帝李諒祚之母梁太后派兵到宋保安軍順寧寨，將順寧寨圍了好幾層，寨中兵少；人心危懼時寨中有老妓李氏，知道梁太后許多早年不堪聞問的醜事，於是李氏便掀開衣裳登上城牆，大聲漫罵梁太后，把那些見不得人的醜事都給抖了出來，使西夏兵將掩耳不敢聽，引弓射之，又射不中，李氏越罵越兇，西夏兵將判斷既射不中她，如果再耗下去，恐惹出是非，便藉口暇有他事，在半夜撤退了，這一段純屬滑稽式的記載，正史中自然不會有，但沈括是當時的人，應該是耳聞所得，有其可信度，當時順寧寨的守將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出此下策，也是情非得已，可見戰略並無一定的法則，而雞鳴狗盜也各有其用。《筆談》對這一段的原文為：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陰事甚

詳，乃掀衣登陴（意為城上之女牆），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皆掩耳，並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托以他事，中夜解去。雞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

十五、宋將智退西夏兵

這一則是出自《夢溪筆談》補筆卷二《權智》中首則，其原文為：

「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曰，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我虛實。邏得之，索其衣緣中，獲一書，乃是盡記熙河人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支解以殉。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面『蕃賊決訖放歸』，縱之。是時適有戍兵步騎甚眾，芻糧亦富。虜人得諜書，知有備，其謀遂寢。」

這段文字中的西戎，是指西夏，從這段文字可看出宋王子醇頗有智慧，縱放西夏「間諜」，消彌了一場戰爭。

十六、老軍校穩定軍心

老兵由於經驗豐富，往往具有穩定軍心的作用，宋仁宗趙禎寶元元年（1038年，寶元共三年），西夏大軍包圍延安七天，宋以侍郎范雍為帥，頗感不安，不免憂形於色，此時有一個老軍校宣稱：他自己是邊地人，遇到敵人圍城，已經有很多次了，有時情況危急更甚於今日，但西夏不善攻城，所以不必擔心，如有意外，可以殺了他，經他這麼一說，范雍才放下心來。事後對老軍校加以獎賞，並問他何以敢拿生命保證，老軍校笑著說：想想看，如果城被攻下豈有活命，因此我那麼說，旨在安定人心而已，這真是老經驗才說得出的話，《筆談》原文如下：

「寶元元年，党項圍延安七日，鄰于危者數矣。范傳郎雍為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于今日者，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測，某甘斬首。』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為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當敢肆妄言，萬一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君未之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殺我耶？聊欲安眾心

耳。』」

參、結語

《夢溪筆談》雖然不能作正史看，但沈括的時代，恰是遼、西夏與宋並存的時代，因此在《筆談》涉及遼與西夏之事，等於當時的「時事」，正可以補正史之不足，正是《夢溪筆談》可貴之處。向者評論《夢溪筆談》多著眼於其在科技上之實證精神，鮮少談及其涉及契丹、西夏史事，經詳讀一過，其與契丹、西夏或邊疆有關者，有約二十餘則，茲擇其十六則分析如上，對研究北宋時期其與契丹、西夏關係或有所助益。

西藏阿裏古格佛教壁畫中的人體藝術

周菁葆

海口經濟學院藝術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

摘要

西藏阿裏古格佛教壁畫中的人體藝術是在悠久的形成發展歷程中，繼承和弘揚了藏族優秀的民族民間藝術傳統，同時又是吸收和融合著多種外來藝術的精髓而創造出來的藝術珍品。古格壁畫藝術的特色是把人體上升為藝術來進行欣賞，把女性作為天女進行描繪，有許多堪稱絕妙的人體藝術作品。阿裏古格佛教壁畫藝術不愧是西藏高原藏民族悠久歷史文化發展進程中的恢巨集畫卷。

關鍵字：阿裏、古格、佛教、壁畫、人體藝術、研究

西藏阿裏古格藏傳佛教壁畫藝術是藏民族歷史上繼吐蕃王朝時期佛教前宏期美術之後興起的又一重要高潮，史稱藏傳佛教後宏期美術。其佛教石窟的規模眾多和壁畫數量空前的宏篇巨構承啓著後宏期佛教美術的嶄新局面，統領著一方神聖佛國淨土。就其壁畫的表現形式、內容、色彩、線條、裝飾、造型等藝術特色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和表現出的高格調的審美特徵，也再現了藏民族原始美術和藏傳佛教文化一脈相承的深厚源流。

尤其是阿裏古格壁畫中精湛的人體描繪數量之多，繪畫技藝之高超，旋示著藏族遠佔先民拙樸的神秘意景和高度發達的多元一統的高品位文化格調，顯示了古格王國強烈的民族性、神聖的宗教性和神秘的地域色彩。

第一節 古格王國的建立

古格王國位於阿裏劄達縣城西約 20 公里，距北面的象泉河約 4 公里。都城建在高 200 多米的土山上，山上房屋、窯洞星羅棋佈，有房屋 400 餘間，窯洞 800 余孔，加上碉堡分佈，暗道聯通，規模龐大，毛勢宏偉。

朗達瑪的另一支後裔（第五代孫）柯日在阿裏地區（原屬西藏，後劃入新疆管轄）封建割據的古格王朝，大力發展佛教。柯日將王位讓給了弟弟松艾，自己出家為僧，取法名意希沃。實際上，柯日並未超脫世俗，他與山南桑耶寺的意希堅贊一樣，成了集封建王權與佛教教權於一身的特權人物。這正是“後弘期佛教”發展的特點之一，也是藏傳佛教形成的一個重要標誌。

仁欽桑波受柯日派遣，到迦濕彌羅學習密宗教法，七年後返回古格王朝。他一生翻譯了 17 種佛經、33 種說、108 種密宗經咒，以及醫藥、語法、工藝等方面的書籍，成為藏傳佛教的開創者之一。在西藏佛教史上，仁欽桑波被作為密宗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從他開始，以後翻譯的密宗經咒被稱為新密咒，以前所譯則被稱為舊密咒。藏傳佛教中密宗力量最強，久盛不衰，與仁欽桑波翻譯了大量密宗經典不無聯繫。古格王朝所處的阿裏地區是本教的聖地，據佛教中籍記載，仁欽桑波在芒域傳教時，降伏過代表本教勢力的魯噶甲。在這一過程中，也吸收了本教的一些內容。意希沃還請來東印度的達摩波羅等來古格傳授佛教戒律，使古格成了律學中心。

在藏傳佛教的形成過程中貢獻最大的還是被後人稱之為“佛尊”的阿底峽（982—1054）。阿底峽法名燃燈吉祥智，薩護羅（今孟加拉達卡地區）人，曾任印度那爛陀寺和超岩寺等 18 個寺廟的住持，名聲很大。他受意希沃邀請，在 60 多歲時（1042 年）到達古格王朝，受到了隆重歡迎。他精通“五明”，尤對密宗造詣高深，聽者無不欽佩。85 歲的仁欽桑波也深深為之折服，自願拜他為師，學習無上密乘。

阿底峽對發展藏傳佛教的最大貢獻是使之實現了教理系統化和修持規範化。在此之前，西藏佛教已經恢復了“朗達瑪滅佛”之前的聲勢，但對佛教的理論歧義甚多。無論是顯宗還是密宗，都沒有一定的準則。阿底峽完成了把戒律和密宗加以系統化的工程。他還針對西藏佛教界修持方面的弊病，撰寫了《菩提道炬論》這篇名著，提出了依法修習，秩序漸進的規

範，指引了從“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的具體途徑，對克服西藏佛教界的混亂狀況，促使藏傳佛教體系的形成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影響。阿底峽在古格王朝講法三年，於 1045 年應邀進入衛藏地區傳教。這在西藏佛教史上稱之為“上路弘法”。以阿底峽為代表的佛教復興勢力從阿裏地區傳入衛藏地區，可以視為藏傳佛教形成完整體系的標誌。

古格王國在西元 10 世紀至西元 17 世紀曾雄據一方，強盛時號稱有十萬臣民。

古格王國當年崇尚佛法，在遺址中留存的宗教建築有塔、塔牆及殿堂，現發現有 5 座殿堂保存較好：纖殿、白殿、度母殿、大威德殿、壇城殿。其中紅殿、白殿面積各約 400 平方米。

各殿中均保存了大量的壁畫，總面積約 800 平方米，壁畫雖已年代久遠，色彩仍鮮豔如初。壁畫內容主要分為宗教和市俗兩大部分。宗教內容主要題材為佛、菩薩、度母、金剛、高僧、佛傳故事禮佛圖等，市俗題材主要內容有運輸圖、習武圖、慶典圖等。

宗教內容的壁畫技法嚴謹，設色均勻，線條準確，佛等被描繪得莊嚴端正，護法金剛則露出兇猛猙獰之相，佛母、度母、供養天女等均描繪成身體修長、隆乳豐臀、腰肢婀娜、容貌嬌美的形象，基本上是半裸體描繪。慶典圖是紅殿中重要的市俗內容，壁畫中舞蹈、鼓樂、耍獅子、跑驢等數十人烘托出熱鬧的節日氣氛，生動真實的生活寫照給畫面提供即興發揮的餘地，場景多畫成長卷式。

第二節 阿裏古格佛教壁畫中的人體繪畫

《娥眉圖》。阿裏古格王國托林寺迦薩殿有一塊壁畫殘片，雖已殘破不全，但她的美麗足以打動我們。僅有的幾個手指畫得準確、嚴謹，又靈巧動人。嘴唇的表現較寫實，上唇左方右尖，方的一邊暗示了嘴角的透視遮擋，並清晰地畫了一排小牙齒。乳房凸現胸衣之外，且全部為側面，乳頭在右方。臉和乳房暗處如素描和蛋彩畫的排線用筆。過渡效果是靠筆觸的橫向排列來實現的。黑眼仁比較



大，顯得平靜而柔和，這種眼睛的造型成為最富標誌性的古格風格樣式的特點之一。（圖 1）

《十六金剛舞女》。如果選擇西藏繪畫中品位最高、畫技最絕的第一號作品的話，這組金剛舞女會被首先選中。她們上身赤裸，豐乳細腰、寬臀圓臉和小巧的手足，大尖角頭冠，古格式的美麗長眼，整個畫面幾乎見不到渲染而加強了線描的表現力。（圖 2）她們美麗動人，如有神助的勾線技藝更增添了幾分超凡脫俗的天界品格。姿態婀娜、身段豐腴、腰肢扭動、飄帶翻飛，是用極盡素雅的白描略施土紅來完成的。線描之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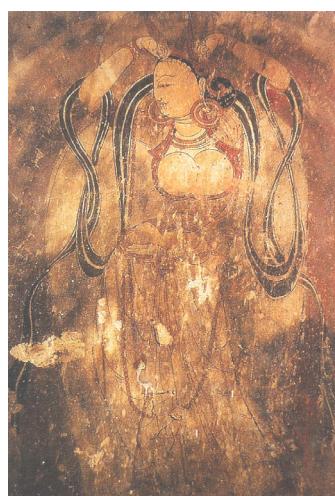


活、圓潤、流暢已達妙造自然之化境，令人稱奇叫絕，歎為觀止。（圖 3）在這裏性感含于質樸，嫋媚含于恬淡，美麗含于素雅，就是在古格藝術傑作迭出的全盛時代也不會再有這樣高不可攀的作品了。（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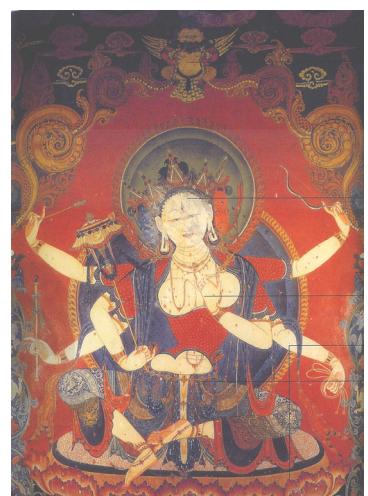
對比白殿的西元 14 世紀風格，《十六金剛舞女》應早於西元 14 世紀。迦薩殿是托林寺最早的建築，壁畫殘片《峨眉圖》的創作時間極亦有可能在 14 世紀之前。（圖 5）



（圖 4）



（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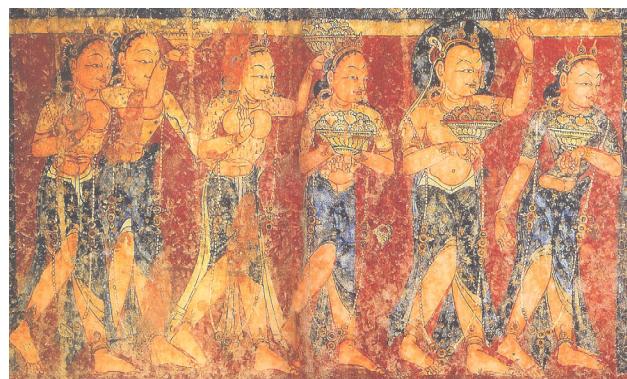
（圖 6）

《大白傘蓋佛母》。首先在構圖與色調上我們不難發現諸多“古格樣式”特徵的具體體現。全翅鳥、摩羯魚及尾部卷車。人物是西部特有的圓臉，簡潔的彎眉，細長的雙眼，眼長過眉，大尖角頭冠和細腰。兩邊飾異獸白獅。手足較小，指端尖巧有過指甲的上卷肉。佛母坐於被“牡丹花”化了的蓮花座上，裙上飾連珠和圓爲裝飾單元的西域細密圖案。（圖 6）

《人物圖案》。觀音服飾局部。衣裙圖案在此可更爲詳盡地認識清楚，這類圖案多以精密無比的白描組織而成，圖案下的彩條分離顯現，互無關聯。卷草環繞的圓形中有對頭而坐的半裸人物，有可變化爲四種組合的連體雙人、鳥、蓮花等圖案。（圖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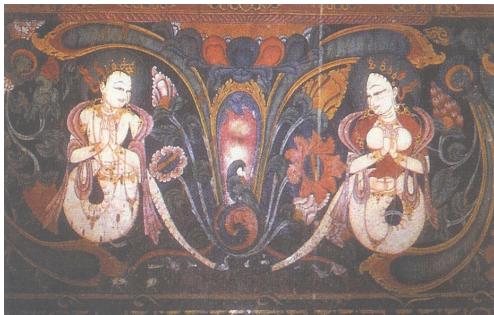
《供養天女》。選自西壁壇城的下方，是壁畫中著名的美麗局部。人物全是半裸上身，露乳胸衣，戴三葉冠，此三葉冠已被大大簡化，這種簡化的頭冠也是西部繪畫的代表性特徵之一。人物按一

種程式繪製如二方連續的圖案，人物發際線男爲方、女爲圓且有捲曲的劉海。（圖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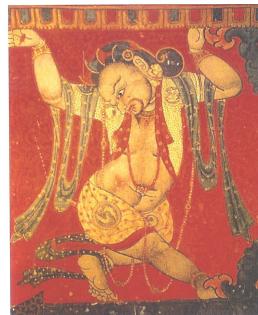


《龍人龍女》。飾主尊蓮台以下，統於一個和諧沉穩的墨綠色調之中，裸體人物的白色和淺色花卉在此對比中顯得明麗奪目。人物左右對稱，圖案化的龍尾如盛開著的花朵。人物皮膚用紅線勾勒，略施渲染，五官美麗動人，在冷色調中的人物有冰清玉潔的冷逸之氣。（圖 9）

《力士》。兩幅作品雖然表現的同爲力士題材，卻有著不同的造型性格，前者圓厚健壯如後期紅殿的力士，是半裸形式。後者用單色白描表現了壁畫中建築裝飾部分的石雕效果。（圖 10）



(圖 9)



(圖 10)

《舞樂天女》。這兩個舞女全赤裸上身，一個演奏絃樂器，一個翩翩起舞。（圖 11）人體沒有衣裙上的繁密圖案，但是突出乳房的描繪。其舞姿是明顯的西藏特點。人物面部特徵，是明確的古格樣式，表現出阿裏藝術獨立發展的特色。這一特色至古格王朝滅亡也不會有任何改變。（圖 12）



(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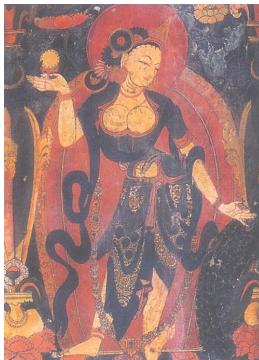


(圖 12)

《供養天女》。這些天女立於主尊佛像的兩側，主尊多嚴肅缺少變化和個性，在西藏壁畫中往往是次要人物。（圖 13）而供養人更顯出藝術魅力和美術史的價值。這組天女設色濃豔、裝飾華麗、舞步曼妙，奏琴、供水、供花、獻舞。（圖 14）特別是奏琴天女的畫法似又回到了 400 年前熱衷於明暗渲染表現立體的追求當中。這樣的風格表現在西元 15 世紀後的古格系繪畫藝術中是不多見的。（圖 15）（圖 16）



(圖 13)



(圖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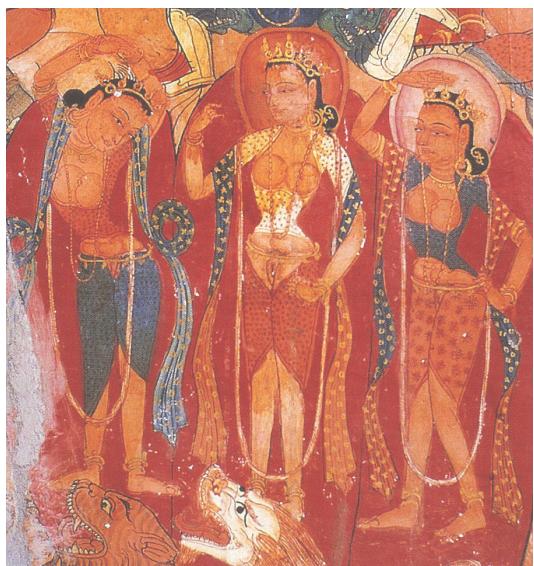
(圖 15)



(圖 16)

《降魔變》。佛傳故事如長卷展開，繞大殿牆裙一周，其中降魔一段最為強烈。群魔惡獸的形象生動鮮活、動態誇張、神情激越、色彩熱烈炫眼，與佛祖平靜端坐於樹下的形象成鮮明對照。動靜之間表現佛祖降魔時不為武力、色相、兇殘所動的巨大法力。造型單元都是圖案化的人物、動物、樹木、岩石都有很強的裝飾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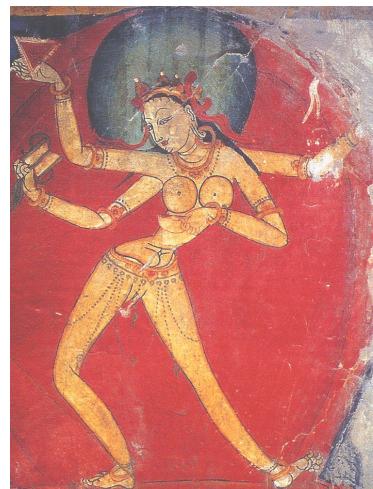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這裏同時又有著極不協調的“寫實”之處：那便是右邊三個美麗妖女（圖 17）的陰部，特別是中間一位小腹之下畫上了一個十分具體的女性生殖器，刺激感官的程度幾近淫穢。若不是在有著印度性力派影響的藏傳密教的環境之下，這樣的表達在西藏以外的宗教藝術中肯定是不被允許的。左邊是三個邪淫妖女被佛法降服後變成了醜陋的老太婆。在同一畫面中表現了時間的前後變化，這種表現連同這一主題的構圖佈局是遵照同一個傳統來完成的。在白殿亦有這種構圖的降魔變，在敦煌石窟、在新疆的克孜爾於佛洞、在印度的阿旃陀石窟都有與這一題材的相似構圖，“降魔變”已成固定樣式。無論在哪個佛教藝術傳統中出現都十分容易辨認。縱觀美術史，在眾多表現佛祖法力無邊的境界，不為魔力所憂，不為凡心所動的畫面中。採用的形象最大膽、最赤裸、最直接、最有力的當屬古格紅殿這一幅。那觸目的性器官應當是對信眾凡心的最好考驗吧。



《龍人》。在這個片段中我們可以感受藝術家們對造型的敏感和駕馭複雜色彩的能力。龍人們有著女子般美麗容貌，半裸上身，柔軟的身姿，恭順祥和的神情。色彩變化極為微妙，在大大降低了明度和純度的藍背景前紅、粉、橙、綠、灰各色身體有著精微的顏色差別，顯得明亮而柔和，最純的紅也獲得了沉穩深厚的質感。（圖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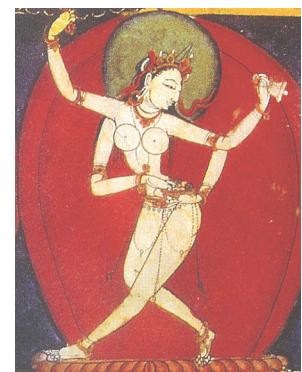
《供養天女》。（圖 19）它們同時也構成了西部古格樣式繪畫的一大特色。在密宗教義中血腥恐怖常與色豔情欲並存，表面看來似乎是走向了佛教持戒和禁欲的反面，這正是物極必反的道理在更高級的宗教修行中的體現。（圖 20）可簡單理解為“以毒攻毒”和“以欲克欲”。這組供養天女修長美麗，膚色各異，舞姿多變，四條手臂各持樂器、法器。（圖 21）全身裸露僅著寶冠纓絡。豐乳細腰，女陰外現。她們色豔之極又華美之至，是西藏美術史中人體藝術的巔峰之作。（圖 22）



（圖 20）



（圖 21）



（圖 22）

第三節 阿裏古格壁畫人體藝術的特點

西藏古格壁畫的人體造型法式、藝術風格明顯受印度阿旃陀石窟藝術及西域等多種文化的影響，但又特別注意體現古格自己娟麗、清俊、精細、質樸、寫實的特徵。佛像造型拉長了身段的比例，呈肩寬、身長、細腰，修身挺拔，突出體積感的肌肉表現，充滿了內在的生命活力，服飾簡約緊湊，面部短圓，眉彎眼大，嘴角類似希臘古風似的微笑與硬挺的肌肉表現構成一種力量感和柔美感。女性人體的表現尤其風采動人，呈 S 型扭動的形體，具有舞蹈般的律動感和節奏美。蜂腰溜肩，短袖緊身式的著裝，袒露著雙乳和腹部，下身著以精美圖案的長裙，面部表現亦嬌美可愛，具有獨特的風韻魅力。古格壁畫藝術的一大特色是把人體上升為藝術來進行欣賞，把女性作為天女進行描繪。蔓荼羅殿壁畫中供養天女組畫描繪的女性隆乳豐臀，腰肢婀娜，姿態靈動。手持各種器杖的全裸女性，堪稱絕妙的人體畫像，並有著意刻畫生殖器的跡象，在現有的西藏壁畫中是絕無僅有的。

古格壁畫中早期的壁畫，明顯帶有吐蕃晚期壁畫的風格，仍以紅綠色為主調，但也有些變化，主要以橄欖綠為底色，人物衣服以紅色平塗為主，佈局舒放，色彩凝重簡約。多半在以紅底色上進行白描，以方塊或分割構圖，佛像的臉部畫成桃型，佛像的眉眼畫法，也與其他寺廟明顯不同。其他寺廟的佛像都是眉下先鋪藍色褪底，然後留眉，眼睛內外角均塗紅色，這些從佈局、線條、敷色，都相對舒展大方。壁畫作者不僅有熟練地繪畫技巧，還有對生活的深入觀察並塑造出有血有肉的鮮活人物形象來，賦予藝術的生命力。

人物塑造生動，對人體做適度誇張，突出女性的胸、腰、臀。胸部特別豐滿，腰部又非常纖細，臀部肥闊，後人稱為三道彎構圖。它賦予了人體以抑揚頓挫的音樂美和山泉流淌的動感，令人欣賞到人體美的韻律和造型藝術的美妙。古格遺址壁畫的風格，在色彩上仍以紅綠為主色調。這種色調可能是年代久遠而氧化，看上去並沒有跳突和刺激的不舒服感，反而覺得很別致。

古格壁畫中那些半裸上身、著短裙的女性更是比比皆是，其造型具有非常高的藝術品位特質；壁畫中供養天、伎樂天和大佛像背光中摩羯魚、

馬、羚羊等瑞獸靈鳥，前半身保持原形，後半身演變為繁縟的忍冬草，與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畫中的同類作品極為相似，從中可看出同南亞、西域古文化交往影響的痕跡。十六金剛舞女圖位於門廊東壁兩側，整個壁畫氣勢軒昂，高貴典雅，舞姿各異，或舉手過頂或合掌胸前，神態嬌美，細腰豐乳，輕盈秀麗，天衣飄帶，雙乳袒聳，腹部微露，長裙飄然，赤足起舞。線條猶如西元三至五世紀，流行於西域于闐、伯孜克裏克與克孜爾石窟等地的鐵線描技法，其特點為線條流暢、精細準確；設色淡薄，柔媚輕盈，這種繪畫技法的人物壁畫在西藏極為少見，極其生動地繼承了古印度舞蹈與繪畫美學思想中的“情”、“味”、“豔”的藝術境界，可謂中國壁畫藝術中的經典傑作。

供養天人像，頭飾高冠大髻，頂飾頭光，裸上身，花裙披帛，含目扭腰，天衣飛動，或手托供寶，或雙手撫琴，或托海螺，或雙手舞綢，含胸出胯，赤足踏步作舞蹈狀，神態含蓄，形象嫋嫋動人。集會殿的龍王造型，頂飾七蛇，頭戴高冠，佩耳環項飾，二臂合掌舉於額上，上身赤裸，下作龍（蛇）身，龍身捲曲盤坐，龍尾上揚，巾帶飄舉，體態婀娜，造型極其優美生動。娑羯羅龍女像，尾部與卷草結合，似從卷草變化而出，動態優美而富有創意，提升了壁畫的裝飾美。古格蔓茶羅殿的眾金剛像、各類空行像身色各異，或四面十二臂，或八面十六臂四足站立，均呈忿怒之像，手持不同法器，懷擁明妃，背飾火焰紋，曲動的手臂與旋轉的火焰形成強烈的動感，動態誇張，孔武威嚴，陽剛之氣躍然於壁。

古格壁畫飛天造型對稱均衡，表情安詳靜穆，頭著花卉裝飾，上身赤裸，下身著短裙，雙手持花環，其身邊繪有蓮花卷草紋、雲紋等圖案，飛天造型頗具本土化特色，個個神態靜謐，端莊美妙，無論從造型、線條，還是色彩或是表情神態來看，都可與敦煌的飛天、克孜爾的極樂天相提並論。佇立殿堂，抬頭仰望，立生敬信，恍如到了佛國世界，美妙純淨，樂土莊嚴。

古格壁畫的伎樂舞女圖，也是藏族舞蹈造型中的經典動作。例如，神態安詳沉靜的妙音舞女，左手握琴弦，右手拉琴弓，左腿微屈單立，右腿半曲，頭戴花冠，天衣飄帶，猶如輕歌曼舞。其中的奏琴舞女、獻水舞女、持花舞女舞姿舒展優美，典雅高貴。尤其是壁畫中的“獻舞天女”，更

是婀娜多姿，舞步蹁躚，將手部、頭部、胸部、腰部、以及腿腳之間的舞蹈造型演示得準確而完美。這些生動的舞蹈壁畫，是我們研究西元 15 世紀前後古格王朝時期宮廷舞蹈最直接的視覺材料，具有十分珍貴的史料價值。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古格壁畫具有異常豐富的多元文化色彩，無論是在寺院的建築格局，寺院壁畫的繪製，尤其是古格藝術家們具有的那種自然神性的審美情韻與鮮明的藝術表現方法，都與前藏的寺院壁畫形成了強烈的藝術手法與審美情態上的差異。古格藝術家們嫺熟典雅的線條、色彩、造型、構圖、裝飾等藝術技巧與藝術想像，完美地傳達和展示了古格文化所擁有的一種自由精神，一種文化涵養，一種其他藏區所不能有的宗教美學理想，古格藝術創造了一種藏族美術史上新的古典美學觀念，並使其後來者難以超越和企及。

阿裏古格佛教壁畫藝術是在悠久的形成發展歷程中，繼承和弘揚了藏族優秀的民族民間藝術傳統，同時又是吸收和融合著多種外來藝術的精髓而創造出來的藝術珍品，它反映了藏民族長期以來與國內各民族及世界各國廣泛進行文化藝術交流的輝煌成就。阿裏古格佛教壁畫藝術不愧是西藏高原藏民族悠久歷史文化發展進程中的恢巨集畫卷。

第四節 阿裏古格壁畫人體藝術淵源

一、本教與阿裏古格壁畫人體藝術

本教（或譯鉢教），亦名“本波教”，是佛教傳入西藏前當地藏人信仰的一種古老的原始宗教。因該教巫師稱爲本，故名。本教產生於已進入原始氏族社會的西藏象雄地區（即後藏阿裏地區南部，現屬新疆地區），後來沿雅魯藏布江自西向東傳播到西藏各地。西元八世紀以後，本教受到佛教的較大影響，把一部分佛經改成了本教經。本教的原始資料保存下來的很少，現在所能見到的本教經典，如《十萬龍經》、《色爾尼》等，都是佛經滲透的結果。儘管如此，本教仍然保持著自己的一些特點。現在西藏東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區，仍有本教流行。

與其他原始宗教一樣，本教信仰的特點是多神崇拜。由於缺乏原始的文字記載，而西元七世紀以後，階級分化的現實與佛教的傳入又對原始的

本教信仰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原始藏民以萬物有靈的自然崇拜為主要內容。他們相信宇宙萬物都有神鬼精靈，這些精靈充斥於每個角落，隱藏在每一事物之中，所以，他們把日月星辰、大地水火、山林草木、江河流水、牛羊狗猴等都當作神靈來崇拜。隨著生產力水準的提高、社會的發展，對各種抽象的守護神與祖先神的崇拜逐漸成為本教的主要信仰。

在早期本教信仰的諸神中，女神佔有較大的比例，處於重要地位。許多本教經典規定，向天神致敬時要首先呼喚“雲欽”神（大母之意），其次是“馬哎松”神。這兩個女性神的地位僅次于本教的最高神“本古”。本教最大的一群神是 360 個“基神”，全是女性。這反映了早期本教與母系氏族社會的聯繫。

古格王朝壁畫誕生於西元十世紀前後。那時吐蕃王朝業已崩潰，西藏歷史上出現了“藏衛無法”的混亂時期。朗達瑪的後裔赤德尼瑪衰在阿裏地區劄達縣境內，修建了古格王國。後來古格王智光出家為僧，他為宏揚佛法，在西元一〇四二年，迎請印度高僧阿底峽進藏。阿底峽進藏後駐進了離古格王國城堡約十公里處的佗林寺，翻譯密顯經書，傳授密法，舉行灌頂儀式，召開大法會和建立戒律傳承制度等，使西藏的佛教又有了新的發展。

古格王朝原來就是本教文化根深蒂固的地區。藏傳佛教又吸收了本教的內容，特別是密宗的思想，因此，在繪畫藝術上就出現了為數眾多的人體描繪。從新疆和田博物館裏所藏有“歡喜佛”塑像來看，古格壁畫中有大量的人體藝術就不足為奇了。

在藏傳佛教中的寧瑪派，就以密宗為經典，僧人沒有學經制度，可以娶妻生子，實際上是打著佛教徒旗號的本教徒。其經典主要是密教經咒。密宗以“歡喜佛”為本尊神，提倡修“方便行”，這些都與本教相近而與漢傳佛教迥異。

由於本教提倡女性崇拜，密宗又以“歡喜佛”為本尊神，因此，在古格王朝的人體藝術較之龜茲地區就更加外露，更加性感，更加赤裸裸了。

強調暗示的神秘主義美學韻論，滲透到古格王朝的造型藝術領域。從生殖崇拜昇華而來的宇宙生命崇拜，象徵或暗示的超驗哲學宇宙論色彩更加濃厚。

古格王朝的菩薩像裝飾奢華，儀軌繁瑣，造型趨於神秘化和女性化，經常採用女性化的三屈式體態，而女性化正是密教崇拜女性性能力的表現。菩薩面部造型端莊豐滿，表情近似的冥想但不夠深深靜穆。她以遊戲座單腿盤屈，右手在胸前作施無畏印，左手支撐坐墊聳肩歪頭，身體向右傾斜。那纖細的腰肢，倦慵的神態和嬌柔的手勢，呈現了女性化的優美風姿。

密宗女神或女性菩薩的急劇增多，正是古格王朝人體藝術的顯著特徵。那些三屈式的身姿，渾圓的乳房，纖細的腰肢，豐滿的臀部，雖屬於因襲的誇張，卻誇張得恰如其分，優雅迷人。那行雲流水般波動的透明紗裙，更增強了她周身曲線和諧的韻律。

古格王朝壁畫中出現大量的性愛描繪，是一種相當奇特而又複雜的文化現象。實際上這是一種性愛的隱喻、宗教的象徵。宗教與性的奇異並置與混合，正是古代佛教密宗藝術的體現，更要追溯到本教文化傳統的生殖崇拜的玄學化與儀式化形態。

古格王朝壁畫中的人體藝術，起源于農耕巫術的生殖崇拜的傳統觀念異常濃厚。在神秘主義的影響下，佛教密宗的藝術也趨向繁縟怪誕。這一切精神激素都激發了古格王朝藝術的奇思異想，創造出神秘主義美學的標本，神秘的宇宙生命的象徵。

二、印度教與阿裏古格壁畫人體藝術

作為一種求生本能，人類對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十分關注，生殖崇拜成為原始先民們信仰中普遍存在的一個主要內容，阿裏日土岩畫、石窟岩壁畫中，就有大量表現男女交媾和生殖崇拜的圖符造型。是原始生殖崇拜思想觀念在西藏民間中的沿續。阿裏作為本教的發樣聖地，在形成過程中不斷接受了多種外來文化的影響，如本教的雍宗神山岡仁波且，印度人稱岡底斯。將原始的生殖崇拜昇華為一種宇宙觀，即是受印度教濕婆性力學說的影響。故女神崇拜、女性生殖崇拜習俗在印度成為一種極力追崇的文化現象，廣泛表現在雕刻和繪畫中，以印度早期桑奇大塔東門橫楣角象徵生殖力的《神樹藥叉女》高浮雕像和中後期神廟浮雕中整壁滿牆表現青年男女愛侶豔情的米朵拉像最具代表性。這種造型法則隨著印度佛教文化傳入，自然和阿裏遠古原有的生殖崇拜傳統觀念不謀而合，對後宏期佛教美

術的造型風格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並成為古格壁畫的一大特點。

古格壁畫中有一組三女神像人體，其中中間一女人體生殖器有意暴露於外，而且描繪得非常生動突出。這種精心描繪方式與印度教中所表現的方式完全相似，無疑是生殖崇拜的具體表現。在阿裏古格殿堂壁畫中整壁整堂比比皆是的渲染金剛、護法、空行赤裸全身，叉腿而立，懷擁明妃，明妃亦全裸，一手摟金剛、一手高舉，雙腿盤于金剛腰後作交媾狀的雙身合歡像。可以說也是受印度教女神崇拜、女性生殖崇拜、性力崇拜而產生的因素之一。

印度教是雅利安文化和達羅毗荼文化相互同化的結果，在印度教三大主神中，梵天、毗濕奴、濕婆分別代表創造、護持、生殖與毀滅這些宇宙力量。印度教諸神作業表現自然界各種威力的象徵，有許多多臂多面的和奇姿怪態的造型，以激烈的動感和力量為其特徵。印度教的雕刻和與佛教周刻相異的是以一種躍動而柔和的線條去塑造輪廓。達到富於肉感性、神秘性，怪異性的趣味，笈多時代靜謐的內在的佛教雕刻接受了印度教神像的躍動的多臂多面造型樣式的影響，逐步走向了密教化。印度教的許多神妃成了佛教中的天部諸神及菩薩，如梵天的神妃薩拉斯瓦蒂成了辨財天，維修奴的神妃拉克濕密成了吉祥天，濕婆的神妃努瓦蒂成了聖觀音，難近母女神成了千手觀音、十一面觀音、如意輪觀音、不空絢索觀音等姿勢各異、多面多臂的觀音造形。雕鑿得都極其和諧勻稱。不僅是印度古代雕刻中的罕見之作，而且一直是古代東方美術中最珍貴的文物和印度古典主義藝術的範例。在同一窟中還有恆河現身的濕婆，擊退象魔的濕婆，舞蹈的濕婆，濕婆與帕努瓦蒂結婚的場面等，它們都是極為精彩的印度教密宗雕刻，這對當時的西藏的密教美術造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阿裏古格壁畫借鑒和發揮了印度密教神祇造型中多面多臂的造型樣式，並接合本土原始文化、本教文化源流中的人身獸首、鳥首等怪異神靈造型和藏傳佛教後宏期復興中誕生的各教派崇信的神祇，創造出了形形色色的在世界宗教中陣容龐大、體系完整、具有深邃象徵意義的幹奇百怪。難以數計的神祇造型隊伍。

古格壁畫人物造型風格明顯受到印度阿旃陀石窟藝術和笈多藝術形體美的影響，印度原有的那種渾圓柔和的雕刻造型上，尤其是在表現女性美

時所創造的“三屈法”：即頭部向右傾斜，胸部向左扭轉，臀部又向右聳出，全身成節奏感強烈的 S 型曲線，以加強女人體的魅力。即使是表現男性的菩薩造型，其扭動的身姿也極富有女性美的特色。男性則呈廣額深目。鼻直而高，蝌蚪鬚須，身段碩長等特點。被尊為印度舞王的濕婆神的舞蹈造型和優美的曲線形體美被普遍應用於寺殿壁畫和雕刻中，成為古印度壁畫和雕刻藝術獨特的神韻風采。

古格藝術家廣擷這些外域藝術優勢，將形體美追求貫穿於整個壁畫人物造型中。古格壁畫中大量供養人、菩薩、明妃、天女的形體描繪，佛本生故事以及世俗畫中出現的人體女性化、雙乳高聳、腰肢纖細、身段扭曲、豐臀修身、線條呈三折枝式的優美造型。托林寺集會殿的“十六金剛舞女圖”，古格貢康石窟“十三供養天女像”、古格白殿的“星宿天宮圖”壁畫描繪了許多姿態優美，律動感極強的舞蹈造型，且以裸女形象居多，動態輕舒，身姿嫋媚，肩、胸、胯部都有較大的扭動，形體線條富有節奏感和韻律美，人體造型既顯得婀娜多姿，又給人以澄思靜慮之感。這正是印度犍陀羅風格和笈多派繪畫中形體美的表現特徵，這種外宋文化影響在佛教傳入過程中，又經過古格傳統文化的篩選融和、整合改造，而變革成為地道的古格樣式。其形體、動作、造型可以說已達到一種至善至美的境界，更加完善和豐富了古格壁畫的形式美和表現內涵。

三、伊斯蘭細密畫與阿裏古格壁畫人體藝術

伊斯蘭繪畫以畫幅小巧，刻畫精微，造型密集的細密繪風格為特徵而稱著於世，西元前四世紀，波斯帝國走向覆亡，大批伊朗人東遷至塔里木盆地和吐魯番落腳駐足。古波斯文化更直接影響著西域及周邊地區的文化。地處古絲綢之路和橫跨歐亞大陸的東西交通要道“麝香之路”的阿裏古格壁畫再度吸收了中亞風格和古波斯細密畫格調的優勢，並按自身的特點給予創造性的融匯發揮，將它應用於大幅的壁畫中，極大地豐富了古格壁畫的表現形式，提升了高品位的藝術格調，這在阿裏古格殿堂壁畫的尊像畫，說法圖中尤為突出。

阿裏古格壁畫採用大小對應，疏密對比，繁簡相襯，主次巧布的手法，使壁畫呈現出細密繁富、工整精巧、但又具有大氣輝巨集為特徵的古格氣派。如古格王城白殿西壁、北壁東側壁畫，內殿東壁《四面本尊佛母

與眷屬》、《寶生佛及眷屬》壁畫，中央繪主尊佛像，背景則以密格式排列上萬尊同一造型（形態，手勢，坐姿）的佛像和菩薩像，形成變化豐富的密集背景和千佛式構圖佈局；或在整壁整堂的構圖中將壁畫橫分成四至六層條帶狀，以中心壁畫內容為主，上下條帶密集排列垂帳紋、王統圖、高僧圖、伎樂天、本生圖、地獄變等內容的畫面，形成包容量極大的整體細密美。

同時，這種細密美還突出地表現在壁畫中形象刻畫的精細入微，線條勾勒的工整細密，裝飾紋樣的繁富絕妙，色彩渲染的細膩微妙，整體風格的繁密精巧，格調的高雅富麗，風格的獨特鮮明，可謂達到了淋漓盡致的境界，成為在藏族美術中明顯有別於先後各時期和周邊各地的以細密為特色的古格美術面貌。

阿裏古格壁畫沿襲著藏族傳統的以線造型為風骨的繪製方法，借鑒了伊斯蘭細密畫特點，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創造出了極其豐富的勾勒線描技法。阿裏古格壁畫的線描表現力可謂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尤以古格王城蔓荼羅殿的壁畫最具代表性。壁畫不僅構圖飽滿緊湊，形象密集精微，色彩變化細膩繁富，線條勾勒也以精細、繁密、秀麗、工整、剛健、圓柔為特點，以墨線為主，色線為輔，金線壓軸提神，強調線條的自由舒展，流暢剛柔，講究筆力的虛實張弛，節奏變化，更注重線描精細如微、毫髮必爽的禪功筆力，顯示出高超的藝術水準。“以線造型”的特殊技法，成功地表現了壁畫中各種形象的形體、質感、動態，人物的神情意趣、喜怒善惡，環境的情調、韻致等。此外，古格壁畫用線的細密美，在藝術上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並在世界藝術殿堂中具有特別的影響，與伊斯蘭細密畫堪稱異曲同工。

綜上所述，古格的壁畫中出現的許多裸體的人物造型，雙乳高聳，面如滿月，含笑欲語，極盡媚姿，豐乳細腰，四臂與身體作大幅度扭動，舞姿極具韻律感和節奏感。特別是著意描繪的雙乳和外露的生殖器格外突出，再現了藏民族原始美術和藏傳佛教文化一脈相承的深厚源流，顯示了古格王國強烈的民族性、神聖的宗教性和神秘的地域色彩。

參考文獻：

- [1] 金維諾.西藏阿裏古格王國遺址壁畫[M].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1.
- [2] 金維諾.西藏阿裏托林寺壁畫[M]. 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1.
- [3] 於小冬.藏傳佛教繪畫史[M].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6.
- [4] (瑞士)艾米·海勒.西藏佛教藝術[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 [5] 鄒文.世界藝術全鑒[M].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 [6] 王鏞.印度美術[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 [7] 朱伯雄.世界美術史[M].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88.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人把地種好，地把人餵飽。（維吾爾族）

火煙不出屋，場上別晒穀。（黎族）

早霧晴，晚霧雨。（白族）

螞蟻出洞，小雨不停；長蟲出洞暴雨淋淋。（彝族）

兩人相好，六十年嫌短；兩人不合，十六年嫌長。（侗族）

相愛才交友，合意才聯親。（水族）

不作異鄉人，不知故土親。（維吾爾族）

馬馳千里，總想著羣體；人走千里，總想著故里。（哈薩克族）

人老思鄉，人老思林。（藏族）

山是柯爾克孜人的父親，水是柯爾克孜人的母親。（柯爾克孜族）

秋天不積草，來年無春羔。（蒙古族）

拿弓的人忘不了箭，騎馬的人丟不了鞍。（滿族）

勤堵水有魚吃，勤種田有飯吃。（傣族）

男兒莫閑坐，少女少串門。（回族）

不出力鋤，怎挖得根。（瑤族）

一年辛苦，十年幸福；前人辛苦，後人幸福。（壯族）

人不學落後，刀不磨生銹。（回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近年內外蒙情況

孟鴻
前輔仁大學教授

摘要

內外蒙古位處中國大陸正北方，關係內地之安危者，至大且巨，由於外蒙古已獨立，美、日、韓……等國力量早已伸入外蒙古，國際有所謂「援蒙」組織，以「人道援助」包裝，實則意在扶植外蒙古使之能成為牽制中國大陸之一股力量，然而援蒙之款往往不知所終，外蒙之貧困如故，至於內蒙，則情況恰與之相反，經濟情況日臻繁榮，但「泛蒙古」思想在外力鼓動下，有死灰復燃跡象，更有極少數歧異分子，由於個人野心，妄圖製造內蒙古獨立假象，在某種面向看，內外蒙情況頗為複雜，台灣由於與內外蒙相距遙遠，對其情況不甚了了，本文擬就二年（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就相關資訊，對內外蒙情況作一分析。

關鍵字：內蒙古、外蒙古、泛蒙古、國際援蒙組織

一、蒙古之含義及蒙古問題

「蒙古」一詞源於兩《唐書》之蒙兀與蒙瓦，為諸多室韋中之一部，在早期文獻中以各種不同的漢字音譯「蒙兀」或「蒙瓦」如朮骨子、朮古、謨葛設、朮古、蒙古斯、蒙古里……等，直到宋人葉隆里所著《契丹國志》時，始定於「蒙古」一詞，以是「蒙古」最初是指民族而言。但漠北地區操阿爾泰語系的民族眾多，蒙古僅為其中的一支，經過不停的兼併、混融，許多原非蒙古之民族蒙古化了，因此就有所謂蒙古本支（指原

先就是蒙古族者）與蒙古別支之分，蒙古本支就是分布在大漠南北的喀爾喀蒙古族，或許更詳細些就是清代大漠以南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爾部、吐默特以及和碩特；大漠以北喀爾喀三汗所屬各旗（後增三音諾顏一部，此部不稱汗）；至於蒙古別支，以清代的各稱而言，指貝加爾湖周邊的布里雅特、裏海北岸伏爾迦河的土爾扈特、今外蒙古西部的杜爾伯特、新疆北部的準噶爾以及附牧於漠北喀爾喀的二額魯特部、額濟納舊土爾扈特部以及青海之若干額魯特部。如以之為地理名詞，則有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清康熙擊敗準噶爾部噶爾丹入侵漠北喀爾喀蒙古後，翌年康熙在漠南多倫淖爾舉行漠南蒙古會盟比丁大會，邀請漠北三汗前來觀禮，漠北三汗目睹清軍壯盛陣容、乃歸附中國）歸附中國後，始有內、外蒙古之稱謂，在漠南內蒙古以西者，稱漠西蒙古，在青海者稱青海蒙古，在今新疆者稱新疆蒙古，在國境之北貝加爾湖周邊者稱北蒙古。

有清一代內、外蒙古、漠西蒙古、青海蒙古及新疆蒙古始終是中國領土，清代治邊政策之大原則，是將構成中國民族主體的漢人與邊疆各民族隔離開來，禁止其往來、文化交流、聯姻，更在嚴禁之列，由滿人與蒙、藏、維（當時多稱之為纏回）……等族聯繫，各級邊政機構（在中央為理藩院，在地方為各邊地將軍、都統、辦事大臣、副都統……）也幾乎都由滿、蒙人擔任，將漢人排除於邊政工作範疇，使理藩院尚書、庫倫辦事大臣、駐藏辦事大臣、伊犁將軍、烏里蘇台將軍、駐各邊地都統、副都統……等有關中央及地方治邊職缺從無漢人擔任，清帝室要將滿族（實際就是女真族，滿族乃是「創造」出來之名詞）成為蒙古、藏族與中國關係的紐帶，此種將蒙古、藏族與漢人隔離的民族政策，使得蒙藏各邊族無法與漢人接觸，既無接觸，自談不上融合，甚至產生隔閡，當清室宣布退位後，蒙古（尤其外蒙古）、西藏遂認為與中國的紐帶（清帝室）既已消失，他們已不屬於中國，此為蒙藏問題產生之主觀因素，而歐美日俄帝國主義者從潛意識中不願中國統一強大（其實任何國家都不願其他國家統一強大），而中國土地廣袤、人口眾多，遂成為覬覦、殖民之標的，由是鼓惑蒙藏脫離中國，此則為近百年來蒙藏問題產生之客觀因素，明乎蒙古的背景，談蒙古之近況始有意義。

二、外蒙古之歷次獨立

有清一代自康熙年間御駕親征準噶爾部噶爾丹，將之逐出漠北喀爾喀三汗領地後，漠北三汗在對清廷懷德畏威情況下，自願歸附中國，比照漠南蒙古之例，編設盟旗，成為中國領土，時為康熙三十年（1691年），其後始有內、外蒙古之稱謂，漠北外蒙古盟旗制與漠南內蒙古不同之處在於：1.同意漠北蒙古維持三汗名號；2.漠北之盟為虛級，仍維持以血緣體「部」之存在，如車臣汗部、土謝圖汗部、札薩克圖汗部，雍正時（1723~1735年在位）新增之三音諾顏部，此部不稱汗，外蒙古之部為實級；3.外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有其專屬之牧地。漠北外蒙古自歸附中國之後，清廷從未對外蒙古作任何有益之建設（除出銀十萬兩為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圓寂後，為其建廟之外），又禁止其與漢人往來，任令外蒙古停滯在十七世紀末生活、知識水準，其落後情況，令人不可思議，據1919年馮玉祥曾派其秘書毛以亨前往俄國尋求援助，毛氏往返均經過外蒙古首府庫倫（今烏蘭巴托），且均作一段時間之逗留，事後毛氏於其所撰《俄蒙回憶錄》稱在庫倫之見聞略為：當時庫倫人口不過十萬人，全庫倫僅有一個「西醫」，此「西醫」為日本人，此日人係獸醫，在庫倫求其看診者，絕大多數為喇嘛，而喇嘛所犯之病，絕大多數為「花柳病」（即今所之謂性病），是則可知1919年之前外蒙古落後之情況，而蒙古王公生活奢糜入不敷出，多向在庫漢商借貸，且數額頗巨，就常情而推，根本不可能償還，使外蒙王公與漢商存在既愛且恨之情況。至於清廷所派駐庫倫辦事大臣瞞預貪墨者多，精明幹練者少，使蒙人與朝廷產生矛盾，外蒙古內部已然成為一座待爆之火藥庫，此為清季外蒙古內部情況¹。

至於當年俄國對外蒙古可說是漚漚已久早懷染指之心，其所派駐庫倫總領事對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更是極盡奉承巴結之能，甚至以女色引誘之，意在爭取其心向俄國並鼓動其脫離中國，此總領事更對外蒙王公

¹ 以上所述外蒙古情況可參看：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中研院近史所出版，1962年；陳籩《止室筆記》此書輯入《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劉學銚《外蒙古問題新論》台北南天書局，2012、2014年出版。

宣稱只要宣布獨立，則前此向中國商人之借貸債務，都將一筆鉤銷，使得蒙古部分王公傾向親俄離中²，會辛亥革命，外蒙古遂在俄國蠱惑下宣布「獨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稱大皇帝，此為外蒙古首次獨立。時為遜清宣統三年（1911年）十月，乃驅逐清廷所派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於驅逐三多之書札中略為：

「為札飭事，昭得我蒙古自康熙年間，隸入版圖，所受歷朝恩惠，不為不厚。……」³

從上引「札書」中所稱「我蒙古自康熙年間，隸入版圖」，正可證明漠北喀爾喀蒙古之納入中國版圖，並非經過戰爭征服，乃是自願歸附者。次年（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次月孫中山禪讓袁世凱出任大總統，即致書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放棄獨立重回中國範疇，哲佛也回以長信，其中有如下之文字：

「……本喇嘛視舍獨立，猶棄敝屣，惟於清帝辭政以前，業經自立，佈告中外，起滅何能自由，如果欲令乃爾，請即商諸鄰邦。……」⁴

此書函中「如果欲令乃爾，請商諸鄰邦。」一語，即可知外蒙古之首次獨立，乃由「鄰邦」（實即俄國）所一手操導，所以縱使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願意放棄獨立，俄國豈肯輕易放手？以是有「請即商諸鄰邦」之語。北洋政府遂與俄國展開馬拉松式談判，前後舉行過無數次會議，其中前四十八次會議，均有紀錄，之後未作紀錄⁵，最後達成協議，外蒙古取銷獨立，改為自治，於1915年六月中俄蒙三方簽訂協約，共二十二條⁶，

² 可參見前揭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及師博（張國安、宋大川、王新光）主編《外蒙古獨立內幕》，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

³ 見《中俄關係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史料。

⁴ 袁世凱致哲佛函及哲佛復函全文請參見劉序渭《蒙古史料彙編》，1976年台北金蘭出版社初版，1987年台北南天書局再版。

⁵ 呂一燃編，《北洋政府時期蒙古地區歷史資料、中俄蒙三方恰克圖會議錄》。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但張啓雄，《外蒙古主權歸屬交涉 1911-1916》一書指出每次會議均有紀錄，且全部紀錄均藏於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⁶ 全部條文請參見劉學銚《外蒙古問題新論》，台北南天書局，2012、2014年兩次出版。

外蒙古首次獨立於焉落幕，可見北洋正俯仍有幹練人才，向者民國政府總是批評北洋政府無能禍國，實有欠公允。

外蒙既取消獨立，改設為外蒙古自治官府，依《中俄蒙協約》之規定，中華民國（其時以北洋政府代表中華民國）得派大員駐庫、派佐理專員駐外蒙古其他各地，北洋政府恢復了中國對外蒙的主權，北洋政府先後以陳鎰、陳毅為駐庫倫辦事大員，此二陳氏辦事圓融，深知邊疆民族事務



清朝
民初
駐庫倫辦事
大臣衙署

不能操之過急，必須增進感情爭取信任為第一要務，因此兩位陳氏與外蒙王公、活佛、喇嘛，建立相當情誼，而此際俄國本身發生共產革命，帝俄政府對局勢已無法掌控，帝國已呈分崩離析狀態，我駐庫倫辦事大員陳毅及北洋政府均認為此時勸告

外蒙古自治官府撤銷自治完全回歸中國，實為千載難逢的時機，陳毅乃積極開工作剖析重回中國之好處，外蒙王公、活佛也多傾向此一看法，而此際日本發動組織流散在西北利亞之白俄散兵游勇，裹脅布里雅特蒙古人，妄圖在日本操導下建立「泛蒙古國」，所謂「泛蒙古國」初步構想是聯合布里雅特蒙古、內、外蒙古、呼倫貝爾蒙古，建立一受日本控制之「泛蒙古」國，繼而擴及漠西蒙古、青海蒙古、新疆蒙古，甚至及於裏海北境的喀爾瑪克蒙古，因此對外蒙古自治官府極盡拉攏誘煽，但以陳毅處置得當，外蒙古自治官府始終未參與所謂「泛蒙古運動」，陳毅更掌握時機，與外蒙古自治官府展開撤銷自治之談判，雙方已有相當共識，只有若干撤銷後如何優遇外蒙古活佛、王公的條件尚待斟酌，陳氏深知事緩則圓道理，以免欲速則不達，不幸此時北京發生軍閥內訌，皖系段祺瑞當道，為擴充其實力，組成安福系，欲向日本借款擴張軍備，派手下大將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徐氏率極少數兵進入外蒙古，以西北籌邊使位階高於駐庫倫辦事大員，對陳毅圓融作法，深覺不耐，且徐氏志在北京，原無意於邊事，遂想早日結束外蒙古撤銷自治之談判，以便早日返回北京參與皖系奪

權，因此罷黜陳毅，徐氏竟以兵包圍哲布尊丹巴佛宮，逼活佛及眾王公簽下撤銷自治文件，外蒙古自治雖告落幕，但徐氏蠻橫作為，在外蒙古僧俗高層留下極不良記憶。

未幾中原又陷入軍閥奪權之爭，直皖兩系互鬥，皖系失敗，直系當權，明令通緝徐樹錚，徐氏乃落荒而逃，時為 1920 年，而此時有西北利亞帝俄餘孽恩琴（Baron Feder Von Urgean Stermberg）者眾進入庫倫，脅迫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宣布獨立，仍以哲佛為「皇帝」，此為外蒙古二度獨立。

未幾，在蘇聯訓練下之喬巴山及外蒙古本地發展之蘇赫巴托結合，在蘇聯紅軍支援下，攻入庫倫，驅逐恩琴，仍脅迫哲佛為帝宣布三度獨立，時為 1921 年，三年後（1924 年），哲布尊丹巴卒，外蒙古改稱「蒙古人民共和國」，此可稱之為四度獨立，此一「蒙古人民共和國」完全是蘇聯之傀儡，形同蘇聯之一個加盟共和國，雖然自稱為「國」，但在法理上其主權仍然屬於中華民國，因 1924 年中蘇簽訂《解決懸案大綱》時，蘇聯仍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⁷。直到 1945 年，中華民國受美、英、蘇《雅爾達密約》之害及美國壓迫下，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外蒙古獨立，並在同年底於蘇聯監視下，外蒙古舉行「公民投票」，通過外蒙古獨立⁸，翌年（1946 年，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五日，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此可視為外蒙古第五度獨立，但仍在蘇聯嚴密控制之下。及至 1990 年蘇聯瓦解，外蒙古擺脫蘇聯真正獨立 可稱之為第六次獨立，且改國號為「蒙古國」。

三、內蒙古之蒙漢混融

清嘉慶朝所修《大清會典·理藩則例》始見內、外蒙古二詞，但內蒙古之範疇僅限：「大漠以南曰內蒙古，為部二十有四，為旗四十有九，……逾大漠曰外蒙古，喀爾喀四部附以二，為旗八十有六。」可見在

⁷ 見《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協定》第五條。

⁸ 有關外蒙古公民投票詳情，可參見雷法章《參觀外蒙古公民投票報告書》，該報告書全文附錄於劉學銚《外蒙古問題新論》，台北南天書局，2012，2014 年。

清代官文書所稱之內蒙古僅指二十四部四十九旗而言，也即僅指哲里木、昭烏達、卓索圖、錫林郭勒、烏蘭察布及伊克昭六盟所屬二十四部（在內蒙古部為虛級）四十九旗而言，此處為行文方面及其地理位置連成一片之呼倫貝爾、察哈爾部、吐默特旗、阿拉善和碩特旗、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均稱之為內蒙古，按內外蒙古以遠古以來，就是北方草原眾多游牧民族生存空間，最早見諸文獻者有丁零、匈奴、東胡；東漢以返則有鮮卑、烏桓、柔然、高車、匈奴……等民族生息其間，北魏季世突厥、敕勒等民族崛起，稱霸大漠南北，威服草原上所有游牧之族；唐太宗攻滅東突厥汗國後，回紇繼起填補突厥衰微後留下之政治空間，九世紀中葉（840年），漠北之黠戛斯崛起將回紇逐出大漠南北而有其地，蒙古乃是最晚走上歷史政治舞台，遂將大漠南北稱之為蒙古高原，並非指大漠南北為蒙古族所獨有，須知土地先人類而存在，古往今來從無一人或一個民族來到人世間時，帶來寸土尺地，連一顆泥沙也不會帶來，人，只是土地的過客，土地從不屬於人，此為討論人與土地時，必不可缺之認知。

內蒙古地區由於自然條件較漠北好（指水源、植被、氣候而言），部分地區可以從事農業，設若農業之經濟效益大於畜牧，則自然會傾向農業生產方式，因此內蒙古東部地區之哲里木盟、卓索圖盟等地，自十八世紀以來，就開始經營農業。兼以鄰近華北地區，當冀、魯、豫等省發生旱澇蟲害等天災時，數以百萬計之災民，自然湧向內蒙地區，初期清廷曾有春去秋回之規定，但時日既久，法令鬆弛，而漢人帶來較高之生產力，使蒙古或滿族王公（土地均歸其所有）獲高之收益，於是在「民利蒙地，蒙利民力」兩利情況下（民指到內蒙墾荒之漢人），形成春去秋不回，部分墾荒漢人有融入蒙古者，其未融入蒙古者，多聚族而居，清廷為便於管理及徵收稅賦，遂在漢人群聚之地區設立府、廳、州、縣，由是內蒙古地區形成蒙古之盟旗地方行政組織，與府廳州縣雙軌併存情形，如在哲木盟設置昌圖、懷德、康平、洮南、洮安、開通、安廣、突泉、農安、乾安、遼源、彰武、景新、肇源、泰康、法庫等十六個縣；在昭烏達、卓索圖兩盟設置承德、欒平、豐平、平泉、赤峰、凌源、朝陽、圍場等八個縣；在錫林郭勒盟、察哈爾部（1934年改稱盟）設置萬全、蔚縣、宣化、張北、懷來、延慶、陽原、涿鹿、懷安、龍關、多倫、沽源、赤城、寶昌、商

都、康保等縣；在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及歸化城吐默特旗設置歸綏、薩拉齊、和林格爾、托克托、清水河、武川、豐鎮、涼城、興和、陶林、集寧、五原、臨河、固陽、東勝、安北、米倉、浪山、晏安、陝壩等縣。在這些設立縣之地（此等縣有時稱府、州等，至民初幾均改為縣或設治局），自以漢人居多數，但這些縣又都在相關盟、部、旗之內，在清朝時，在蒙古盟部旗及府州縣之上，有將軍、都統、副都統為其長官，因此盟旗與州縣之間尚無太大爭執（如有爭執，多在稅收分攤、牧地放墾方面），蒙漢之間尚能和睦共處，除純牧區蒙人外，一般蒙人多通漢語，尤以遜清末造，內蒙古王爺私人興學頗盛，除教授蒙文外，更以漢文經典為主，蒙漢互相混融成為常態，因此有內蒙古蒙人稱世代務農，乃是實情。

四、孰為蒙古之主體

近年來因外蒙古（今稱蒙古國）已成為一獨立自主之國家，因此頗有人以為蒙古（包括民族及文化）之主體為外蒙古，此種看法並不正確，茲從以下幾點分析之：

第一，就人口言：外蒙古或蒙古國人口，尚無標準數據，據 2000 年七月蒙古《消息報》稱有二百四十萬人，但次年八月二十二日《蒙古訊息》（The Mongol Mesenger）則稱截至 2000 年人口為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人；而 2001 年出版之《統計年鑑》（Mongolian Statistical Yearbook）又稱其人口為二百四十萬七千五百人，此處姑以二百五十萬人為準；看大陸地區蒙古族人口依其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為五百九十八萬一千八百多人，足足較外蒙古多一倍多，試問外蒙古如何能成為蒙古之主體？

第二，就蒙古文化言：蒙古民族在其民族英雄鐵木真於十三世紀初（1204 年）攻滅乃蠻部、俘獲乃蠻大臣塔塔統阿後，命其以畏兀字母拼寫蒙古語言，創制蒙文，其後畏兀（即後來之維吾爾族）改宗伊斯蘭教，採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寫蒙古語言，最先在察哈台汗國通行，故稱察哈台文，此際蒙文就成為極具民族特色之文字，始終在蒙古族中應用，及至女真族愛新覺羅氏崛起後，採用蒙文字母拼寫女真語言，成為世所習知之滿

文，大漠南北之蒙古族原皆使用此種蒙文，但外蒙古在蘇聯控制下，於 1941 年強迫外蒙古使用息立克字母（Cyrillic alphabet）拼寫蒙古語言，是為新蒙文，而俄文也是採用息立克字母，因此在外觀上新蒙文與俄文幾乎毫無區別，喪失蒙古民族之特色，如所周知，文字是文化之載體，當文字斯拉夫化後，其文化也斯拉夫化了，民族之構成，文化較之血緣更為重要。而內蒙古蒙人至今仍沿用成吉思汗時代所創制之「老」蒙文，內蒙古為蒙古之主體，誰曰不宜？

第三，就蒙古大汗系統而言：鐵木真於攻滅乃蠻後，於 1206 年受漠北各民族、各部落領袖擁戴，並上尊號「成吉思汗」，其意義雖眾說紛云，但總不脫離「汗中之汗」、「萬王之王」之類，從此開疆拓土，建立大蒙古國（蒙語讀作「伊克、蒙兀兒、烏魯斯」），並規定成吉思汗一系「博爾濟錦（或作孛兒只斤）氏為「黃金氏族」，同時還規定：「非黃金氏族不得為大汗」，成吉思汗的話語，就是全體蒙古民族的鐵律，及至其孫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同時稱薛禪可汗，元朝及皇帝的稱號，只是用以統治中國本部，可汗的稱號，才是大蒙古國的元首，用以統治各游牧民族及屬國，元朝各帝幾乎都有可汗的名號，忽必烈嫡系子孫稱「元裔」，自忽必烈之後，非元裔不得為大汗，又成了新的鐵律，自忽必烈以至明末後金（即清朝之前身）初期，所有蒙古大汗都在漠南，從大汗系統看，漠北外蒙古焉能成為蒙古之主體。

第四，就蒙古重要歷史文獻言：忽必烈建立元朝後，蒙古重要人物當然都在大都（今北京）以及各行省（行中書省之省稱），元世祖忽必烈雖然曾命藏族喇嘛（按當時尚無「藏」之名稱，時稱圖伯特）八思巴創制八思巴蒙文，但並不全面通行，充其量只用於朝廷若干官文書，蒙古民間仍然使用成吉思汗時代所創制之畏兀式或老蒙文，主要的蒙文歷史文獻如《蒙古源流》、《黃金史綱》、《俺答汗傳》等，都是漠南蒙古學者以老蒙文寫成，蒙古主體豈會在外蒙古。

綜合以上所述四點，當可明白蒙古之主體是在內蒙古。

五、近年媒體有關蒙古之報導

所謂近年，係指 2014 年下半年至 2016 年上半年而言；所謂媒體，乃

指台灣較為常見之平面媒體如：聯合報、聯合晚報、中國時報、旺報、蘋果日報、自由時報及大紀元報，及一份周刊；在2014年六月至2016年六月兩年期間，共刊載有關內、外蒙古消息共七十七則，茲將此七十七則新聞以表列方式呈現如下：

刊載日期	媒體名稱	標題或主要內容	備註
2014.6.14	聯合報(A16)	外蒙古獨立並非全中國人決定	括號內為刊載版面
2016.6.30	聯合報(A12)	陸聯俄反恐，八月內蒙軍演	
2014.7.18	旺報(A7)	內蒙高官收賄千萬人幣判無期	附該高官圖片
2014.8.10	蘋果日報(A19)	火箭墜內蒙燒毀 陸急滅音	附圖片
2014.8.11	大紀元報(A4)	疑似中共火箭墜落內蒙爆炸	附圖
2014.8.16	旺報(A5)	相隔十一年 陸元首再訪蒙古	
2014.8.19	旺報(A8)	習訪蒙盼雙贏 或談煤、燃氣專案	附圖
2014.8.22	旺報(A7)	習偕夫人出訪 蒙總統家宴迎賓	附多幅圖
		中蒙會聚焦礦產基建金融合作	附圖
	中國時報(A21)	習近平訪蒙 十一來大陸元首首例	附圖
2014.8.23	旺報(A6)	習喊話 歡迎蒙古搭陸發展列車	
		蒙古外交博弈 中美俄急拉攏	
		習訪蒙古 外媒：戰略地緣考量	
	聯合報(A12)	習近平：家門口太平，我們才能安心 中蒙躍升全面戰略夥伴	附圖
2014.8.25	旺報(C5)	中蒙強化合作 陸增戰略能量	
2014.8.26	中國時報(A14)	中俄合作 展現新機	
2014.8.28	自由時報(A4)	扯！蒙藏會擬赴中考察稀土	附表
2014.8.30	聯合報(A14)	上海合作組織 內蒙反恐軍演	
2014.9.7	旺報(A16)	廢水染騰格里沙漠 內蒙悲歌	附圖
		救沙行動不容緩 兩岸齊伸援手	附圖
2014.9.10	大紀元報(A5)	內蒙只顧 GDP 不惜沙漠建汙地	附圖
2014.9.13	旺報(A8)	上合中俄蒙峰會 打造經濟走廊	附圖

刊載日期	媒體名稱	標題或主要內容	備註
2014.9.16	大紀元報(A5)	化工汙染 內蒙萬隻珍禽死亡	
2014.9.18	旺報(A17)	內蒙副主席落馬	附圖
2014.9.20	旺報(A10)	內蒙古三月內十二名官員落馬	
2014.9.29	旺報(C2)	巨龍的功課（提供外蒙議員擔心大陸沒有放棄併吞外蒙想法，許多大陸網友主張外蒙是中國疆域之一部分…）	系羅智強在美史丹佛大學研究所撰專文
2014.10.5	旺報(A5)	習促內蒙治汙	附圖
2014.11.4	中國時報(A15)	鄂爾多斯「以物易物」	
2014.11.5	大紀元報(A5)	陸鄂爾多斯 經濟崩潰出現以物換物 償債	附圖
		內蒙古牧民抗議強徵遭數百警歐打	附圖
2014.11.6	大紀元報(A5)	內蒙古包頭當局 冤判四法輪功學員	
2014.12.3	大紀元報(A5)	陸大幅降溫 內蒙古局地達-35°C	
2015.1.30	自由時報(A20)	亞洲八億男係出十一老祖宗（成吉思汗、耶律阿保機等）	附圖
2015.2.6	聯合報(B2)	蒙古建築師 來台開心治好病	附圖
2015.2.15	旺報(D2)	蒙古重視傳統書法	
2015.2.16	聯合報(AA4)	台灣外籍生去年破九萬創新高（外蒙古學生）	附圖
2015.2.25	蘋果日報(A17)	訪內蒙維權者 法記者遭押出境	附圖
2015.2.26	旺報(B5)	房市凍垮鬼城 鄂爾多斯淘金客散	附圖
2015.3.5	大紀元報(A5)	蒙古族以狼為圖騰 郭雪波批不符事實	
2015.3.6	大紀元報(A5)	「快活不下去」內蒙異議人士求助聯合國（指哈達）	附圖
2015.3.16	聯合報(C8)	內蒙古沙漠闖玩大飯店 水世界	附極多彩圖
2015.3.23	蘋果日報(A15)	(內蒙) 警界大老 當街槍殺情婦	附圖
	聯合報(A12)	內蒙政協副主席 殺情婦被捕	
	大紀元報(A4)	內蒙原政協副主席 涉殺人捕	附圖

刊載日期	媒體名稱	標題或主要內容	備註
2015.3.24	大紀元報(A4)	內蒙政協副主席殺情婦 分析：藏重 大秘密	
	旺報(D5)	(內蒙)貪官兼凶官	
2015.3.25	大紀元報(A5)	千畝果樹死亡 內蒙千人抗議化工汙染	附圖
2015.4.8	大紀元報(A5)	內蒙古村民抗汙染 遭鎮壓怒砸警車	附圖
2015.4.13	大紀元報(A5)	中共剝奪基本人權 內蒙異議人士國 際呼救 (係哈達舊事重提)	附圖
2015.4.27	聯合晚報(A6)	蒙古女孩 來台治手臂	附圖
2015.5.30	旺報(C2)	打擊考試不公 內蒙清退高考移民	
2015.8.1	大紀元報(A5)	持槍殺人 內蒙原公安廳長被法辦 (係舊聞重登)	
2015.9.1	聯合晚報(A10)	前蒙藏委員會主秘劉學銚 再議邊疆 問題 (關於內蒙獨立之批判)	附圖
2015.9.24	聯合報(A12)	花蓮 700 件特色玉石 內蒙亮相	附圖
2015.9.26	聯合報(D2)	在台灣醫治病 蒙古醫師學會愛人	
2015.10.18	旺報(A12)	中俄間求生存 蒙古欲求永久中立	
2015.11.3	聯合報(A13)	周旋於美中俄 蒙古拼永久中立國	
2015.11.17	聯合報(A8)	蒙古童來台治療鴨掌手	
2015.11.18	自由時報(A12)	抗議賣煤給中國 蒙古工會主席自焚	附圖
		不滿煤炭銷中國 蒙古人士自焚抗議	
2015.12.3	大紀元報(A4)	涉挪公款 前內蒙銀行董座受審	
2015.12.7	聯合報(A12)	內蒙檢查站遭百蒙面客襲擊	
2015.12.8	旺報(C4)	中俄蒙地方旅遊部門簽署《吉林宣言》	
2015.12.23	周刊王	柯 P 糜邀外蒙應召女模登台	附圖
2016.3.10	蘋果日報(A10)	蒙古六賊遊台 偷走 61 i phone	附圖
	中國時報(A10)	蒙古竊盜集團 橫掃百萬 3C 商品	附圖
	聯合報(A8)	七里香到蒙古情 席慕容：寫詩是一 種誘惑	附圖

刊載日期	媒體名稱	標題或主要內容	備註
2016.3.17	聯合報(D2)	蒙古女孩惡性腦瘤 二度來台求醫續命	附圖
	中國時報(D3)	蒙古童腦膜炎 北榮二度救命	附圖
2016.4.14	旺報(A16)	內蒙古藝術 台北熱情登場	附圖
2016.5.1	旺報(A11)	蒙古盜團專業培訓	附各地竊盜表
	旺報(A10)	(蒙古竊盜) 鋁箔紙破解防盜門，商家成肥羊	
	旺報(A10)	蒙古人難境管 移民署有心無力	
	旺報(A10)	蒙古大盜 特製鋁包偷遍兩岸	附圖、表
2016.5.5	旺報(C3)	成吉思汗陵 舉行規模最大祭典	附圖
2016.6.10	聯合晚報(A4)	台灣名品博覽會內蒙登場	
2016.6.11	旺報(B3)	內蒙台灣名品展 運動用品發燒	附圖

六、對近年蒙古情況報導之分析

無論內蒙古或外蒙古，對台灣而言都是距離遙遠的地方，台灣媒體兩年來僅刊登有關內、外蒙古新聞七十七則，也不算意外，就以上七家媒體及另一份週刊屬性看，聯合報、聯合晚報係同一報系；中國時報、旺報係同一報系，以上四家媒體一向被認為反台獨媒體；自由時報則為比民進黨更激進之台獨派報紙；大紀元報似與法輪功有關，是一份逢中（共）必反的媒體；蘋果日報基本上並無政治立場，但以聳動為主；至於週刊王則為純消遣性刊物，也為中時報系旗下刊物。在以上七十七則新聞中，聯合報刊登十五則、聯合晚報三則、旺報二十九則、中國時報五則、大紀元報十六則、自由時報四則、蘋果日報四則、週刊王一則。在此七十七則新聞中，與外蒙古有關者有二十八則（內含一則台北市長柯文哲旗下文化局邀外蒙應召女模琳達來台參與文化局活動，而此外蒙女模在台期兼事賣淫，詳見 2015 年 12 月 23 日出刊之《周刊王》第 089 期），其他四十九則與內蒙古有關，就比列而言，頗為適當，不過各媒體對「外蒙古」在用詞上，似均未用心，如用「蒙古國」稱之就當前國際政治、法律而言，也屬正確，儘管與中國歷史文化、民族感情有受辱之心，但這是政治、法律的現實。但一般媒體往往習焉不察，以「蒙古」稱外蒙古（或蒙古國），則

爲極不適當作法，試問如以「蒙古」稱呼或代表外蒙古或蒙古國，則置內蒙古於何地？本文前段已強調蒙古民族或蒙古文化之主體爲內蒙古，但願今後不僅媒體，即一般民眾談論外蒙古事件或問題時，徑稱之爲外蒙古，不得已時可稱之爲「蒙古國」，不宜再以「蒙古」爲外蒙古或「蒙古國」之代稱。能對基本名詞作一釐清，進而對所刊載新聞的內容加以分析，始不致混淆失焦，也合於「必也正名乎」的古訓。茲對七十七則新聞分爲以下兩類予以分析：

(一)關於外蒙古者：

在 2014 年六月至 2016 年六月兩年間，台灣地區各媒體刊載有關外蒙古（或蒙古國）之消息共有二十八則，茲就其新聞內容大致分爲：有關政治理論、國防外交、外蒙文化、來台就醫、來台旅遊兼行竊、賣淫等五類，在各媒體刊登情況，以表列方式呈現如下：

	政治理論	國防外交(含一般政治事件)	外蒙人士來台就醫	有關外蒙教育文化	外蒙人士來台旅遊兼竊盜賣淫	備註
聯合報	1	3	3	1		
旺報		8		1	4	
中國時報		1	1		1	
自由時報		2				
蘋果日報					1	
周刊王					1	

在上列二十八則新聞中，唯一一則涉及政治理論者，爲刊載於 2014 年六月十四日《聯合報》，由自署《文字工作者》龔濟所撰《外蒙古獨立並非全中國人決定》，副標題爲《但台灣恐怕沒有力量「援例辦理」》，全文約長一千四百字，刊載於該報第十六版《民意論壇》，通篇大意略爲：1945 年外蒙古係經過「公民投票」通過而宣告獨立，文中並引公民投票之結果：「合法公民 494074 人參與投票，同意票 483291 人，占百分之 97.8%，反對票零，剩下的 10783 人爲棄權。」查此項具體數字（公民數及投贊成票者）係採自時爲內政部次長雷法章所撰《奉旅赴外蒙古參觀公民投票報告書》（參見本文前段注 8），至於投同意票之百分比及棄

權者之數據，當係龔氏自行推算所得（原報告書內並無此兩項數字），龔氏文中稱：「雷法章在事後的報告中說：『足見他們組織嚴密，控制徹底』」，經查雷法章原報告書之文字為：「此次公民投票，據稱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獨立願望之行動，實則在政府人員監督之下，以公開之簽字方式表示贊成與否，人民實難表示自由之意志，故此項過程顯屬掩耳盜鈴之舉。」與龔氏所敘在文字上頗有出入。另者龔氏文中稱雷法章一行（共十二人）之赴外蒙古為「觀察」投票情形，但雷氏所撰報告書作「參觀」投票情形，「觀察」與「參觀」如仔細推敲，兩詞是有頗大差異。龔氏之全點在說明外蒙古獨立，未經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進而闡述：

「國與國交，只有利害，絕無道義。國際行為準則，更由大國制定，與監督執行。外蒙獨立公投的模式，台灣沒有力量『援例辦理』。」

龔氏此段話也有斟酌空間，按外蒙古之獨立係源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附《換文二》甲項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長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莫洛托夫部長照會中提出如下之文字：

「部長閣下：

茲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之願望，中國政府聲明於日本戰敗後，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願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

中蘇之所以要簽定《友好同盟條約》，實爰於美國欲早日結束對日戰爭，希望蘇聯對日宣戰，於美、蘇、英三國元首在蘇境克里米亞半島之雅爾達舉行秘密會議，蘇聯趁機向美、英勒索，簽定所謂《雅爾達密約》，其中與我國外蒙古有關者為：「保持外蒙古現狀」，所謂「保持外蒙古現狀」，乃指在 1924 年在蘇聯操控下所成立之「蒙古人民共和國」，但同年中蘇曾簽定《中蘇解決懸案大綱》，蘇聯仍承認外蒙古為中國領土、主權屬中華民國所有。此項《雅爾達密約》由美國負責向中華民國施壓，於是遂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簽定，可見當年蔣介石政府怕在歷史上留下割裂領土的罵名，而加上「公民投票」之程序，將割裂領土的責任推給外蒙古公民，可見外蒙古之公民投票，是經過中華民國政府同意的，因此

龔氏說法頗有斟酌餘地，不過龔氏認為台灣沒有力量援例辦理，則屬的論。

其次，在媒體刊登有關外蒙古新聞中，以 2014 年八月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伉儷訪問外蒙古，最具新聞性，為此前十年所未見者，此舉無論對中共或對外蒙古而言，都具前瞻性意義，中國大陸自 2013 年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大計後，翌年又提出「亞投行」以為配合，此二計劃不但對大陸、中亞、東南亞數十個國家經濟發生巨大影響，更具戰略意義，中共在發展「一帶一路」及「亞投行」時，當然希望「家門口太平才安心」（見 2014 年八月二十三日，台北《旺報》A6 版），外蒙古位處中國大陸正北方，地勢高亢，對大陸內蒙古、華北地區具高屋建瓴之地緣優勢，而外蒙古之北則為俄國西北利亞，外蒙古正位處西北利亞中間南端，一旦向北發展，可將西北利亞一分之二，也具有地緣優勢，自 1990 年外蒙古真正獨立後，以其介於中俄之間，美、日力量立即進入，以便就近監視中俄，因此中共為免後顧（家門口）之憂，以便全力推動「一帶一路」及「亞投行」，此次習近平之訪問外蒙古，想必給予某些優惠措施，當然，此類措施，未必會在媒體曝光，在媒體上只見到「習喊話：歡迎蒙古搭陸發展列車」（見 2014 年八月二十三日台北《旺報》A6 版標題），當然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絕不相信習之訪蒙，僅止是歡迎外蒙搭陸發展列車，美國媒體則引述專家說法，指習近平此行是中國拓展周邊外交努力的一部分。在南面和東面與周邊國家陷入麻煩的時候，中國如與北方近鄰的聯繫，有地緣戰略上的考量」（見同上引《旺報》），此種分析較合於事實，當然仍只是表象之分析，相信美、日的國安部門必然會有更深入的研析，甚至已研擬出對策。此間知名學者謝劍先生為習之訪蒙，撰就《中蒙合作展現新機》之專文（見 2014 年八月二十六日，台北《中國時報》A14 版），提出若干看法頗見創見，很值得參考。

另有四則有關外蒙古醫師、兒童來台治病的新聞四則，需知千里迢迢來台治病，何不就南韓、日本或俄羅斯求治，考其原因乃是來台就醫，一切醫療費用很可能都是由台灣方面負擔，甚至往返旅費也都由台灣付出，而且這並非首例，以往已有頗多成例，當然台灣在臨床醫術上，雖不敢說獨步全球，但屬於領先群則毫無疑問，行有餘力，則以助人，也屬好事一

樁。但無獨有偶，另有七則有關外蒙古人士來台旅遊、竟然兼事竊盜及賣淫，則不禁使人有：「我本將心照月，其奈明月照溝渠」之感。

另一則新聞其標題為：《周旋於美中俄，蒙古拼永久中立國》，（見 2015 年十一月三日，台北《聯合報》A13 版），此則新聞主要內容為「夾在中俄兩大國之間的內陸國蒙古，長久以來在外交上走中間路線，除了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維持平衡外，也把美國和其他遠方盟友當作『第三鄰國』，以制中俄，美聯社報導，為進一步鞏固這種平衡地位及抵抗外部力量，蒙古上周將成為永久中立國的相立法草案提交給國會。」（見上引報），看來外蒙古本身或許確實有意要成為永久中立國，但能否成為中立國，絕不是憑本身主觀意願，客觀環境是更重的因素。所謂中立國，最重要的是本身能「立」起來，且看自上世紀末擺脫蘇聯真正獨立後，可說是一洗如貧，國民生活日見困難，物質極度缺乏，引起世界各國之注意，遂有國際援蒙組織之成立⁹，截至 2000 年各國提供援蒙金額高達二十五億美元，如以以外蒙古二百四十萬人計，平均每人可攤到 1040 美元，當時一美元抵一千外蒙土格里克，外蒙古一個大學教授月俸約為二萬外蒙土格里克，此項援助不可謂不大，然而外蒙之經濟並未因之大幅改善，其中是否有使用不當或中飽情形，不免使人存有頗大之懷疑空間，事實上外蒙古上自總統、政府官員、國會議員接受外援時，利用經手機會，中飽私囊情形並不少見¹⁰，另據 2001 年八月二十七日日本《讀賣新聞》即也披露一則消息，大意略為：日本三井物產職員為獲取一項由日本政府開發援助 ODA (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援助外蒙古的發電工程案，被控以一百多萬日圓賄賂負責主管此項企劃案之外蒙古高層官員。試想一個經濟無法自立，政治無法清明的國家，要談永久中立，可能性能有多大，國際援蒙諸國中，純出於人道考量者固然會有，更多的國家則出自

⁹ 國際援蒙會議始創於 1990 年，由世界各國共同參與，討論如何協助外蒙古渡過經濟轉型，並提供實質經濟援助。約每十八個月到二十四個月舉行會議一次，前幾次幾乎都在日本舉行，只有 1999 年在外蒙古首府烏蘭巴托舉行，總計自 1990 年至 2000 年各國已提供約二十五億美元之援助，台灣給大米等實物援助尚未包括在內，以上可參見蒙藏委員會《蒙藏現況雙月報》卷十第四期，2001 年九月。

¹⁰ 外蒙古前總統恩赫巴亞爾（2000~2009 年，先後任總理總統）於 2012 年 7 月 31 日因貪污罪被捕，初判七年，後減刑為三年，見 2012 年 8 月 4 日台北《自由時報》A18 版，同日台北《中國時報》A18 版則稱判刑四年。

政治考量，美、日之援蒙，若無政治考量，其誰能信，若干大國、強國對外蒙之援助，必有其政治、軍事的，在此種情形下，外蒙古要談成爲永久中立國，何其難也。

再從另一層面看，外蒙古位處中俄之間，而中俄兩個都是地廣人眾之大國，俗語有謂兩大之間難爲小，自清康熙以至清末帝宣統三年之二百多年間，外蒙古以其所處中俄之間，如不投南，則必靠北，康熙三十年（1691年）外蒙古自動歸附中國，納入版圖，但二百二十三年後，清宣統三年（1911年）宣佈「獨立」而投向俄國，這是地緣上的歷史命定，想要擺脫歷史命定，並非絕無可能，但以今日外蒙古政治、經濟、科技情況看，可能性微乎其微，同時看中俄兩國在可預見的將來都不會有崩解情況，因此外蒙古想成爲永久中立國，仍然只是烏托邦或桃花源。

（二）關於內蒙古者

在上述兩年時程中，此間報導有關大陸內蒙古地區新聞共有四十九則，每年平均二十四則，平均每月兩則，以內蒙古與台灣距離遙遠，兼以台灣媒體除本土新聞外，似乎只對美、日新聞較感興趣，從此面向看，平均每月能報導兩則有關內蒙古新聞，密度也不算太低，以新聞性質大致分爲以下七類：政治、懲貪、文教、旅遊、環保、經貿及其他七類，茲以表列方式呈現如下：

	政治	懲貪	文教	旅遊	環保	經貿	其他	備註
聯合報	5		1	2		1		
聯合晚報			1			1		
中國時報						1		
旺報		5	2	2	5	2		
大紀元報	8	1	1		6			
自由時報							2	
蘋果日報	3							

從上表中可看出政治類有十八則、環保類十一則、懲貪類六則，此三類共有三十五則，占全部 70%強，在以往因經濟發展而招致自然生態破壞、政府官員貪汙，總認爲是「家醜」，想方設法加以遮掩，外界自然無

法知道，近年以來環保意識抬頭，而習近平上台後，嚴行懲貪，因此這一類新聞漸見增多，只有掀起「家醜」的面紗，才不會再發生家醜，無論從任何角度看，注重環保、懲治貪汙，都應該是進步的作為。在旅遊新聞方面，2015 年三月十六日，《聯合報》C8 版，刊登了一則標題為《內蒙古沙漠闖玩大飯店、水世界》之旅遊新聞，占有極大篇幅，且附有十二幅彩色圖片，此則新聞確實相當引人入勝，沙漠中如何能有水世界？報導之記者只說此一沙漠為庫布其沙漠，並未指出其地理位置，按庫布其沙漠在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原伊克昭盟 2001 年始改置為鄂爾多斯市）西北部杭錦旗北部，顯然報導之記者，對內蒙古之地理情況不太瞭解，在此一報導中同時介紹了響沙灣、黃崗梁國家公園、阿斯哈圖冰川石林等景點，通篇報導頗有「置入性」行銷意味，但所附圖片確實吸睛。

至於政治類新聞，以內蒙古人哈達，「搞」內蒙古獨立較為引人注意，哈達氏自稱為前南蒙古聯盟主席，「南蒙古」一詞，顯然脫胎於「漠南蒙古」，但兩者絕不相等，如所周知，聚居於俄境貝加爾湖周邊的布里雅特蒙古，習稱之為北蒙古，這個南蒙古的稱謂，顯然是對蒙古民族史、蒙古地理的不瞭解，一個對本身歷史都不夠認識，就去「搞」民族革命，這等於小孩玩大車，極其危險。

這個哈達，蒙名呼格吉勒圖，1955 年生，研究生教育程度，於 1989 年成立蒙古文化救助會，自任會長，次年與其妻新娜（蒙古族，1956 年生）合開書店，主要販賣蒙古方面書籍，1992 年將蒙古文化救助會更名為「南蒙古民主聯盟」自任主席，開始涉入政治活動，主張內蒙古高度自治，被當局以「分裂國家」等罪刑入獄（見 2015 年四月十三日台北《大紀元報》A5 版），刑滿出獄後，就開始向外界呼冤求援，更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及禁止酷刑委員會發出公開信，此公開信長達七、八百字，此信末段如下：

「……我在此緊急呼籲你們出面與中國政府交涉解凍銀行帳戶以解我們的燃眉之急，越快越好，否則我們全家就要靠討飯過日子了。當然，如果解凍銀行帳戶的問題不能迅速解決，聯合國方面是否可以給予人道主義援助，以便讓我們吃飯、治病？如果能讓我們全家出國並給解決冤案，我們全家人會舉雙

手歡迎的。……」（此項資料取自網路）

此項「呼籲信」真正的目的，原來是「如果能讓我們全家（含其妻新娜、子威斯勒）出國」，這位哈達先生似乎從開始就不知道「搞獨立、鬧革命」是「拋頭顱、灑熱血」的事業，豈有遇到困危就向外人求援，他可能也從未思考過內蒙古自治區民族結構問題，據 2011 年資料全內蒙古自治區共有二千四百三十六萬人¹¹，再看全大陸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大陸共有蒙古族人口為五百九十八萬一千八百四十人¹²，姑以六百萬人計，其中有居住在遼寧省、河北省、青海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者，真正在內蒙古自治區之蒙古族僅占自治區總人口 17.6%，請問內蒙古如何獨立？所以謂內蒙古獨立是個假議題。在以往兩年台灣媒體刊登此消息者，只有《大紀元報》而且同一事件重複刊登（如 2015 年三月六日，2015 年四月十三日，重複刊登哈達事件），可見該報立場為逢中（共）必反，不惜炒冷飯。

至於列為其他類的兩則，都是出現於《自由時報》，其中一則標題為：《扯！蒙藏會擬赴中考察稀土》，刊登於 2014 年八月二十八日該報 A4 版，緣於立法院審查蒙藏委員會次年度預算時，發現該會所編次年度差旅費中列有「赴中國辦理稀土產業與台灣高科技業發展計畫及資料蒐集」，此項係《自由時報》所刊載者，其稱「赴中國」應不會是蒙藏委員會預算書上之用語。另一則標題為《亞洲八億男係出十一老祖宗》，刊載於 2015 年一月三十日該報 A20 版，所謂十一位老祖宗指包括蒙古成吉思汗、遼太祖契丹族耶律阿保機等在內之十一人，此純屬花邊新聞。

¹¹ 見北京星球地圖出版編印之《內蒙古自治區地圖冊》，2011 年，頁 1。

¹² 見大陸《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各民族人口》。

乾隆朝清初開國神話辨析

張華克
中國邊政協會常務監事

摘要

乾隆當政時期，不同版本的官書所記錄的清初開國神話，大量湧現。這些神話經在過御覽之後，所處的命運，卻各自不同。有的遭到大幅修改，有的則絲毫未動。個中原委，當然值得探討。本文嘗試從滿漢檔案文字之中，找出六個版本，按照時間先後，加以詳細分析：一、乾隆元年（1736）《太祖高皇帝本紀》二、乾隆四年（1739）《八旗通志·初集》三、乾隆四十四年（1779）《滿洲實錄》四、乾隆五十一年（1786）《皇清開國方略》五、乾隆五十二年（1787）《清朝通志》六、乾隆五十四年（1789）《滿洲源流考》等。經對比更早版本之後，即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完成重修的《太祖高皇帝實錄》，初步了解清初開國神話一直暗藏生殖崇拜隱喻，乾隆或於發覺後，即予以修改刪除，以期保持開國神話的純潔。不過對於已經寫就的大內官書，刪改將不勝其煩，且啓人疑竇，故以「稽古右文」的名義保留了原始文件的不雅內容。

關鍵字：乾隆 隱喻 生殖崇拜 禁忌 神話

壹、前言

2016年7月12日，位於荷蘭海牙和平宮內的仲裁庭，公布了世界矚

目的南海仲裁案結果。托馬斯·門薩等五名法官大筆一揮，說南海九段線無法律基礎，太平島是岩礁而非島嶼。由於海峽兩岸均受此仲裁案結果所波及，一致認為其偏頗且無效，並咸感憤慨。

不過這種處境，對才兩百多年前的大清朝廷，是很難想像的。乾隆（1711—1799）在世的時候，大清國可是威服四海，萬邦來朝的，基本上沒有這層顧慮：

乾隆帝並有「十全武功」，終底定內亂外患，遂奄有北自庫頁島，南至中南半島，西自中亞，東到海之廣袤疆土，國強民富，為中國歷代少有之盛世。¹

或許有人會有疑問，這個大清「廣袤疆土」的範圍，並沒有提起南海九段線、十一段線、太平島、黃岩島之類的，怎麼能知道南海到底屬誰？答案其實很簡單，乾隆的國界「南至中南半島」就是解答。因為實力能到達中南半島，²以此半島向東延伸二百海里，南海誰屬還會不清楚嗎？何況南海的英語名稱「South China Sea」，意為「南中國海」，是國際通稱，歸屬也是十分明白的。

這當然就是民國三十五年（1946）7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政府能以太平艦領軍前往南海，收復日軍所佔領過的南沙和西沙兩群島，並以軍艦名稱命名最大島為太平島的立論基礎。³又此行只能稱之為光復，而非接收或佔領。試想，若無悠久的歷史傳承，政府憑什麼派太平艦去宣示主權呢？

當年乾隆有「十全武功」實績，所以無人膽敢挑戰其南中國海統治主權，地位之高，令人難以想像。

不過俗語說「台上一刻鐘，台下十年功」，乾隆的風光，其基礎可是他父親雍正所辛勞打下來的。因此，說到乾隆，就不能不順便提一下雍正。

¹ 程光裕，《中國通史》，（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13[民 102]），頁385。

² 中南半島清末時轉為法國和英國殖民地，其中寮國、柬埔寨、越南被法國統治，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被英國統治，南海問題才逐漸浮現。

³ 太平島傳統的名字是「黃山馬峙」，是由中國漁民在家傳的海圖中對這座島嶼所記下的名稱，「峙」有「高聳」的意思。

乾隆與雍正，在治理國家方面，具有截然不同的政治風格。雍正節儉，不蓋專供遊賞用的離宮別館，只顧著四處尋找銀兩，充實國庫，辛勤彌補前朝的廢弛及虧空。其施政在財務上以「火耗歸公」等四項最為有名：

雍正帝既承康熙疏節闊目之後，除先嚴查會計外，更以積極政策講國庫收入之方法。今舉其顯著者，約有四端。曰、火耗之歸公。曰、常例之捐輸。曰、鹽課之增收。曰、關稅之實徵是也。以下各節互為說明之。且有可得而附言者，帝之對於吏治之根本思想，比父皇康熙遠為卓越。常對於直省督撫曰：邇來不能體聖祖寬仁之德意，吏治漸致廢弛。朕之嚴加整飭，並非苛酷云云。諭戶工二部曰：財者利用之源也，古帝王計富國裕民，務必謹其制度。朕每恐府庫之金錢，為胥吏侵蝕中飽云。其時凡戶工二部所用費額，雖無分細大，送冊報告。各省藩庫之官吏，對於私用官金額，即以各員之俸銀補償。名雖如此，彼等於正課之外，未嘗不有所附加也。據禮親王之言，帝在位十三年，日夜憂勤，毫無聲色土木之娛。聞內務府司員之查舊檔案者，謂雍正中，惟特造風雲雷雨四神祠外，初未建造一離宮別館，以供遊賞，宜乎當時國帑豐盈，人民富庶云。⁴

而乾隆倚靠著雍正累積的財富為基礎，常用於征服事業上。即使耗費了如天文數字般的金錢，卻因當時人口增加、土地開墾範圍擴張，國富民強，而不覺匱乏，堪稱盛況空前：

乾隆在位六十年之久，西略伊犁，南征尼泊爾，東北絕海之庫頁酋長，亦重譯而朝於北京。版圖之擴張，伴以兵力，故軍用之浩繁，亦歷代無其比。乾隆二十二年，討平新疆，費達二千餘萬兩。然出此軍需，國庫仍不罄乏。時戶部報告，剩餘銀尚有七千萬兩。四十一年，大小金川戰起，前後軍需用去七千餘萬兩。是年之上諭，仍報國庫尚存銀六千餘萬兩。四十六

⁴ 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臺北市：中華書局，民 49[1960]，臺一版），第 46 章，頁 124-125。

年，又增加至七千八百萬兩。如此多數之剩餘金，東西各國所不見其例者也。據史家之確言，乾隆帝普免天下之錢糧者四回，免七省之漕運米者二回，巡幸江南者六回，其數殆達二億萬兩。然五十一年之詔，仍有七千餘萬兩之剩餘金。又逾九年，至讓位之時，其數依然不減，可謂清朝府藏之極盛時也。但乾隆五十七年戶部之總冊，有各省實徵歲入銀四千三百五十九萬兩，歲出三千一百七十七萬兩，而餘銀一千一百八十九萬兩。驟覩之不得不疑其過多，但乾隆時人口之增加，及土地之開墾，範圍擴張，得如此財政豐富之結果，亦何容疑？⁵

雍正、乾隆個性不同，這種對比，除了財政策略上相異之外，還可在一些施政手法上，看出端倪。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關係著皇位繼承權的「皇太子密建法」。

根據《雍正皇帝實錄》上記載，雍正十三年八月廿三日半夜，雍正皇帝突然駕崩。因為廿一日皇帝身體雖然略為有些不適，但還在「照常辦事」。⁶不過一過八月廿二日，短短一天內，就忽然群醫束手而賓天了。

皇帝突然間崩逝，照理是該舉國震動，亂成一團的，不過紫禁城裡卻是異常平靜。在寢宮前，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恭捧雍正御筆親書密旨，在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領侍衛內大臣公豐盛額、訥親、內大臣戶部侍郎海望等重臣觀禮見證下，乾隆順利登基，完成接班任務。⁷

這不能不說是雍正的先見之明。因為雍正早已設計了「皇太子密建法」，預防了傳位所可能產生的諸多問題。在雍正元年八月間，雍正曾於乾清宮，召諸王滿漢大臣晉見，當面宣告了建儲事宜。並且親書諭旨，加以密封，收藏於乾清宮最高之處，決定要傳位給寶親王皇四子弘曆：

己丑子刻，上崩。遺詔曰：自古帝王統御天下，必以敬天法祖為首務。而敬天法祖，皆本於至誠。至誠之心，不容一息

⁵ 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臺北市：中華書局，民 49[1960]，臺一版），第 46 章，頁 130。

⁶ 華文書局輯，《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臺北市：華文：華聯書局，民 53[1964]），卷 159，頁 19。

⁷ 華文書局輯，《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臺北市：華文：華聯書局，民 53[1964]），卷 159，頁 19-20。

有間。是以宵旰焦勞，無日不兢兢業業也。朕蒙皇考聖祖仁皇帝為宗社臣民計，慎選於諸子之中，命朕繼承統緒，紹登大寶，夙夜憂勤，深恐不克負荷。惟仰體聖祖之心以為心，仰法聖祖之政以為政，勤求治理，撫育蒸黎，無一事不竭其周詳，無一時不深其祇敬。期使宗室天潢之內，人人品行端方，八旗根本之地，各各奉公守法。六卿喉舌之司，紀綱整飭，百度維貞。封疆守土之臣，大法小廉，萬民樂業。十三年以來，竭慮殫心，朝乾夕惕。勵精政治，不憚辛勤。訓誡臣工，不辭諄復。雖未能全如期望，而庶政漸已肅清，人心漸臻良善，臣民徧德，遐邇恬熙，大有頻書，嘉祥疊見。朕秉此至誠之心，孜孜罔釋，雖至勞至苦，不敢以一息自怠。方冀圖安保泰，久道化成。今朕躬不豫，奄棄臣民。在朕身，生本無生，去來一如。但我皇考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至今日雖可自信無負，而志願未竟，不無微憾。寶親王皇四子弘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聖祖皇考於諸孫之中，最為鍾愛。撫養宮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間，朕於乾清宮，召諸王滿漢大臣入見。面諭以建儲一事，親書諭旨，加以密封，收藏於乾清宮最高之處。即立弘曆為皇太子之旨也。其後仍封親王者，蓋令備位藩封，諳習政事，以增廣識見。今既遭大事，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⁸

雍正遺詔裡詳細提到「皇太子密建法」的建置環境與過程，可見其用心良苦，顯然期望子孫能仿照延續，以傳諸久遠。

不過這位寶親王皇四子弘曆，即位後稱為乾隆皇帝的，顯然並不領情。他對雍正發明的密建制度一再批評。認為這只是一種因父子兄弟之間，相互猜疑，由弊而生的方法，不用也罷：

皇太子之密建。雍正帝於皇位繼承一事，頗有困苦之經驗，故於生前不宣布冊立皇太子云。帝即位之後，預就諸皇子中可以託負宗社者定之，親寫其名密封於匣，置於乾清宮內之

⁸ 華文書局輯，《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臺北市：華文：華聯書局，民53[1964]），卷159，頁20-22。

正大光明匾額後，以備不虞。又以此意諭示諸王大臣，迨帝死後，君臣共同啟視。然後紹大統，是為高宗（乾隆帝）。密建之制度，爾後似為愛親覺羅之家法，但亦不盡然。乾隆帝曰：建儲一事，如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朕雖未有立儲明詔，然既於太祖之前，齋心默告，實與立太子無異。又曰：父子兄弟之間，猜疑漸生，至釀成大禍，當思朕今日之言。觀帝之言，則知採用密建，不過懲前代之弊。若此弊別有保障之法，帝亦不必以密建之宗法為善也。時帝以倦於六十年聽政之長日月，宣布立第六皇子永瑢為皇太子。退位之後，稱太上皇，行訓政事。乾隆六十一年之曆書，新帝年號之曆書，并行於世，可謂拋棄家法之明徵。⁹

乾隆更以行動表現，在聽政六十年後退位，直接禪位於子顥琰，¹⁰改元嘉慶。自稱太上皇，依然訓政。這就是乾隆不受雍正遺詔上的密建「家法」約束的具體證明。

此外，乾隆對雍正虐殺兄弟的「改名案」手段，也頗不以為然。所謂「改名案」，就是雍正將八弟允禩，在雍正繼位後，被先安撫封為廉親王，後又被改名為「阿其那」，削宗籍和圈禁致死的著名案例。根據雍正四年三月間《雍正皇帝實錄》上有以下簡略的記載：

諸王大臣等，遵旨將允禩改名之處詢問允禩，允禩自改名為阿其那。改伊子弘旺名為菩薩保，奏入，報聞。¹¹

允禩囚禁於宗人府同年九月初就過世了，¹²似乎一切歸於平靜。但是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乾隆繼位後，卻立刻下命九卿，就關於阿

⁹ 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臺北市：中華書局，民 49[1960]，臺一版），第 43 章，頁 51。

¹⁰ 皇太子永瑢登基後為避免避諱擾民，改為冷僻字顥琰。

¹¹ 華文書局，《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一，卷四十二，頁 11。

¹² 華文書局，《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二，卷四十八，頁 13。「順承郡王錫保奏，阿其那染患嘔症，前於初一日奏聞。奉旨：將阿其那用心調養，欲食之物悉着給與。臣遵旨，令太監給與調養，至初五日，阿其那病勢加增，不進飲食，初十日病故，報聞。」

其那、塞思黑子孫回歸宗室的問題，¹³各抒己見，確議陳奏。表示乾隆對雍正的改名處置，不予苟同，根本上有意翻案：

阿其那、塞思黑存心悖亂、不孝不忠，獲罪於我皇祖聖祖仁皇帝。我皇考即位之後，二人更心懷怨望，思亂宗社，是以皇考特降諭旨，削籍離宗。究之二人之罪，不止于此，此我皇考至仁厚之寬典也。但阿其那、塞思黑，孽由自作，萬無可矜，而其子若孫，實聖祖仁皇帝之支派也，若俱屏除宗牒之外，則將來子孫，與庶民無異。當初辦理此事，乃諸王、大臣再三固請，實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辦理之處，著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見，確議具奏；其中若有兩議、三議者，亦准陳奏。¹⁴

但是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卻都懾於雍正的「餘威」，畏如寒蟬，不敢褒貶一詞。害得乾隆足足等待了四十三年，也聽不到各方的絲毫反應。最後只好自尋台階，降下特旨，將允禩、允禟復名並納入宗譜。¹⁵才將一個遷延半世紀之久的允禩改名案，草草告一段落。

從以上兩個案例裡可以看出，乾隆對雍正有意見的地方，不一而足，並非全盤蕭規曹隨。而這種現象，在乾隆時期大量出現的清初開國神話中，也同樣可以發現。

許多人可能並不知道，乾隆對自己的祖先神話故事，也曾加以修改。而且在不同的版本中，又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有的甚至完全不改，讓原始記錄，真實呈現。

對於這些開國神話，改與不改間，到底有什麼用意，從前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以下將按照時間先後順序，嘗試從檔案滿漢文字中，探討以下六個版本：一、乾隆元年（1736）《太祖高皇帝本紀》二、乾隆四年（1739）《八旗通志·初集》三、乾隆四十四年（1779）《滿洲實錄》

¹³ 康熙帝第九子允禩，也遭雍正改名為「塞思黑」。

¹⁴ 華文書局，《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一，卷四，頁二十八。

¹⁵ 華文書局，《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廿一，卷一〇四八，頁十七至十九。時間是乾隆四十三年正月甲戌日（1778 年）。

四、乾隆五十一年（1786）《皇清開國方略》五、乾隆五十二年（1787）《清朝通志》六、乾隆五十四年（1789）《滿洲源流考》等，並對比更早的版本，即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重修完成的《太祖高皇帝實錄》，期望藉著詳細的分析比對，了解其處理的原委

貳、系列版本

一、《太祖高皇帝本紀》

乾隆元年（1736），《太祖高皇帝本紀》編修完成，「本紀」的開頭部分，就有一段俗稱為〈三仙女〉的清初開國神話，算是乾隆年間這類神話故事的先聲。

首先來了解「本紀」的涵意。所謂「本紀」，是紀傳體史書中記述帝王事蹟的專用名詞，始於司馬遷的《史記》。唐朝歷史學家司馬貞曾經做過如下的解釋：

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又紀，理也，絲
縷有紀。而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代綱紀也。¹⁶

至於《太祖高皇帝本紀》的編修，何以要到乾隆朝才完成，也是有其緣故。原來清朝國史館一直附屬於翰林院，國史館裡的官員如總裁、纂修、協修等等，也都是由翰林院的官員兼充的。而皇帝的實錄和聖訓總是優先纂修，本紀則放在其次。由於以上兩種因素，才會使太祖的本紀完成初稿，比「實錄」的初修晚了一百多年：

根據清朝史書所記我們可以確知：雍正以前的幾朝帝王「本紀」，纂修的時間比這些皇帝的實錄和聖訓要晚得多。以太祖一朝為例，實錄一書初修於太宗天聰元年（西元一六二七年），聖訓也在順治朝開始纂修；可是太祖的「本紀」則一直到乾隆元年（西元一七三六年）才完成初稿，恭進御覽，比實錄的初修晚了一百多年。至於清太祖以後各朝的「本紀」編著與出版情形，清代官方資料中也可以看到有關的記錄，如太

¹⁶ 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影印史記》，（臺北市：啓明書局，民55[1966]，再版），卷一，本紀，頁1。

宗、世祖、聖祖這三朝的「本紀」，乾隆初年還在纂修，到嘉慶八年（西元一八〇三年）的時候才修成存放在國史館中，但當時「尚未裝潢成帙」。清世宗的「本紀」也是在乾隆年間開始纂修的，高宗在乾隆初年曾經降旨說：「我皇考本紀，亦應及時敬謹編輯。」可見雍乾時期才著手對清初帝王編輯「本紀」，而乾隆即位後這項工作才走上正軌，前一朝帝王的本紀與實錄從此都在新皇帝繼承後不久就始修了。嘉慶年間清官書中有「國史館尊藏五朝本紀」的記載，可知當時世宗本紀也已經修製完成。¹⁷

當然國史館對「本紀」的編修一再遷延，也是不正常的。因此乾隆初年開始降旨要求「我皇考本紀，亦應及時敬謹編輯。」才使此後本紀的修製工作，逐漸走上正軌。不過這本遲到的《太祖高皇帝本紀》，卻讓乾隆朝的清初開國神話，型態忽然豐富起來。因為這冊「本紀」的開國神話長相，跟後來的幾個，相差頗遠，可以當作比對的標準，現在就先來看看這個本紀的內容。

成書於乾隆元年（1736）完成的《太祖高皇帝本紀》，原檔現存於台北故宮，¹⁸並未公開出版，還算是個秘本。但即使在清朝，這類作品，也是深藏大內，決不公開的：

由於這批史料以往深藏大內，外間一般的人不能共見，所以多年來極少人知道它們的收藏情形與內容，現在我們能目睹這些珍本，實在也算是一種幸運。清代這種特殊制度下的產物種類很多，如大清歷朝實錄，聖訓、起居注、開國方略、大清會典等等，本書所要討論的滿文「本紀」就是其中之一。¹⁹

而且清人有其自創的文字滿文，以致朝廷也規定，凡是宮修史書，都

¹⁷ 陳捷先，《滿文清本紀研究》，（臺北市：明文書局 民70[1981]，初版），頁7-8。

¹⁸ 《太祖高皇帝本紀》滿文原名：daicing gurun i taidzu dergi hūwangdi i da hergen i bithe. 現藏一函二冊二卷。另有漢文對照本子，也是一函二冊二卷。第一冊（卷上）：凡例，太祖先世至萬曆四十三年（1615），第二冊（卷下）：天命元年（1616）至太祖駕崩天命十一年（1626）。

¹⁹ 陳捷先，《滿文清本紀研究》，（臺北市：明文書局 民70[1981]，初版），頁3。

要同時以滿漢兩種文字繕寫，恭存在北京宮中與瀋陽故都等地。²⁰

因此，清代很多官修的史書都有以滿漢兩種文字的版本，和以往其他各朝各代只有漢文本一套的情形，大不相同。以下就是《太祖高皇帝本紀》滿文、漢文對照本子的開國神話內容：

taidzu abkai hese be alifi forgon be mukdembuhe, gurun i ten
 be fukjin ilibuha, ferguvecuke gungge, gosin hiyoošungga horonggo
 enduringge, šu be iletulehe, doro be toktobuha, genggiyen
 erdemungge, ambalinggū kengse ginggun elhe dergi hūwangdi, hala
 aisin gioro, gebu nurgaci nenehe jalan golmin šanggiyan alin ci
 hūturi be deribuhebi, alin den juwe tanggū ba funceme bi, šurdeme
 minggan ba, yalu, hūntong, aihu sere ilan giyang tucikebi, sukdu be
 tuwame bahanara niyalma i henduhengge, ubade enduringge niyalma
 tucifi geren gurun be dahabumbi seme gisurehe bihe, alin i šun
 dekdere ergi bukūri gebungge alin i da de bulhūri gebungge omo bi,
 ulame jihengge, abkai sargan jui enggulen, jenggulen, fekulen, ilan
 nofi omo de ebišeme jifi, ebišeme wajija manggi, enduri saksaha
 fulgiyan tubihe be saifi, fiyanggū sargan jui i etukui ninggude
 sindaha be, fiyanggū sargan jui hairame angga de ašufi nunggefi,
 uthai beyede ofi, goidahakū haha jui banjiha, banjime jaka uthai
 gisurembi, banin giru ferguvecuke, ambakan oho manggi, eme
 turgun be alafi hendume, jui sini hala aisin gioro, gebu bukūri
 yongšon, simbe, abka facuhūn gurun be toktobukini seme
 banjibuhabi, si genefi dasame toktobume banji, ere birai eyen be
 wasime genefi, ilinaha ba uthai inu sefi, weihu bufi, eme abka de
 wesike, tere jui weihu de tefi, eyen be dahame wasime genehei,
 muke ganara dogon de isinafi, dalin de akūnafi, burga be bukdafi,
 suiha be sujame mulan arafi, mulan i dele tefi bisire de, tere fonde,
 ilan halai niyalma, gurun de ejen ojoro be temšendume, inenggidari

²⁰ 陳捷先，《滿文清本紀研究》，（臺北市：明文書局 民 70[1981]，初版），頁 3。

afame wandume bihebi, emu niyalma, dogon de muke ganame
 genefi sabufi, ferguweme tuwafi amasi jifi, geren i baru alame, jakan
 muke ganara dogon de, dembei ferguwecuke fulingga banjiha emu
 haha jui jifi tehebi sehe manggi, geren genefi tuwafi, gemu
 ferguwehe, turgun be fonjici, alaha gebu, hala, ini eme i gisun i
 songko, geli hendume, bi, abkai sargan jui fekulen de banjihangge,
 abka, mimbe suweni facuhūn be toktobukini seme banjibuhabi sehe
 manggi, geren gemu ferguweme hendume, abkai salgabuha
 enduringge niyalma kai sefi, juwe niyalma gala be ishunde joolame
 jafafi, galai dele teбу fi gamafi, ilan halai niyalma, beri gege be
 sargan bufi, gurun de ejen obuha, ede facuhūn be uthai toktobuha,
 tereci golmin šanggiyan alin i šun dekdere ergi omohoi gebungge
 bigan i odoli gebungge hecen de tefi, gurun i gebu manju sehe.²¹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筆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姓愛新覺羅氏，諱努爾哈齊。先世發祥於長白山，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里，鴨綠、混同、愛渾，三江出焉。有望氣者，言其地將生聖人，統一諸國。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天女三，長恩固倫，次正固倫，季佛庫倫，浴於池。浴畢，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愛之，置口中，吞之，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之故，因命之曰：「汝以愛新覺羅為姓，名布庫里雍順，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汝順流往，即其地也。」與小舠乘之，母凌空去，子乘舠順流至河步。登岸，折柳及野蒿為坐具，端坐其上。時其地有三姓爭雄長，日構兵仇殺，有取水河步者，見而異之，歸語眾曰：「適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眾走視，皆異之。問所自，語姓名，如母所命，且曰：「我天女佛庫倫所生，天命我定汝等之

²¹ 《daicing gurun i taidzu dergi hūwangdi i da hergen i bithe dergi debtelin.》（滿文太祖高皇帝本紀，上冊。），（台北市：故宮博物院藏手寫本，乾隆元年（1736）），頁1-4。

亂者。」眾驚曰：「此天生聖人也。」乃交手昇之歸。三姓遂以女百里妻之，奉為國主，而其亂遂定。於是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國號滿洲。²²

如果認為《太祖高皇帝本紀》是完成於乾隆元年（1736）的，那麼乾隆必然經手過這冊官書的文字修改，那就與實際情況有所差距了。

首先要了解這本官書在國史館中已經編修多年，乾隆元年（1736）不過是完成的年代，怎麼算都是雍正、康熙朝纂修的時間比較長。此外乾隆皇帝剛剛繼位，守孝期間，百廢待舉，不大可能有閒暇去更動開國神話。例如當時皇帝身邊最倚重的「軍機處」，都暫停業務，由總理事務王大臣綜理國政，可以看出當時乾隆執政的概況：

雍正時，又於內閣之外另添一「軍機處」。軍機處為清朝特有之制度，其始係屬臨時設置，演變所至，終成「掌軍國大政，以贊機務」之中樞集權機構。軍機處名不師古，乃為適應世宗用兵西北，保持機密，削減議政王大臣職權，貫徹君王專制諸目的而設置。在君主專制政體下，皇帝恆有集權一身之慾望，而軍機處乃實現皇帝此種慾望之工具。由於具有此種功能，是以一經創設之後，除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高宗為示父皇崩逝，無治理國事之心情，以及表明初登大位，於政事未曾嫵習之謙德，任命總理事務大臣綜理國政，而將軍機處暫予裁撤外，此一機構於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十一月復設，存迄清末。²³

乾隆謙稱初登大位，對於政事未曾嫵習，因此任命總理事務王大臣，綜理國政。總理事務王大臣名單為：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保和殿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人。而軍機處是到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十一月才復設的，也算是乾隆正式執政的開端。

由此可以看出，《太祖高皇帝本紀》雖完成於乾隆元年（1736），卻

²² 《太祖高皇帝本紀》，（台北市：故宮博物院藏手寫本，乾隆元年（1736）），上冊，頁1-2。

²³ 程光裕，《中國通史》，（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13[民 102]），頁397。

正處於這段新皇帝「初登大位」，無心治理國事的時期，因此《太祖高皇帝本紀》的完成，應該算是前朝雍正、康熙皇帝帶頭所修纂的成果，與乾隆關係不大。

另外可以比較較早成書的《太祖高皇帝實錄》，也可大致看出，這篇本紀，不過是前書的翻版，使乾隆更改的可能性更為降低。《太祖高皇帝實錄》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九月，完成重修工作，雍正十二年(1734)重加校對，至乾隆四年(1739)校訂告成。不過本書主要的「刪削增飾，乃康熙時為之」，²⁴雍正、乾隆只是校訂而已。現展示《太祖高皇帝實錄》裡的開國神話，可以比較：

(taidzu abkai hese be alifi forgon be mukdembuhe, gurun i ten
 be fukjin ilibuha, ferguvecuke gungge, gosin hiyoošungga horonggo
 enduringge, šu be iletulehe, doro be toktobuha, genggiyen
 erdemungge, ambalinggū kengse ginggun elhe dergi hūwangdi,)
 hala aisin gioro gebu nurgaci nenehe jalan golmin šanggiyan alin ci
 hūturi be deribuhebi golmin šanggiyan alin den juwe tanggū ba
 funceme šurdeme minggan ba funceme bi, alin i arbun colgoropi
 saikan ferguvecuke sukdu borhome isahabi, alin i ninggude tamun
 gebungge omo bi šurdeme jakūnju ba sekiyen šumin eyen amba yalu
 hūntung aihu sere ilan giyang ni muke tucikebi yalu giyang alin i
 julergi ci tucifi wasihūn eyefi liyoo dung ni julergi mederi de
 dosikabi, hūntung giyang, alin i amargi ci tucifi amasi eyefi, amargi
 mederi de dosikabi, aihu giyang, wesihun eyefi dergi mederi de
 dosikabi, ere ilan giyang de ferguvecuke sukdu borhofi tucike
 boobai tana genggiyen nicuhe, jalan de wesihulebuhebi alin i
 ninggui edun mangga, ba šahūrun saikan moo ferguvecuke okto,
 erin de acabume banjimbi, juwari erin oho manggi šurdeme alin i
 gurgu gemu genefi bimbi, ere alin i šun dekkere ergi bukūri
 gebungge alin i dade bulhūri gebungge omo bi ulame jihengge abkai

²⁴ 陳捷先，《滿文清實錄研究》，（臺北市：大化書局，民 67[1978]，初版），頁 53。

sargan jui enggulen jenggulen fekulen ilan nofi ebišeme jifi, muke ci tucifi etuku etuki serede fiyanggū sargan jui etukui dele enduri saksaha i sindaha fulgiyan tubihe be bahafi, na de sindaci hairame angga de ašufi etuku eture de ašuka tubihe bilha de šuwe dosifi gaitai andande beyede ofi hendume, mini beye kušun wesihun geneci ojorakū ohobi, adarame tutara sehe manggi, juwe eyun hendume musei beye enduri be dahame jobošoro ba akū, sinde abkai salgabun bifi gušun ohobi dere beye weihuken oho manggi jio seme hendufi genehe goidahakū fekulen haha jui banjiha, abkai fulinggai banjibuha jui ofi uthai gisurembi banin giru ferguwečuke ambakan oho manggi eme fulgiyan tubihe be nunggefi beyede oho turgun be getukeleme alafi hendume jui sini hala aisin gioro gebu bukūri yongšun simbe abka facuhūn gurun be dasame banjikini seme banjibuhabi si genefi dasame toktobume banji ere birai eyen be wasime genefi, ilinaha ba uthai inu sefi weihu bufi, eme uthai abka de wesike, tere jui weihu de tefi, eyen be dahame wasime genehei muke juwere dogon de isinafi dalin de akūnafi, burga be bukdafi suiha be sujame mulan arafi, mulan i dele tefi bisire de tere fonde tere ba i ilan hala i niyalma, gurun de ejen ojoro be temšendume, inenggidari becendume toktorakū bisire de emu niyalma muke ganame genefi sabufi ferguweme tuwafi, amasi jifi geren i baru alame suwe becendure be naka, musei muke ganara dogon de, dembei ferguwečuke fulingga banjiha emu haha jui jifi tehebi, gūnici abka ere niyalma be baibi banjibuhakūbi seme alaha manggi, geren niyalma gemu genefi tuwaci, yala ferguwečuke fulingga jui mujangga, gemu ferguweme fonjime enduringge jui si ainaha niyalma seme fonjiha manggi, jabume bi abkai sargan jui fekulen de banjihangge mini hala abka ci wasika aisin gioro gebu bukūri yongšun, abka minbe suweni facuhūn be toktobukini seme banjibuhabi sehe manggi, geren gemu ferguweme, abkai salgabuha

enduringge niyalma kai, erebe yafahan gamara jui waka seme, juwe niyalma gala be ishunde joolame jafafi galai dele tebufi boode gamafi, ilan hala i niyalma acafi hebdeme muse gurun de ejen ojoro be temšerengge nakaki, ere jui be tukiyefi musei gurun de ejen obufi beri gege be sargan buki seme gisurefi, uthai beri gebungge sargan jui be sargan bufi, gurun de beile obuha, bukūri yongšun šanggiyan alin i šun dekdere ergi omohoi gebungge bigan i odoli gebungge hecen de tefi, facuhūn be toktobufi, gurun i gebu be manju sehe tere manju gurun i da mafa inu. ²⁵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姓愛新覺羅氏，諱努爾哈齊。先世發祥於長白山。是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餘里。樹峻極之雄觀，草扶輿之靈氣。山之上，有潭曰闔門，周八十里，源深流廣。鴨綠、混同、愛滹，三江之水出焉。鴨綠江自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愛滹江東流，入東海，三江孕奇毓異。所產珠璣珍貝，為世寶重。其山風勁氣寒，奇木靈藥，應候挺生。每夏日，環山之獸，畢棲息其中。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天女三，曰恩古倫，次正古倫，次佛庫倫，浴於池。浴畢，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愛之，不忍置諸地，含口中。甫被衣，忽已入腹，遂有身。告二姊曰，吾身重，不能飛昇，柰何。二姊曰，吾等列仙籍，無他虞也，此天授爾娠，俟免身，來未晚。言已，別去。佛庫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愛新覺羅為姓，名布庫里雍順，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汝順流而往，即其地也。與小舠乘之，母遂凌空去。子乘舠順流下，至河步，登

²⁵ 孫建冰、宋黎黎，〈從滿文文獻看三仙女傳說的演變〉，《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2012年1期），頁94-95。滿文資料來自：遼寧省檔案館藏《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一。另開頭括弧內太祖滿文謚號為由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滿文《太祖高皇帝本紀》所補入。

岸。折柳枝及蒿為坐具，端坐其上。是時，其地有三姓爭為雄長，日構兵相仇殺，亂靡由定。有取水河步者，見而異之。歸語眾曰，汝等勿爭，吾取水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虛生此人。眾往觀之，皆以為異，因結所由來。答曰，我天女佛庫倫所生，姓愛新覺羅氏，名布庫里雍順，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亂者。眾驚曰，此天生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為昇，迎至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為國主，以女百里妻之。遂定議，妻以百里，奉為貝勒，其亂乃定。於是布庫里雍順，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國號曰滿洲，是為滿洲開基之始也。²⁶

經過校對，這兩個本子《太祖高皇帝本紀》、《太祖高皇帝實錄》的滿、漢文對照是完全合璧的，並沒有各說各話，或是翻譯不實的情形。此外這篇《本紀》既然是由《實錄》順序編出，所以《實錄》的文字長些，《本紀》的字數略少，也屬正常。

像是《實錄》描述長白山「先世發祥於長白山。是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餘里。樹峻極之雄觀，萃扶輿之靈氣。山之上，有潭曰闢門，周八十里，源深流廣。鴨綠、混同、愛滹，三江之水出焉。鴨綠江自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愛滹江東流，入東海，三江孕奇毓異。所產珠璣珍貝，為世寶重。其山風勁氣寒，奇木靈藥，應候挺生。每夏日，環山之獸，畢棲息其中。」文字有些冗長，甚至偏離主題。而在《本紀》，就只有「先世發祥於長白山，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里，鴨綠、混同、愛滹，三江出焉。有靈氣者，言其地將生聖人，統一諸國。」記述簡短精要，而且比較切題。

根據以往研究，清初開國神話可稱為〈三仙女〉傳說，是皇太極於天聰九年（1635）前後，借用藏族、殷商兩個始祖傳說，拼合而成的。其中藏族的始祖事蹟〈肩輿王〉為主幹，插入《史記》〈殷契〉故事為輔助，構成了動人的〈三仙女〉傳說。〈三仙女〉的故事大綱，可大致分為七段：（一）、三姓逐鹿、（二）、朱果降祥、（三）、授姓自天、

²⁶ 華文書局輯，《大清滿洲實錄，大清太祖高皇帝實錄》，（臺北市：華文：華聯書局，民53[1964]），卷一，頁1-3。

(四)、泛舟漂流、(五)、天降異人、(六)、肩輿擁立、(七)、亂邦稱雄等。其中僅第二段「朱果降祥」的情節，引自《史記》〈殷契〉，其餘六段，都來自〈肩輿王〉，整體看來，〈三仙女〉是一個純粹的舶來品。²⁷

不過〈三仙女〉的故事大綱，雖為外來，當中有些細節，卻是十足的滿洲文化。例如《本紀》所述「相傳有天女三，長恩固倫，次正固倫，季佛庫倫，浴於池。」這三位天女的名字：恩固倫、正固倫、佛庫倫等，就是滿文譯音。以往就有人注意到其排比押韻，有些講究，想了解其中涵意，但都無功而返。而據最新的研究顯示，名字其實是個滿文謎語，要看滿文才能理解原意。此外，布庫里雍順登岸後，折柳及野蒿當成椅子，端坐其上。這段文字裡的「柳及野蒿」在滿洲文化裡具有薩滿教的涵意，具有相當特色。以下就分項加以說明。

(一)、仙女釋名：

關於〈三仙女〉中仙女的名字，早年說法不多，大致上可分為三種。第一種說法認為，三仙女名字第一字「恩」、「正」、「佛」的含義，尚無定論：

從語源學的角度來看，「庫倫」一詞應來源於滿語的「慈鳥」〈Keru〉，也就是「大烏鵲」。至於三仙女名字的第一字「恩」、「正」、「佛」的含義，尚無定論。²⁸

第二種說法是講，「佛庫倫 fekulen」這個仙女的名字，可以解釋成滿文「舊國 fe gurun」，有「暗示滿族始祖誕生於此」的意味：

三古倫影射三個部族，概指元末明初分住在松花江中下游、牡丹江與綏芬河之間的女真人—胡里改、桃溫、鄂朵里三部。佛，是滿語 Fe 的音譯，是“舊”或“陳”之意。例如《八旗通志》將崇德以前編入旗籍的人稱“佛（舊）滿洲”，此後招服的錫伯、卦爾察、達呼爾、鄂倫春、鄂溫克及赫哲族人則

²⁷ 張華克，〈三仙女傳說探源〉，《中國邊政》，（臺北市：中國邊政雜誌社，民104[2015]12月，204期），頁120-121。

²⁸ 鄧琪瑛，〈滿族三仙女神話中所呈現的功能意義〉，《滿族文化》，（台北市：中華民國滿族協會，1998年12月，第24期），頁7。

稱之為“伊徹（新）滿洲”。佛古倫合譯意為“舊國”，它是古代地名，也是元末明初女真鄂朵里部主要集居之地，位在今吉林省敦化市附近，其方位正在長白山之東北。此處借用舊國地名暗示滿族始祖誕生於此，頗見巧思。²⁹

這個說法只能說明「佛庫倫 fekulen」可做「故國 fe gurun」解，卻對「恩古倫 enggulen」、「正古倫 jenggulen」，無法提出任何解釋，明顯的有所不足。

第三種說法的研究表示，大仙女「恩古倫 enggulen」的名字，具備「永久 enteheme」的語意，意為女子「永遠純正」：

恩古倫，滿文作 enggulen，實際上是由 enteheme gulu 演變而成的。enteheme 一詞，意為“永久”，綱常之“常”。gulu 一詞，意為“純正”。用米為人命名，共含意是“永遠純正”，表示恩古倫是一位恪守綱常，純正無邪的女子。從語音學上看，enteheme gulu 兩個詞合成一個詞 enggulen，語音發生了一些變化，有的音發生了音變，有的音脫落了。enteheme 一詞的 n 音變為 ng，這是逆同化，因為其後接的音是 gu，音節 te、he、me 均脫落了。gulu 一詞的音節 gu 保留了，直接接在音節 eng 之後，而音節 lu 變成了 len，增加了輔音 n，這是滿語人名的一種規律性現象，而後元音 u 變為前元音 e 亦是逆同化。³⁰

這個解法應用了太多的語音規則，有過度引申之嫌。不過最新的研究認為，三位仙女的名字，不過就是一則滿文謎語，並不複雜難懂。關鍵就在「古倫 gulen」這個發音及語意上面。了解這個線索，三位仙女的名字都可顯現出截然不同的涵意，並暗合滿洲文化。現列示如下：

²⁹ 宋承緒，〈滿族《三仙女神話》探微〉，《滿學研究》，（長春市：吉林文史，1998，第1版），第四輯，頁218。

³⁰ 司徒，〈清代三仙女傳說中人名和地名考釋〉，《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1987年第1期），頁104。

〈三仙女〉名字解謎表³¹

順序	名字	謎面	謎底	涵義	引申
一	恩古倫	enggulen	enen	子嗣	兒子
二	正古倫	jenggulen	jeje	父親	父親
三	佛庫倫	fekulen	fefe	女陰	母親

解謎的關鍵，簡單說來，跟所有仙女的人名上的「古倫 gulen」這個發音有關。「古倫 gulen」在滿語裡有「喋喋不休 gulung」的語意，³²因此可使人名上的第一音節，自然複製一次。於是大仙女「恩古倫 enggulen」，就變成滿文的「子嗣 enen」，代表著兒子。二仙女「正古倫 jenggulen」是滿語的「父親 jeje」。小仙女的「佛庫倫 fekulen」，是「女陰 fefe」，代表著母親。³³

因此，在設計謎語者的巧手安排下，故事中的三位仙女，其中長仙女恩固倫，次仙女正固倫，其實都是男人，只有小仙女佛庫倫，才是真正女性。

於是小仙女佛庫倫能因吞下神鵲所銜朱果受孕，就不是一個偶然事件了。這裡面暗指了女真人所崇拜的女性生殖神「佛多媽媽」的存在。所謂的「佛多媽媽」有如下寓意：

滿語“媽媽”是滿族對祖母或老年婦女的尊稱，“佛多”是滿語“祈福祭祀時豎的柳枝”，可以窺見這種帶有神秘色彩的宗教觀念中所蘊含著的社會功利價值觀。幾乎在滿族各姓氏的薩滿祭中普遍存在，甚至在清代宮廷上堂子中都有這種莊重的典禮。不過“佛多媽媽”正式的名稱——“佛裡佛爾鄂漠錫媽媽”。其含義有“柳、始母、子孫娘娘”3層意義。實際上，後兩層意義是滿族先民早期柳崇拜所包含的宗教觀念的繼承和

³¹ 羽田亨編，《滿和辭典》，（台北：學海，民 63[1974]，初版），「子嗣 enen」、「父親 jeje」、「女陰 fefe」，分別為頁 114、244、128。

³² 宋承緒，〈滿族《三仙女神話》探微〉，《滿學研究》，第四輯，（長春市：吉林文史，1998，第 1 版），頁 218-219。是「故國 fe gurun」，對於「恩古倫 enggulen」、「正古倫 jenggulen」，則無法提出解釋。

³³ 張華克，〈三仙女滿文謎語考辨〉，《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2013 年第 2 期），頁 30-34。

演化。而早期的柳崇拜就已經寓含著後兩層意義。原來滿語“佛多”（佛特、佛朵、佛托、佛都、佛裡、瓦利為滿語的方言）即為柳、或柳枝。所以，有的滿族群眾直呼“佛多媽媽”為“柳枝娘娘”。從語言學上看，“佛多”和滿語“佛佛”相近，前者是由後者演化而來，而“佛佛”，滿語是女子性器之意，即柳成了女子性器的象徵。在滿族的早期創世神話中，作為宇宙的主神——天神最初是沒有形體的，它像水一樣流溢，像雲一樣飄渺。後來，阿布卡赫赫（漢語：天母、天女）成了天神，她的初期形象即為一個巨大的孕生萬物的女陰，而柳葉就是女陰的象徵，由此派生了許多柳生人類和宇宙萬物的神話。這就是佛多媽媽的最古含義。³⁴

於是佛庫倫等於「佛多媽媽」，正是女真人所崇拜的女性生殖神。因為從名字上來看，小仙女佛庫倫連結著「孕生萬物的女陰」，從身分來看，小仙女佛庫倫本身就是天女，等同著天母「阿布卡赫赫」。所以其地位相當崇高，連帶著使得其子布庫里雍順的血統也得到加持，而貴不可言，成為值得女真人崇拜的對象。

（二）柳及野蒿

前面所提的「佛多媽媽」，具有「女陰」的寓意。而柳在女真人眼中，柳葉具有「女陰」的外形，同樣具備了種種繁殖意涵，所以有人認為這都是「古代女性生殖崇拜的遺存。」³⁵

於是到了布庫里雍順，把柳枝折下來拉彎，做成彎狀的像坐具樣，顯然，他是坐著柳具進入三姓地區而成為統治者的，更把對柳的敬崇具象化了。

談到拜柳，跟拜樹信仰是分不開的，在北方薩滿文化裡，這些信仰十分普遍。滿族薩滿認為樹就是神，高大的神樹象徵著通天的宇宙樹。³⁶例

³⁴ 吳來山，〈論滿族薩滿文化中柳崇拜的形成〉，《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大連市：遼寧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5月，第27卷第3期），頁122。

³⁵ 王宏剛，于國華著，《滿族薩滿教》，（臺北市：東大圖書，2002（民91），初版），頁88。

³⁶ 郭淑雲，王宏剛主編，《活著的薩滿中國薩滿教》，（瀋陽市遼寧人民，2001，第1版），頁54。

如赫哲族認為跳進柳圈則意味著進入神靈施展威力的保護圈內，一切邪魔都不敢侵犯。鄂倫春族認為柳條上的葉子，可以引導病人恢復健康：

薩滿眼中“樹是神”。東北常見的柳崇拜是薩滿祭祀活動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赫哲族薩滿跳神時，用柳樹條彎成一個半圓圈，像兒童跳繩似的跳上三次。隨後，在場的族人都各跳三次，並唱“鳩神歌”。按赫哲族的說法，跳進柳圈則意味著進入神靈施展威力的保護圈內，一切邪魔都不敢侵犯。達斡爾族薩滿每隔三年在三四月之間向“眾神”進行一場血祭，為族人們消災祈福。薩滿所祭的 12 個“杜瓦蘭神靈”，都是由選取的各類楊柳樹來代表。在薩滿教中，柳就是神靈的象徵。鄂倫春族的薩滿在舉行治病儀式時，會手持柳條，為病人誦念祈禱詞後，摘下柳條上的葉子，拋向前方，認為這樣會引導病人恢復健康。柳樹易栽易活好繁殖，所以薩滿認為“柳神”會賦予人以新的生命力。³⁷

因此敬柳，一方面是源自生殖崇拜，使滿族原始信仰中，將柳與創世女神相關聯。另一方面則將柳與人類的生命力相關聯，使人充滿活力。於是柳成為宇宙萬物的來源，柳與人類起源有著密切的關係。

拜柳信仰不僅存在於一般平民百姓之中，即使是皇室貴胄，也是不能免俗的。例如在紫禁城坤寧宮中，經常舉行「樹柳枝求福祭」。算是清代宮廷裡的薩滿祭禮。這種儀式一直保留到清代末年，歷時將近三百年。

該儀式舉行時，在行禮的前一天，會由司俎官二員，取高九尺，徑三寸的完整柳枝一株，用黃布包裹，運入坤寧宮。並在坤寧宮戶外廊下正中，安設樹柳枝石座，以利樹立柳枝。柳枝上會懸掛鏤錢淨紙條一張，三色戒綢等裝飾。儀式有時由皇帝、皇后親自行禮，過程略述如下：

遇有皇帝、皇后親諸行禮，入坤寧宮，立於南首，司祝擎神刀，待祝三次，每次禱祝，太監等歌“鄂囉囉”。禱畢，司祝左手擎神刀，右手持神箭走出戶外，對柳枝舉揚神箭，以練

³⁷ 王鐵峰編著，《黑龍江薩滿文化》，（哈爾濱市：黑龍江人民，2011，第 1 版），序言，頁 4。

麻拂拭柳枝，誦神歌。舉神箭，將練麻獻給皇帝，皇帝三持而懷之。太監鳴拍板，歌“鄂囉囉”，如此儀式進行三次，同時向皇帝、皇后獻棉索。皇帝、皇后叩頭。坐於西炕，舉酒灑於柳枝，並以桌上所供的糕夾於柳枝所有枝杈，最後享受福胙，禮畢還宮。³⁸

這個「樹柳枝求福祭」，是滿族薩滿祭祀中最有特色和相當重要的儀式。儀式基本上來自民間傳統，既保留了古俗，又加以系統整理，然後進入清宮，是坤寧宮中相當重要的例行祭祀典禮。行禮時，即使貴為天子，見了祭祀的柳枝，也要叩頭求福，可見柳樹地位的崇高了。

談完了柳樹，再說另一種植物野蒿。「蒿 suiha」，就是艾草，也稱艾蒿，³⁹為多年生草本，葉互生，羽狀深裂，表面是綠色，葉背則密生白色毛。

艾草有濃烈芬香氣味，可以食用。傳統上民眾在端午節時，會把艾草跟菖蒲綁成一串，懸掛於大門，相傳具備消災、辟邪、祈福、招財等功能。

在滿族薩滿文化中艾草不只避邪，還可以用在醫療方面。艾草的療法稱為艾灸，是滿洲薩滿常用的治療方法：

艾灸：艾灸法主要治風濕病。先令患者喝足水，脫掉內衣，蓋上被單，然後將放入瓦盆中的艾枝、艾葉點燃，用燃燒的艾枝燻烤患者的穴位、關節及患處，直至其風濕關節處發熱，汙水流，風寒拔除。輕者數攻即愈，重者經常堅持，扶杖而行者亦能行走如常。薩滿常用艾灸法，只不過有的用艾葉，有的用狼毒草、爬山松等草藥。⁴⁰

艾草既然有如此多方面的功能，如果滿洲始祖布庫里雍順拿來做凳子，無論在象徵意義或實際運用兩方面，都還是說得過去的。

³⁸ 王鐵峰編著，《黑龍江薩滿文化》，（哈爾濱市：黑龍江人民，2011，第1版），頁199。

³⁹ 學名：Artemisia argyi。

⁴⁰ 王宏剛，于國華著，《滿族薩滿教》，（臺北市：東大圖書，2002（民 91），初版），頁207-208。

不過細看《太祖高皇帝本紀》的滿文卻說，布庫里雍順卻是「支著艾草 *suiha be sujame*」做爲坐具。由於艾草是草本植物，十分柔弱，布庫里雍順體重即使再輕，也不大可能靠著艾草的「支撐力」坐穩。所以這個句子在語意方面，看來是有其值得斟酌的地方。

如果要求合理，推測本段原始的寫法，應當寫成「折柳支柳」，而非「折柳支蒿」。這麼一來，無論從漢文、滿文來看都很合適，也確實可以做出結實的凳子。

不過「折柳支柳」語意上雖完美，不過文句中卻顯示不出滿文的韻律感。因爲「柳 *burga*」以「步 *bu*」音開頭，而「支持 *sujame*」是以「蘇 *su*」音開頭，兩者的滿文頭韻不同。通常滿文習慣押頭韻，頭韻不同就是不押韻。

不過如果把「柳 *burga*」換成「蒿 *suiha*」，那麼「蒿 *suiha*」的頭韻押「蘇 *su*」韻，跟「支持 *sujame*」是以「蘇 *su*」音開頭，兩者是合轍押韻的。

因此爲了配合滿文「文學」上的音韻之美，「支著艾蒿 *suiha be sujame*」的句子就出現了。當然這種遷就滿族文化的「好滿文」，就得犧牲一點語意上的通達了。

同樣在漢文文學創作上，也可以看到類似問題的存在，文學原理可是跨文化的。在音韻學上稱某些爲了押韻而文意不通的句子爲「湊韻」。例如有人批評時下流行榜冠軍歌曲的歌詞，就普遍存在著「湊韻」問題，甚至運作過頭，寫出歌詞是「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沒有」，這種與原意相反的文句：

6.共你醉過痛過的最後/但我發覺想你不能沒有。末句意謂「不能不想你」。爲湊韻而說成「想你不能沒有」（後、有協韻），十分滑稽。近日登上流行榜冠軍歌曲的《燕尾蝶》有如下一句，同樣是湊韻累事：7.主宰愛情的是誰/奮不顧身的撲火/就算輪迴只爲襯托。8.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沒有。類似例 2。全段大意爲：「在我心中今生下可能沒有你，在我腦海裏今生不可能沒有你。」現在多加了個「不」字，否定之否定變爲肯定，豈非剛好與原意相反？可見，爲配音或押韻

而勉強湊詞，實不可取。⁴¹

「湊韻」既然有其不妥之處，那麼是不是可以修改或者乾脆不用呢？問題似乎並不如想像中單純。因為押韻的作品，還有些其他長處，不是想改就可以改的。例如滿族文學作品《尼山薩滿》故事中，就有許多類似案例，讓人看到押韻的一些長處：

押韻的文詞，除了有聲韻之美外，對於朗誦者，也有幫助記憶的功用。例如海參威、海拉爾版本都曾經出現巴爾杜巴顏稱讚尼山薩滿的一句話：「二十個薩滿不夠看，四十個薩滿也比不上」，除了文字對仗工整、通順以外，這裡二十、四十已經定型了，不可能換成四十、二十或是五十、一百，因為「orin、oilori、dehi、deleri」幾個字是押頭韻的，先是老陽韻 o，再用陰韻 e。頭韻固定，整句就已經定型。同樣類似的詞句如「納力費揚巫把二十擔水倒在尼山薩滿鼻子周圍，把四十桶水倒在臉的周圍」，其中「orin、oforo、dehi、dere」幾個字也是押頭韻的，也用上了老陽韻 o 與陰韻 e。所以即使海參威、海拉爾，兩地相距千里之遙，即使『尼山薩滿』傳唱多年，重點的地方卻還相當一致，這不能不歸功於韻腳的定詞功效了。⁴²

這是因為滿文「二十、四十」這類字詞，跟特定的文詞押韻，除了聲韻鏗鏘有力、撼動人心之外，對於朗誦者，也有幫助記憶的功用。人在記憶詩詞時，如果以整塊進行記憶，比零碎記憶更容易掌握，這就是押韻的詩歌容易記牢的原因。僅憑這些長處，就會讓想改詞的人，躊躇再三了。

因此小小的艾草，之所以會出現在布庫里雍順的柳凳上，除了具備神奇的避邪作用外，根本上是為了滿文文詞押韻作用而設的，即使含意上有些許瑕疵，也是必要之惡，這是理解滿文音韻所需要的認識。

⁴¹ 周錫馥著，《中文寫作新視野：從實用寫作到文學創作》，（香港：三聯書店出版；臺北縣新店市：聯合發行，2007[民 96]，第一版），頁 72-73。例句之中第 6.、第 8.句取自歌手張學友所唱《祇想一生跟你走》曲中歌詞。

⁴² 張華克譯，《尼山薩滿全傳》，（臺北市：映玉文化出版社，民 96（2007），初版），譯註說明，頁 09。

(三) 小結

以上就「仙女釋名」、「柳及野蒿」等二項與滿洲文化有密切關聯的部分，加以討論。這些部分到了乾隆四年（1739）《八旗通志·初集》上，就會有所改變，使〈三仙女〉故事的面貌有些不同，以下將逐步探討。

二、《八旗通志·初集》

《八旗通志·初集》一書是雍正五年（1727），由鄂爾泰等人奉雍正皇帝的旨意，開始編寫的一本通志。該書記述了努爾哈齊如何開創八旗制度等。歷經十二年的集體編修，於乾隆四年（1739），正式成書。書中〈三仙女〉傳說，是比《太祖高皇帝本紀》略晚的版本，其說法如下：

本朝先世發祥於長白山，是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餘里，樹峻極之雄觀，萃扶輿之靈氣。山之上有潭曰闔門，周八十里，源深流廣，鴨綠、混同、愛滹三江出焉。鴨綠江，自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愛滹江東流入東海。三江孕奇毓異，所產珠璣珍貝，為世寶重。其山風勁氣寒。奇木靈藥，應候挺生。山之東有布庫里山，下有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天女降池畔，吞朱果，生聖子。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乘舠至河步，其地有三姓，爭為雄長，日構兵，亂靡由定。有取水河步者，見而異之。歸語眾曰：「汝等勿爭，吾取水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虛生此人。」眾往觀之，皆以為異。因詰所由來。答曰：「我天女所生，姓愛新覺羅氏，名布庫里雍順。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亂者。」眾驚曰：「此天生聖人也！」遂昇至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為國主。」遂定議以女妻之，奉為貝勒。其亂乃定。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國號曰滿洲，是為本朝開基之始也。⁴³

這兩個版本，雖然外觀大體相似。但是細心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到後

⁴³ 鄂爾泰等纂修，《八旗通志·初集》，（長春市：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民74[1985]，第1版），卷一，頁1-2。

出的《八旗通志·初集》之中，三位仙女的名字已經全部消失無蹤了。顯然乾隆對這些人名，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加以刪除。而《八旗通志·初集》初出於乾隆四年（1739），編修的過程中，乾隆皇帝已然親政，參與裁示的可能性就相對較高了。

例如，《太祖高皇帝本紀》所記的是「相傳有天女三，長恩固倫，次正固倫，季佛庫倫，浴於池。」與早期完稿的諸書，記載相同。如：崇德元年（1636）成書的《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十五日告竣的崇德初纂《太祖太后實錄》、康熙二十一年（1682）九月完成重修工作的《太祖高皇帝實錄》等一系列的《太祖實錄》，都是這麼記錄的，內容相當一致。而後出的《八旗通志·初集》卻改成「相傳有天女降池畔」，似乎三個天女都是些無名氏，看起來就感到有些怪異了。

按理說祖先的開國神話，既然是古來傳說，具有相當的神聖性，後代應當是無權修改的。不過前面分析過，〈三仙女〉傳說，並非女真的傳統神話，而是皇太極於天聰九年（1635）前後，借用藏族〈肩輿王〉、殷商〈殷契〉兩個始祖傳說，拼合而成的舶來品。由於缺乏時間鍛鍊，缺陷不少。因此，不只乾隆朝加以修纂，前面多爾袞、順治、康熙、雍正等都有增刪的記錄，⁴⁴「神聖性」早就蕩然無存了。修改是基於實際需要，是皇帝主觀認定非改不可的，與神聖或不神聖，完全無關。

推測修改〈三仙女〉的理由，或許就主要出在謎語上面。以往編纂清太祖實錄的眾多清朝皇帝，似乎都無暇注意到〈三仙女〉始祖傳說裡還暗藏著謎語，因而對其放心引用。

不過到了乾隆皇帝，極可能在親自編審《八旗通志·初集》時，終於看出了名字就是個謎題，佛庫倫（fekulen）暗含女陰（fefe）的意思，覺得十分不雅，才會開始下手，將之刪除。這種考慮，其實早在天聰年間，莽古爾泰口出粗話事件中，就已經有前例可循了。女真人早年多生活於關外，風俗文化與關內漢人有極大的差異。但是以生殖器當作粗話的想法，卻是與大多數漢人相同。

像天聰五年八月十三日，汗王皇太極與莽古爾泰貝勒在軍營中吵架，

⁴⁴ 張華克，〈三仙女傳說探源〉，《中國邊政》，（臺北市：中國邊政雜誌社，民104[2015]12月，204期），頁128-134。

德格類台吉居間勸架。莽古爾泰口出粗話「爹個屌 amai coco」，甚至要拔刀與皇太極拼鬥：

ini emueme de banjiha deo degelei taiji, sini arbušara mudan
wakakai seme šukilara jakade, eteretele genehe, rede belle jili
banjifi amai coco si mimbe ainu šukilambi seme loho be homhon ci
emu to isime tucibuhe, ini deo degelei ahūn be anatame unggihē,⁴⁵

譯文：時其同母弟德格類台吉言：「爾造次非也！」乃奮力頂去。貝勒大怒曰：「爹個屌，爾爲何頂我耶！」拔刀出鞘一扎許。其弟德格類將兄一路推出。

《十二朝東華錄》爲了避免文義粗俗，把滿文原文「爹個屌 amaicoco」解釋爲「蠢物」，日本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的《滿文老檔》，則翻譯成「畜生」，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翻譯的《滿文老檔》譯的是「爹個鳥」。⁴⁶

而正式的官書《清太宗實錄》，則直接避開這個尷尬的議題，略而不提「爹個屌」，只翻譯成「爾何爲毆我？」了：

其同母弟貝勒德格類曰：「爾舉動大悖，誰能容汝？」拳
毆之。莽古爾泰怒詈之曰：「爾何爲毆我？」手出佩刀五寸
許。德格類推之出。⁴⁷

由此可知，一般譯文固然可以直接譯出的粗俗文字，而在正式官書中，則是能避免則避免的。

深入一點看，避諱這種概念，在以往君主專制時代，稱爲「敬避」。就是經常是爲了維護等級制度的尊嚴，說話寫文章時遇到帝王或尊親的名字都不敢直接說出或寫出來的慣例。例如清聖祖名爲玄燁，爲了「敬避聖

⁴⁵ 國立故宮博物院，《舊滿洲檔》，（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民 58[1969]），冊七，頁 3503。

⁴⁶ 張華克，〈莽古爾泰謀反案探討〉，《中國邊政》，（臺北市：中國邊政雜誌社，民 98[2009]9 月，179 期），頁 36。

⁴⁷ 華文書局輯，《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臺北市：華文：華聯書局，民 53[1964]），卷 9，頁 29。

諱」，康熙朝當時就把北京城裡著名的玄武門改為「神武門」了。⁴⁸

清朝皇室人名，原本沿襲滿洲族人舊俗，倒是沒有什麼特別顧忌。人名多係譯音，如需避諱，只要更換漢字即可，無須整個刪除。例如「多爾袞」在擔任攝政王之前的漢字音譯成「多躲」，後來覺得不雅，就有所改變：

清朝皇室人名，原本沿襲滿洲族人舊俗，沒有什麼講求，下像漢人那樣有文化、談輩份、重偏旁，所以我們看到早期皇室人名還是從滿文名字翻譯成漢音字而成的。例如多爾袞這位名重一時的攝政王，他的滿洲原名叫 Dorgon，意思是「獾」，是一種像野豬的動物。在清人入關之前，他的名字曾被音譯成漢字「多躲」的，後來覺得不雅，而他的地位又變得崇高了，漢人大臣就改用了「多爾袞」三字，可謂切合堂皇。⁴⁹

因此乾隆皇帝對「佛庫倫」的刪除，很可能超過了可修改的極限。以「女陰 fefe」這種詞彙來說，其不雅似乎已經不是改改漢字音譯就能解決問題的了。其狀況當與莽古爾泰的「爹個屌 amaicoco」是同一等級的，以致無法繼續讓其名留史冊。

此外，避免抄襲或許也在考慮之列。為避免〈三仙女〉有抄襲〈殷契〉之嫌，在「相傳有天女降池畔」文句中，已經看不到「三」天女的字樣了。乾隆這麼修改「三」字，反而透露出了心中的顧忌，或許這也是當年修改時所始料未及的。

再談修改的第二項，是將原本的「折柳枝及蒿為坐具」，整個省略。柳樹及艾草，前面分析過，柳葉因具有「女陰」的外形，就具備了種種繁殖意涵，而「佛多媽媽」就是「柳枝娘娘」，還是由「女陰」（滿語佛佛）演化而來，無不具有「古代女性生殖崇拜的遺存」，所以無法容忍。

至於艾草，由於是「湊韻」而生，跟柳樹有了音韻上的連結，也列入「不雅」的行列。艾草雖屬「誅連九族」，有些無辜，但事實上是一併刪除了。

⁴⁸ 陳捷先著，《雍正寫真》，（臺北市：遠流，2001[民 90]，初版），頁 115。

⁴⁹ 陳捷先著，《雍正寫真》，（臺北市：遠流，2001[民 90]，初版），頁 114。

修改的第三項，是運送朱果的「神鵠」。至於神鵠也會被刪掉，實在令人意外。因為朱果是由神鵠銜來，「有神鵠銜朱果 enduri saksaha fulgiyan tubihe be saifi」，是《太祖高皇帝本紀》滿文、漢文都清楚記載了的，源出於〈殷契〉中有「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的故事。⁵⁰

以往有學者認為，殷商與滿族始祖神話是同源的。⁵¹因此刪掉「神鵠」，是不是想避免「抄襲」的譏諷，也是值得考慮的一點。

滿文的「神鵠」，是與漢文「玄鳥」對等的飛禽。要追根究柢，就要追究「玄鳥」到底是什麼鳥。滿漢之間，對這種鳥其實有著不同的觀點。

滿文〈三仙女〉傳說中將「玄鳥」稱為「神鵠 enduri saksaha」，意思是「喜鵠 saksaha」。有人會以為神鵠是烏鵲，其實二者滿文不同，「烏鵲 gaha」通體黑色，象徵晦暗，而喜鵠身有黑白二色，代表吉祥，含意明顯不同。⁵²滿人是敬重神鵠的，應該不至於成為禁忌。

不過歷史學家郭沫若卻認為，玄鳥不是喜鵠之類的凡鳥，更不是許多人所說的燕子，而是神話中的鳳凰。他進一步引申說：「但無論是鳳或燕子，我相信這傳說是生殖器的象徵，鳥直到現在都是生殖器的別名，卵是睪丸的別名。」

這分明說的是簡狄的故事，“鳳凰受貽”便是“玄鳥致貽”，可見玄鳥就是鳳凰。玄是神玄之意，不當解成黑色。

“五彩之鳥”大約就是卜辭中的鳳。晚期的卜辭有祭鳳的紀錄，稱鳳為“帝使”。 “于帝史(使)鳳，二犬。”(《卜》三九八) “甲戌貞其寧鳳，三羊三犬三豕。”(《簠室殷契徵文》典禮一六)大約是鳳或“五彩之鳥”在傳說的演進中化為了玄鳥或燕子的。但無論是鳳或燕子，我相信這傳說是生殖器的象徵，鳥

⁵⁰ 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影印史記》，(臺北市:啓明書局,民55[1966],再版)，卷三，頁28。

⁵¹ 苑利，〈殷商與滿族始祖神話同源考〉，《民族文學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主辦，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年 第04期)，頁34-40。

⁵² 宋承緒，〈滿族《三仙女神話》探微〉，《滿學研究》，第四輯，(長春市：吉林文史，1998，第1版)，頁220。

直到現在都是生殖器的別名，卵是睾丸的別名。⁵³

這也是值得考慮的重點。大概乾隆也有與郭沫若同樣的觀念，認為「鳥直到現在都是生殖器的別名」，於是就將「神鵠」刪掉了。這麼一來，看似與生殖崇拜無關的神鵠，又跟這種古老信仰扯上關連了。

所幸的是，「朱果」仍然留著，這點或與東北盛產人蔘有關。因為人蔘號稱百草之王，是一種名貴的藥材，而其果實鮮紅，與「朱果」相似。或許愛屋及烏，讓朱果的解釋縮限在植物範圍內，而不往「卵」的方向思考。於是朱果不算是「睾丸」，沒有生殖器象徵，所以僥倖不致於被刪掉。

第四個被刪的地方是《太祖高皇帝本紀》的「乃交手昇之歸」改成了「遂昇至家」。這個改變跟生殖禁忌無關，而與藏族〈肩輿王〉贊普始祖傳說有關。據《藏族歷史》一書上記載，早在西元前 350 年前，藏族地區小邦林立，戰爭不斷，有一天聶赤贊普出現了，人們認為他是從天而降的天神之子，就以「肩膀為座」，把他擡回住處，尊他為王，開始了第一代的贊普。這段故事與滿洲〈三仙女〉傳說「乃交手昇之歸」最相似的部分就是以下這一部分：

牧民們看見後，問他從哪裡來，他用手指指天空。人們見他膀大腰圓身材魁偉，又不言不語，便以為是從天而降的天神之子，便以肩膀為座，把他擡回住處，尊他為王，稱為“聶赤贊普”——意為“肩輿王”。⁵⁴

這與滿族始祖布庫里雍順被三姓居民「乃交手昇之歸」，就是以手轎抬回住處的情形，幾乎如出一轍。是不是乾隆感到抄襲的太神似了，有些不好意思，而就此刪改了呢？不管理由如何，從「很像」改得變成「很不像」是事實，不過這麼一來，反而給人欲蓋彌彰的感覺。

第五個被刪的地方是原有的弓箭，可能又是生殖崇拜，於是刪除。《太祖高皇帝本紀》上的「三姓遂以女百里妻之」，在《八旗通志·初

⁵³ 郭沫若著，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歷史編》，（北京市：人民，1984，第 1 版），頁 328-329。

⁵⁴ 蘇發祥著，《藏族歷史》，（成都市：巴蜀書社，2003，第 1 版），頁 25-26。所謂「聶赤贊普」是藏語，聶赤意為「肩輿」，贊普意為藏王。

集》一書中變成了「遂定議以女妻之」，女子的名字「百里」一詞不見了。

在滿語之中，「百里」有「弓 beri」的意思。⁵⁵在巫術信仰、生殖崇拜的含義中，有時弓代表「女陰」，而箭代表「男根」，這點在北方岩畫中尤其明顯：

原始人早期的雕刻都以女神為主，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女神像，是五千年前的紅山人塑造的神像。法國、奧地利等歐洲國家也出土了許多女神雕像。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大部分女神像體態豐腴、大腹突出，女性特徵十分明顯。因此很多專家認為女神像與原始人類的生殖崇拜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繫。戶曉輝先生曾經說道：“繪畫在陶器上的紋飾和刻畫在石壁上的岩畫，都不是出於一種審美的閑情逸致，而是一種巫術信仰，他們畫出動物的生殖力，並且借助這種刻繪來控制這些力。”顯然，原始人類就是通過在某一物體上刻畫出較為具象的圖形來進行巫術活動，祈求生殖繁盛。在北方地區岩畫中除了人面岩畫外，還有較多的突出男女性特徵的具象圖形。岩畫學家陳兆復先生認為弓箭在岩畫中具有雙層寓意。一種是狩獵和作戰工具，另一種是即是生殖崇拜的象徵。岩畫中出現的弓箭有時代表男根與女陰，搭弓箭意味著男女交合，具有生殖崇拜的含義。⁵⁶

北方岩畫是許多北方民族的早期藝術作品，其中巫術的概念，早已形成薩滿信仰的主軸及根源，且一直延續下來。故而即使是一副普通的「弓箭」，在具有薩滿信仰者的眼中，就「意味著男女交合，具有生殖崇拜的含義。」或許就是如此，而讓「百里」這個普通的女性的名字犯忌，就此從文章裡消失了。

《八旗通志·初集》一書是乾隆初試鶯啼，大開大闔的淨化〈三仙女〉傳說，總共有五處乾隆認為不妥的文句刪除了，即一、天女三名字：

⁵⁵ 羽田亨編，《滿和辭典》，（台北：學海，民 63[1974]，初版），頁 40。

⁵⁶ 山丹，〈中國北方地區人面岩畫初探〉，《民族藝林》，（銀川市：寧夏回族自治區文化廳，2015 年 04 期），頁 88。

長恩固倫，次正固倫，季佛庫倫。二、柳枝及蒿。三、神鵲。四、肩輿。五、百里（弓 beri）。

分析其中跟避免抄襲之譏的地方有三，即三個天女、神鵲與肩輿等。也有避免生殖崇拜的物件有四，即天女名字、柳枝及蒿、神鵲、百里等。

（三）《滿洲實錄》

乾隆四十四年（1779），《滿洲實錄》成書。不過《滿洲實錄》的成書日期，不能單純的認定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因其原本出現於天聰九年（1635），重修時又保存了原始史實及文句，這種特點，是相當值得注意的。

《滿洲實錄》的原本，出自《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加上乾隆對滿洲檔案有著「稽古右文」的保存心態，⁵⁷只修改錯字。因此《滿洲實錄》與《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極為相似，就史料價值言，可能還更勝一籌。現摘出《滿洲實錄》原文，以便參考：

滿洲原起於長白山之東北布庫哩山下一泊，名布勒瑚里。
 初，天降三仙女浴於泊，長名恩古倫，次名正古倫，三名佛庫倫。浴畢上岸，有神鵲銜一朱果置佛庫倫衣上，色甚鮮妍，佛庫倫愛之不忍釋手，遂銜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覺腹重，不能同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藥，諒無死理，此乃天意，俟爾身輕上昇未晚。」遂別去。佛庫倫後生一男，生而能言，倏爾長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實令汝以定亂國，可往彼處。」將所生緣由一一詳說，乃與一舟：「順水去即其地也。」言訖，忽不見。其子乘舟順流而下，至於人居之處登岸，折柳條為坐具，似椅形，獨踞其上。彼時長白山東南鄂謨輝【地名】鄂多理【城名】內，有三姓爭為雄長，終日互相殺傷，適一人來取水，見其子舉止奇異，相貌非常，回至爭鬥之處，告眾曰：「汝等無爭，我於取水處遇一奇男子，非凡人也。想天不虛生此人，盍往觀之？」三姓人聞言罷戰，同眾往觀。及見，果非常人，異

⁵⁷ 陳捷先，《滿文清實錄研究》，（台北市：大化，民 67[1978]，初版），頁 62。

而詰之，答曰：「我乃天女佛庫倫所生，姓愛新【漢語金也】覺羅【姓也】，名布庫哩雍順，天降我定汝等之亂。」因將母所囑之言詳告之，眾皆驚異曰：「此人不可使之徒行。」遂相插手為輿，擁捧而回。三姓人息爭，共奉布庫哩雍順為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國定號滿洲，乃其始祖也【南朝誤名建州】⁵⁸

如果拿《滿洲實錄》內容跟《八旗通志·初集》比較，會有時光倒流的感覺。因為前述五個被刪的地方，如人名兩處、柳樹、神鵲、肩輿等，都回復原樣了。其實這只不過是一種錯覺，《滿洲實錄》相當古老，出品在《八旗通志·初集》之前百餘年，因此乾隆並未出爾反爾，而是「稽古右文」。

四、《皇清開國方略》

乾隆五十一年（1786）《皇清開國方略》成書。〈三仙女〉傳說在此是以詩歌的形式表達，括弧（【】）內為說明的小字，括弧外是詩歌的主體，其內容如下：

【開國方畧凡三十二卷，以發祥世紀為卷首】白山五嶽靈攸仰【長白山高二百餘里，緜亘千餘里，為扶輿靈氣所鐘。其南麓一幹分二支，西支入興京門為開運山，南至旅順口，而龍脊時伏時見，於海中陸起行八百餘里，結為泰山為五嶽首。見《康熙幾暇格物編》，臣阿桂】黑水三江澤孔長【鴨綠、混同、愛滹三江，皆出長白山。鴨綠自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自山北流入北海，愛滹東流入東海。】源自閨門潭以下【長白山上有閨門潭，周八十里，為三江之源。】池聞布庫哩之旁【山之東，有布庫哩。下有池，曰布勒瑚哩，天女所浴之地。】果吞神女嫁歌武【相傳有天女，曰佛庫倫。浴於池。有神鵲銜朱果置衣，天女含口中，忽入腹，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故，遂凌空去。臣嵇璜】柳坐天男禹舍杭【天男乘小舠，順流至河步。登岸，折柳為坐

⁵⁸ 華文書局，《滿洲實錄》，（台北市：華文，民 53[1964]，與《大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合輯），頁 2-6。

具。其地三姓爭雄長，有取水者，見而異之。歸以語人。眾往觀，皆以為異，詰所由來。曰：我天女所生天男，以定汝等之亂。遂交手為昇，迎歸。】貝勒眾尊辰北面【三姓議尊為貝勒，其亂乃定。遂居俄朶里城，是為開基之始。】⁵⁹

這部作品的開國神話，較《八旗通志·初集》一書的內容，有所增添。首先是小仙女佛庫倫的名字又回來了。但還是避免天女三人的字樣，而省略了恩固倫、正固倫的名字。其他如柳枝、神鵲、肩輿等，也大都歸位。只有「百里」，那個以弓代表「女陰」的生殖崇拜符碼，依舊刪除。

五、《清朝通志》

乾隆五十二年（1787），《清朝通志》完成。《清朝通志》全書 126 卷，是歷代十通之一。原名為《欽定皇朝通志》，由嵇璜、劉墉等奉敕所撰。其〈三仙女〉傳說的內容為：

國姓，愛新覺羅氏。我朝先世發祥於長白山山之東，有布庫哩山，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有天女三，浴於池。浴畢，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取而吞之，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之故，命曰：汝以愛新覺羅為姓，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汝順流往，即其地也。與小舠，乘之，母凌空去。子乘舠順流至河步，登岸，端坐其上。時有三姓爭雄長，日構兵讎殺。有取水河步者，見而異之。歸語眾，眾走視，問所自。語姓名，如母命。且曰：我天女所生，定汝等之亂者。眾驚曰：此天生聖人也，乃交手昇之歸。三姓遂之女妻之，奉為國主，其亂遂定。於是，居長白山東鄂多理城，國號滿洲。⁶⁰

《清朝通志》的〈三仙女〉，較《八旗通志·初集》一書的內容，又有所增減。《清朝通志》回復了「有天女三」的傳統內涵，卻又不像《皇

⁵⁹ (清)阿桂，梁國治等奉敕撰，《皇清開國方略》，(臺北市：臺灣商務，民72[1983]-，初版)，卷首，頁4-5。

⁶⁰ (清)嵇璜等奉敕撰，《清朝通志 一百二十六卷》，(臺北市：新興書局，民48[1959])，卷一，氏族略一，頁6759。

清開國方略》一般，寫出小仙女佛庫倫的名字，因此短短一年間，三仙女又成了無名氏。比較《八旗通志·初集》，《清朝通志》書中回復了神鵠、肩輿等項目，依然省略了柳枝、「百里」等物件，可說各有取捨。

六、《滿洲源流考》

乾隆五十四年（1789）《滿洲源流考》成書。該書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內閣阿桂、于敏中、和珅、董誥等人奉詔編撰的歷史書籍。至五十四年（1789）正月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陸費墀完成校對，正式上呈。較諸《清朝通志》的完稿日期，晚了兩年。其〈三仙女〉故事如下：

恭考發祥世紀，長白山之東，有布庫哩山，其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三天女浴於池，有神鵠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天女告以吞朱果之故，因錫之姓，曰愛新覺羅，名之，曰布庫哩雍順。與之小舠，且曰：「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天女遂凌空去。於是乘舠順流至河步，折柳枝及野蒿為坐具，端坐以待。時長白山東南鄂謨輝之地有三姓，爭為雄長，日構兵相仇殺。適一人取水河步，歸語衆曰：「汝等勿爭，吾取水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不虛生此人。」衆皆趨問，答曰：「我天女所生，以定汝等之亂者」，且告以姓名。衆曰：「此天生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為舁，迎至家。三姓者議推為主，遂妻以女，奉為貝勒。居長白山東鄂多理城，建號滿洲，是為國家開基之始。⁶¹

《滿洲源流考》回復了「三天女浴於池」的傳統內涵。較《八旗通志·初集》一書添回神鵠、柳枝及野蒿、肩輿等項目，依然省略了佛庫倫、「百里」等重要的人名。

⁶¹ (清)于敏中撰，《欽定滿洲源流考二十卷》，(北京：中國書店，2000，第1版)，卷一、部族，頁一。

參、討論

以上介紹了一系列乾隆修改清初開國神話的詳細過程。從其運作的手法上觀察，乾隆朝六部官書的處理方式，明顯可大致分為兩類。即《實錄》類《史書》類等兩種。《實錄》類的如：一、乾隆元年（1736）《太祖高皇帝本紀》、三、乾隆四十四年（1779）《滿洲實錄》等兩部官書，乾隆都基於對滿洲檔案有著「稽古右文」的保存心態，就是只修改錯字，而並不調整內容。

另類的《史書》類的如：二、乾隆四年（1739）《八旗通志·初集》、四、乾隆五十一年（1786）《皇清開國方略》五、乾隆五十二年（1787）《清朝通志》六、乾隆五十四年（1789）《滿洲源流考》等，則是乾隆揮舞硃筆，大肆刪修。其中尤以乾隆四年（1739）的《八旗通志·初集》，改動最為過火，幾乎面目全非，判若兩人。推測其原因有二，一是避免抄襲〈殷契〉、〈肩輿王〉之譏。二是想淨化與生殖禁忌相關字樣。

乾隆大舉刪修《史書》中的清初開國神話，似乎又印證了以往學者對乾隆的惡評。即雍正、乾隆是「摧毀清代史學發展」的主犯與從犯，而且乾隆所編通史《御批通鑑輯覽》，可以看到「全書批論用弘曆意見的實際上達十分之八」，同樣窒息了史學的發展：

清高宗弘曆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編成了一部編年的通史，名為《御批通鑑輯覽》。自序說：「盡去歷朝臣各私其君之習而歸之於正…凡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繫屬、存亡，必公必平，惟嚴惟謹…所以教萬世之為君者，即所以教萬世為臣者也。書中批論，一依皇祖之例。自述所見，據事以直書者十之三，儒臣礙批者十之七，而經筆削塗之者七之五，用其語弗點竄者七之二。」可見全書批論用弘曆意見的實際上達十分之八。《四庫提要》說：「親灑丹毫，詳加評斷。微言大義，燦若日星。凡特筆昭垂…即涑水、紫陽亦莫能仰鑽於萬一。」乾隆四十年（1775）五月為了改編《明紀綱目》，降旨說：「《通鑑輯覽》一書，其中體例書法皆朕親加折衷，一本大公至正，可為法則，此次改編《綱目》，自當仿照辦理。」玄燁批了《通

鑑綱目》，而沒自己誇耀吹噓，經他孫子弘曆這一發揚光大，為治史學的人立下了規範，終於窒息了史學的發展。玄燁的兒子清世宗胤禩是真正摧毀清代史學發展的主犯。他孫子清高宗弘曆推廣玄燁的作法，撰寫史書成為帝王專業的一部分，雖不摧殘史學而控制領導史學，真正史學家只好去作考據了。⁶²

清末民初思想家梁啟超在《新民說·論私德》一書中更說，乾隆搞出《四庫提要》，《（御批）通鑑輯覽》等書，就是排斥道學，貶絕節義：

下逮本朝，順康間首開博學鴻詞以繫遺逸，乃為貳臣傳以辱之！晚明士氣，斲喪漸盡。及夫雍乾，主權者以悍鷙陰險之奇才，行操縱馴擾之妙術，摭拾文字小故以興冤獄，廷辱大臣者宿以蔑廉恥（乾隆六十年中，大學士尚詩供奉諸大員，無一人不曾遭黜辱者）。又大為《四庫提要》，《通鑑輯覽》等書，排斥道學，貶絕節義。自魏武以後，未有敢明目張膽，變亂黑白，如斯其甚者也。然彼猶直師商韓六蟲之教，而人人皆得喻其非。此乃陰託儒術芻狗之言，而一代從而迷其信。嗚呼一可意百鍊鋼，化為繞指柔？百餘年前所播之惡果，今正榮茲稔熟，而我民族方刈之，其穢德之寔千古而絕五洲，豈偶然哉！

豈偶然哉！⁶³

不過這類批評，目標放在《四庫提要》，《（御批）通鑑輯覽》等書。這類作品，經常是由皇帝與朝臣的合著，很難將「排斥道學，貶絕節義」的罵名完全歸諸皇帝。尤其是國史館、翰林院、軍機處的大臣如鄂爾泰、阿桂、梁國治、嵇璜、劉墉、于敏中、和珅、董誥等，其中不乏博聞強記、學識淵博者，多少都有參與，不能全由皇帝單獨承擔。

然而對於清初開國神話的刪改，卻是一般重臣的禁區。以乾隆對雍正虐殺兄弟的「改名案」處置為例，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都懾於皇家威儀，對翻案畏如寒蟬，四十三年不敢褒貶一詞。就可以理解，清初開國神

⁶² 牟潤孫著，《海遺雜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0），頁73-74。

⁶³ 梁啟超著，《論私德》，《新民說》，（臺北市：文景，民100[2011]年），頁162。梁啟超開頭時所謂「本朝」，指的是清朝，《新民說》寫於清光緒二十八（1902）年間。

話的內容，絕對只有皇帝才能動筆增減。因此乾隆朝六則清初開國神話的演變，剛好讓人檢視乾隆個人對「道學、節義」的修爲如何。

乾隆元年（1736）的《太祖高皇帝本紀》，皇帝尚未親政，因此這段守孝期間，該書〈三仙女〉傳說的修纂成果，算是前朝雍正、康熙帶頭所爲，與乾隆關係不大。

然而到了《八旗通志·初集》一書修成，時間是乾隆四年（1739），乾隆已然親政。他對書中的〈三仙女〉故事，下手甚重。幾乎所有涉及抄襲與猥亵的部分，都被認爲不妥而遭刪除。於是天女三名字：恩固倫、正固倫、佛庫倫（女陰 *fefe*）、柳枝及蒿、神鵲、肩輿、百里（弓 *beri*）等部分，都無影無蹤。也讓傳說中的滿、漢、藏等文化特色，消失殆盡。

觀察這段期間的乾隆，由於初試鶯啼，道德感強烈，而且其中主要是以漢人的傳統道學觀念爲基準。於是〈三仙女〉故事中，抄襲的要刪、猥亵的要刪，使得《八旗通志·初集》一書中的〈三仙女〉傳說，幾乎體無完膚。

然而到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皇清開國方略》，乾隆曾經在《八旗通志·初集》一書中刪除的部分，如：佛庫倫、柳枝、神鵲、肩輿等，又大都歸還原位。

到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清朝通志》，乾隆又恢復了曾經在《八旗通志·初集》一書中刪除的部分，如：有天女三、神鵲、肩輿等項目。

時值乾隆五十四年（1789），《滿洲源流考》成書。該書回復了曾經在《八旗通志·初集》一書中刪除的部分，如：三天女浴於池、神鵲、柳枝及野蒿、肩輿等項目。

從乾隆五十一年（1786）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年間，有三部書如：《皇清開國方略》、《清朝通志》、《滿洲源流考》等，都大部分恢復了曾經在《八旗通志·初集》一書中刪除的部分，這種歷程，高底起伏，似乎不能僅以乾隆「排斥道學，貶絕節義」，而一語帶過。

若以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觀察，所謂的抄襲、猥亵，經常與傳播、崇拜，脫不了關係。

先說傳播，例如文明的傳佈和影響，是從主要的文明中心散播出來的

影響，創造出無數的次要中心：

在世界上許多地區研究的人類學者——無論在遙遠的阿富汗或印度鄉下或中南半島或菲律賓信回教的民答那峨——都發現他們所處的社區，並非沒有歷史，文化上也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獨立發展的新石器時代的探險者。這些民族以具有古老歷史的當地方式，信奉某些意識型態和宗教，而這些意識型態和宗教是在幾千哩外由別的完全不同文化的異民族首先造就出來的。尤其當人類學者研究的社區，屬於一個更大的具有歷史、哲學、宗教思想等文獻源流的社會時，就會觸到「大傳統」和「小傳統」的問題。⁶⁴

由於小傳統是被包含在大傳統之中，因此當大傳統具備某些特別的意識型態和宗教時，小傳統會很自然的因傳佈而接納採用，而非自行獨立發展。對於滿人的〈三仙女〉故事，也不妨以同理視之。

滿人的〈三仙女〉可算是小傳統，而漢藏文化的大傳統，具備如〈殷契〉、〈肩輿王〉等始祖神話，小傳統很容易在吸收大傳統之後，構成〈三仙女〉故事的主幹。這不過就是一種文明的傳佈和影響，實不必以抄襲視之。

再說猥亵。許多民族都有生殖崇拜隱喻，中華各民族的神話傳說中，都可以找到有關諸如「人類誕生」、「洪水神話」的內容，構成了生殖崇拜文化的主要內核，若全以道學的角度，稱之為猥亵，也有些過分：

在中華各民族的神話傳說中，表現人類誕生內容的，一直佔有較大的比重。我們甚至可以說，在中華每一個民族的神話傳說中，都可以找到有關人類誕生的內容。其中，又以漢民族“女媧造人”的神話傳說最具代表性。此外，壯族《姆六甲造人》，彝族《阿細的先基》，蒙古族《人類之起源》、《天神造人》，藏族《始祖神話》、《靈猴繁衍之人種》等等，也都具有體現人類誕生的文化因數。此外，在中華民族的神話傳說

⁶⁴ 基辛(R. Keesing)著；張恭啓,于嘉雲譯，《人類學緒論》，（台北市：巨流，民78[1989]，一版），頁179。

中，還有不少反映人類生命在誕生之後由於種種原因面臨滅絕，最後又獲得再生的情節。在南方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長期流傳於各民族中的“洪水神話”，如壯族《卜伯的故事》、苗族《洪水滔天歌》、瑤族《伏羲兄妹的故事》、彝族《阿霧剎、洪水和人的祖先》等。如果說對於人類生命的誕生，由於缺乏必要的瞭解，因而人們不得不通過神話與傳說來予以反映，那麼，人們對於生殖的祈盼，則在生命的長成與婚戀、懷孕與生育、死亡與再生等生命禮儀中，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體現。在上述中華各民族的人生禮俗中，我們都不難尋找到人們對於生殖即生命繁衍的深切渴望。總而言之，對於生命繁衍的渴望，構成了生殖崇拜文化的主要內核。⁶⁵

以上具有生殖崇拜文化傳說的，案例中包含漢族、蒙古族、藏族、壯族、苗族、瑤族、彝族等，涵蓋中華許多民族。大傳統既然如此，也不必苛求小傳統的滿族單獨例外了。

因此到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皇清開國方略》開始，乾隆的刪修〈三仙女〉活動，忽然停止。繼起的《清朝通志》、《滿洲源流考》等書，也不再以清初開國神話的生殖崇拜隱喻列為禁忌，而採取淨化手段。

這種轉折，應當可看做乾隆經歷半世紀執政歷練，不只能理解各民族通性，也蘊涵出更為深厚的文化素養。以致在取捨之間，即不再如乾隆四年（1739）修訂《八旗通志·初集》時，那麼獨厚偏執的道學與節義了。

也就是說，年輕時的乾隆，在情、理、法三種治理概念上，選擇的是「法治主義」，因此會對於清初開國〈三仙女〉神話，採取了淨化策略。而年老時的乾隆，「理性主義」抬頭，考量順序改為天理、人情、國法，於是〈三仙女〉神話裡的生殖崇拜隱喻、移植章節等，紛紛回籠。更因開國神話的刪修，大臣難以置喙，這或許就能當作乾隆內心世界裡，情理觀的真實反映。

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案例，會得到一個更引人深思的問題，就是一般

⁶⁵ 廖明君著，《生殖崇拜的文化解讀：插圖本》，（南寧市：廣西人民，2006，第1版），頁3。

人同意的「胳膊往裡彎」的現象，是絕對真實的嗎。如果清代帝王是漢人，他會像乾隆一樣「凌遲」開國神話嗎？答案很可能是「不會」。

因為佛庫倫、柳枝、神鵲、百里等文字部分，都是滿人才清楚的薩滿信仰與生殖崇拜，一般漢人，可沒有那種思維。而乾隆是滿人，他十分清楚這些隱喻的涵意，認為不潔，才會痛下重手，全部刪除。說起來這麼處置，對滿族文化來說，難謂公平正義，還不如由漢人帝王來處理，或許還會更理想些。

不過幸運的是，乾隆在位六十年，後來又訓政四年。時間拉長到夠他回心轉意，修正年輕時的躁進，讓〈三仙女〉神話，大致回復原貌。如果乾隆也像雍正一般，僅只執政十三年，那麼一槌定音，問題也許就難以收拾了。

肆、結語

清初開國神話，是一則在漢藏文化圈中，藉由傳播而激盪出的小品。清朝歷任皇帝，為保持這個始祖傳說的合理性，而戮力修飾。其中尤以乾隆朝的六次改訂，起伏最大。這些修改過的官書，大致可分為兩類：《實錄》類開國神話，在「稽古右文」的保存心態下，全無更動。《史書》類的，則為了淨化生殖崇拜隱喻，先刪除，後復原，一切回到原點，顯得徒勞無功。但是從對開國神話的處理過程中，可以經由滿文詞彙的變動，清楚觀察到乾隆對滿族文化的認識深度，以及對本民族藝文作品文化政策上的一些心路歷程。比較起來，就與處理漢籍文化政策的評價會有所不同了。（本文於2016年7月投稿，於2016年8月20日審查通過）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有刀槍，勢力大；有眞理，天不怕。（白族）

眞理無敵，風雨無情。（蒙古族）

純鋼折不彎，眞理駁不倒。（維吾爾族）

手掌遮不住太陽，謊言辯不過眞理。（藏族）

如果是夜明珠，放在那裡都閃光。（景頗族）

參天大樹，有根才能長新葉。（毛南族）

人往大處看，鷹往高處飛。（納西族）

伸手容易縮手難，張嘴容易閉嘴難。（回族）

成人易，做人難。（烏孜別克族）

禿子找花不難，戴花難。（維吾爾族）

進山要帶柴刀，進城要帶錢鈔。（苗族）

結實的包頭靠扎，漂亮的獵槍靠擦。（傈僳族）

筍子不割成竹，穀子不收成泥。（佤族）

兄有弟有，不等於自己有。（布依族）

樹枝沒有一般齊的，力氣沒有一樣大的。（哈尼族）

看人看心，聽話聽音。（藏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廿二）——阿昌族 食品「過手米線」

華 華

壹、前言

阿昌族，是一個高山族，人口極少，主要分布於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山區的隴川和梁河等兩縣。這個民族是跨境居住的，在緬甸也住了一些族人，不過人數同樣不多。根據 2010 年大陸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阿昌族為 39,555 人。緬甸分布的稱為「曼達族」，多數居住於緬甸撣邦，2000 年統計全緬甸境內曼達族有 35,000 人。

過去古代漢文史籍中的所記載的「峨昌」，大致就是「阿昌」的音轉。¹峨昌人跟現今的景頗族也很有關連，所以阿昌族會住在「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景頗族轄區中，是一點也不令人意外的事。景頗族主要使用景頗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景頗語支。而阿昌語，卻屬於漢藏語系緬彝語支，兩者在語言分類上有些疏遠，無法互通。

除此之外，阿昌族語言本身情況，也是比較複雜的。依照語言學家分析，阿昌族先民曾於雲南西部從北向南遷徙，長期和其他民族交錯雜居，使得語言文化受到許多外界影響，導致民族語言成分及詞匯，變化較大。

不過根據阿昌族自己的傳說，情況就不是這樣了。阿昌耆老的講法是，由於開天闢地時，黃帝恩賜，要分配各種語言給普天子民，以便溝通。人多的景頗、漢、傣、傈僳等族，消息靈通先到，從黃帝那裡分到了自己想要的語言。當大家得到語言，歡天喜地的開始自由交談時，人少又住得比較遠的阿昌族祖先，才氣急敗壞的趕到。由於語言已經分賞完了，黃帝也沒什麼辦法，只好叫已經分得語言的幾個民族，大家各切下幾句話，借給阿昌族使用。於是，形成今天阿昌語中摻雜許多景頗、傣、漢、

¹ 巍佩華著，《阿昌族》，（北京市：民族，1989，第 1 版），頁 6。

傈僳、白等各民族語言詞匯的情形。²

這就是在實際生活上，阿昌人善於與外族溝通的原因了。例如戶撒當地一位叫做熊小妹的阿昌族年輕婦女，³她以賣刀為生，可以用流利的使用阿昌話、景頗話、漢話、傣話和緬甸話交談，天天顧客盈門，生意興隆。這種多語人才，在出產「戶撒刀」的隴川縣戶撒鄉，可說比比皆是。賣戶撒刀是當地阿昌族婦女，外出擺攤的基本功夫。因為阿昌男人都在家打製家傳鋼刀，語言表達能力又不比女人好，就形成這種特殊的分工現象。

戶撒刀的來源也具有傳奇色彩。「戶撒」源起於雲貴高原上的局部平原地方名稱壩子，當地人將「壩子頭」稱為「戶撒」，「壩子尾」叫做「臘撒」。明代初年，曾設立「戶撒長官司」，封熊姓頭人為土司，看來就是上述語言天才熊小妹的老祖先。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將沐英征討麓川，占領了戶撒、臘撒，並改此地為沐英私莊，開始溝通了漢、阿昌族文化。後來明王朝又三征麓川平亂（1441-1449），主帥王驥選擇這塊高爽肥沃的盆地戶撒、臘撒，開始練兵、駐防、屯田。屬下的兵卒也娶當地阿昌族女子為妻。在兩族交往融合過程中，許多漢族軍匠把打鐵製刀的技藝，傳授給了阿昌族男人。古書上記載，當時戶撒刀就有「柔可繞指，削鐵如泥」的特色，流傳至今六百餘年，口碑甚佳。⁴戶撒地區到現在還有許多沐英屬下的屯田後代，不過他們都不再打鐵製刀，可見技術已經完全「轉移」給阿昌族人了。⁵

戶撒刀不只能當軍刀，也是切豬肉的好刀。戶撒阿昌族的村寨，是沿著壩子東西兩邊山麓分佈的，各村寨間有石板路連接，街道整潔。每逢圩日，⁶只聽見街道兩旁無數把菜刀在砧板上剁肉，發出篤、篤、篤的響

² 謝崇抒，謝自律著，《中國雲南少數民族音樂考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第1版），頁104。

³ 王四代,曹明坤著，《古道邊的歌謠：阿昌族》，（昆明市：雲南教育，1995，第1版），頁16-17。熊小妹住在戶撒鄉上芒東村，擺攤的地點則包含隴川縣城、章鳳邊貿口岸等地。

⁴ 巍佩華著，《阿昌族》，（北京市：民族，1989，第1版），頁13-14。

⁵ 王四代,曹明坤著，《古道邊的歌謠：阿昌族》，（昆明市：雲南教育，1995，第1版），頁16。

⁶ 集市開市交易的日子。也叫「圩期」。根據西南地區周圍約成規定，一般是按農曆

聲，許多攤販都在製作阿昌族有名的風味食品——火燒生豬肉米線，也稱「過手」米線，這是趕集的、買刀的、賣刀的、到此一遊的人士等，都必定會品嘗的風味小點。

貳、阿昌族食品「過手米線」

所謂「過手米線」，並不是許多人吃過的「過橋米線」。「過橋米線」簡單來說，就是一種涮肉米粉。通常是由熱湯、切成薄片的各類嫩肉和時鮮蔬菜，以及米線三部分組成。吃時用一個大碗，先將熱湯舀入碗內，接著將嫩肉、蔬菜倒入，再以筷子輕輕撥動，好讓生肉涮熟。接著放進米線，等到溫度略降，即可食用。

因此「過橋米線」基本上是一碗熱湯米粉。尤其是那碗熱湯，上面浮了一層油脂，是有名的悶燒，連生肉都可以涮熟。若是赤手碰著了，必然是會起泡受傷的。

而「過手米線」，顧名思義，既然是要「過手」，以手當碗，這種米線只能是常溫，根本不可能太燙，因此應該算是一種「涼粉」。這就是「過手米線」與「過橋米線」在本質上的差異，雖然兩者都產在雲南省，外觀也只有一字之差，當地人卻並不會搞錯。

要準備做過手米線，首先得準備烤豬肉。豬肉基本上要新鮮肥美，肥瘦相間，避免採用里肌、腿肉等太瘦的部分，以免乾澀。豬肉還要帶著豬皮，吃起來才更有嚼勁。豬肝也可以切塊，同時上架以小火慢烤，直到肉熟透泛黃為止。至於豬肚、粉腸等，通常不適於烘烤，得要經過煮熟才能備用。

肉烤熟以後，只要將肉、豬肚、豬腸等，切碎、切細，放入大碗中就行了。豬肉是主料，而佐料則是豌豆粉、花生米、酸水、芫荽、辣椒、大蒜、薑、蔥、鹽、味精等十幾種材料。

佐料中的「酸水」，是阿昌族十分重視的一味，稱為「楊梅酸水」。戶撒地區盛產一種味道很酸的楊梅，每年的四、五月份成熟。⁷當地人會

⁶ 爲三日一圩，有「一四七」圩、「二五八」圩、「三六九」圩等，古書中「圩」也作「虛」。

⁷ 台灣的楊梅產地在桃園市楊梅區，果子每年五月底至六月間成熟，產期略短。

到山裡採摘新鮮的楊梅，當成季節性食物。深山老林中生長著野生的酸楊梅樹，一般長得既高又大，很適合當地人爬樹採摘。每當產期到的時候，只要上樹稍為搖動枝幹，青黃色的酸楊梅就會像下雨般滾落地面，戶撒人只需在樹下略事挑選，就能滿載而歸。用來做酸水的楊梅，選擇的標準是越酸越帶勁。所以受到一般平地人青睞，全紅色的「朱果」，反而無法入選。青黃色的酸楊梅，很容易就能擠出果汁來。再拌入烤豬肉裡，又酸又香，常令人垂涎三尺。

過手米線的米線，由於當地盛產大米，⁸所以就地取材，製成米線，相當新鮮爽口。米線相當於台灣菜市場米粉湯的粗米粉，甚至還略粗少許。

這種美味小吃，各攤位裡的調料不盡相同。有的還會加上煮熟的蘿蔔乾、豆腐、折耳根等。折耳根就是魚腥草，主要是食其根莖，算是雲南、貴州和四川人的最愛，每個菜市場都有。由於味道有點特殊，外人一時間往往無法立刻接受。

過手米線的吃法很簡單。就是右手持筷子，左手抓些米線，以筷子幫忙攤平在手心上，再在米線上放一些酸豬肉、芫荽、辣椒等配料，左手加速上揚，大口咬定。接著再細嚼慢嚥，讓那種酸酸、鮮鮮、香香、辣辣的味道，一時都湧上舌尖。因此過手米線不只好吃，而且豪邁，神似在台灣吃芥末生魚片的那種嗆辣感受，點滴在心頭，難怪阿昌人士都愛不釋「手」。

參、結語

阿昌族除了會用右手打造鋒利的「戶撒刀」、以左手吃下美味的「過手米線」，像熊小妹這類生意人，還會以風趣的歌喉唱出：「請把我的歌帶回你家，請把你的微笑留下」這種兒歌，逗樂觀眾。⁹

阿昌族也有比較正式的傳統風俗歌曲，如「把松昆」、「把毫昆」等。其中「把」意為「開頭」，「昆」意為「腔調」。例如在舉行婚禮、

⁸ 阿昌族簡史編寫組編，《阿昌族簡史》，（昆明：雲南人民，1986，第1版），頁79。

⁹ 王四代，曹明坤著，《古道邊的歌謠：阿昌族》，（昆明市：雲南教育，1995，第1版），頁17。

迎親時，都要唱「把松昆」、「把毫昆」，男女親友互相對唱，以增加熱鬧與喜氣。

「把松昆」的歌詞是：「小姑娘們囉，小夥子歡迎你，一起來唱吧，高興地放聲歌唱。姑娘們來囉，小夥子歡迎你，一起來跳舞，縱情地一起跳舞。」

「把毫昆」的歌詞如下：「小呀小哥哥，你的心兒送給我，就是吃的是蘿蔔葉呀也快樂，生活再苦也快樂，永遠把你放心窩。」

這是阿昌族婚禮中演唱的情歌，曲調具有朗誦性特點，屬於五聲音階，二拍子與三拍互為交叉。「把松昆」只有 la、do、mi 三音列，而「把毫昆」曲調更絕，從頭至尾只有 do、mi 兩個音，但仍感覺得到其中的 do 是中心音和穩定音。歌曲雖只有兩個音，但曲調中應用了嚴格重複、減略重複、翻轉重複等重複方法，使歌曲不僅不顯單調，還從樸素中展現特有韻味，充分顯示出阿昌族民歌獨特的樸素與簡潔美。¹⁰

因此，有詩為證。

詩云：「阿昌寶刀溯明朝，過手米線免過橋，神奇情歌把毫昆，兩音勝似五音高。」

¹⁰ 謝崇抒，謝自律著，《中國雲南少數民族音樂考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第1版），頁106-110。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
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
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
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銚。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九月出版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名譽：楊克誠
發行人

發行人：阿不都拉

社長：林恩顯

主編：劉學銚

電話：0921-883325
2218-6116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印刷者：晟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 141 號 4 樓之 6

電話：2314-1423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